

騷動

Stir

1996年6月 N.O.1 ■

季
刊

創刊號

女人·國家與媒體 | 男人造反了嗎？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Stir

季刊

1996年6月 NO.1

騷動



新知女歸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驕動季刊

Stir Quarterly

創刊號

1996年6月

發行人：蘇芊玲

主編：胡淑雯

美術編輯：黃瑪瑤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

TEL:3637929 FAX:3631381

郵撥帳號：11713774 婦女新知基金會

印刷：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售價：150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600元

贊助訂戶一年1200元

國內訂閱每月可再收到婦女新知通訊

國外訂閱：

歐美地區一年1600元(美金60元)

亞洲地區一年1200元(美金45元)

港澳暨大陸地區一年1000元(美金38元)

男人造反 反了嗎？

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

6 「愛人同志」？還是「枕邊敵人」？

淺談台灣新男性論述與運動的性別政治

孫瑞穗

17 新好資本家的告白

18 「新好男人」不是「男人」

顧燕翎

21 新好丈夫、新好爸爸守則

22 在運動中時時調整與體制的距離 也關乎「新男性」

李宛澍

25 新好朋友、新好同事守則

26 只有他是永恆的最佳男主角

盧郁佳

30 說新好男人太輕易

31 新好男性運動者守則

32 男作家與丈夫的「新」男性論述

盧郁佳

36 新好兒子、新好兄弟守則

37 同盟 不同盟

從女性主義與婦運的角度看「新男性」的「運動前途」

胡淑雯

45 「好男人」莫要對我流淚

胡淑雯

47 男人，該斷奶了！

古明君

50 新好情人守則

51 淫婦、淫書、淫水—讓閱讀成為欲望書寫

丁乃非

女人、國家與政黨

58 在台灣，婦解運動和國族主義能不能「牽手」？

邱貴芬

63 婦女、民主、國家的認同經驗

李元貞

69 男人拼鬥／女人苦撐 的 國／家

蘇芊玲

73 政黨，婦運生根的另一片土壤？

從民進黨婦展會看政黨內的婦運經驗

李清如

81 女人賭爛票的政治

何春蕤

89 母土與父國

顧燕翎

廣告

p.56 駕動代售處

封底裡：女學出版廣告



《騷動》，Stir，sisters in revolt，是革命中女人的集體情緒，也是女人反抗父權的姊妹同盟。騷，意味著女人對壓迫現狀的不安；動，則是女人集體的鼓譟出擊。女人騷動，不只企圖爭取傳統公共領域中權利／權力的平等，也要打破父權社會對女人的身體控制。

女人騷動，其所蘊含的充沛難抑的情慾與運動能量，是父權社會最恐懼而欲加以撲滅的，卻也是女人最為有力的武器。女人騷動，是一次女人的脫軌，要女人不安於室，用身體去攬動不平等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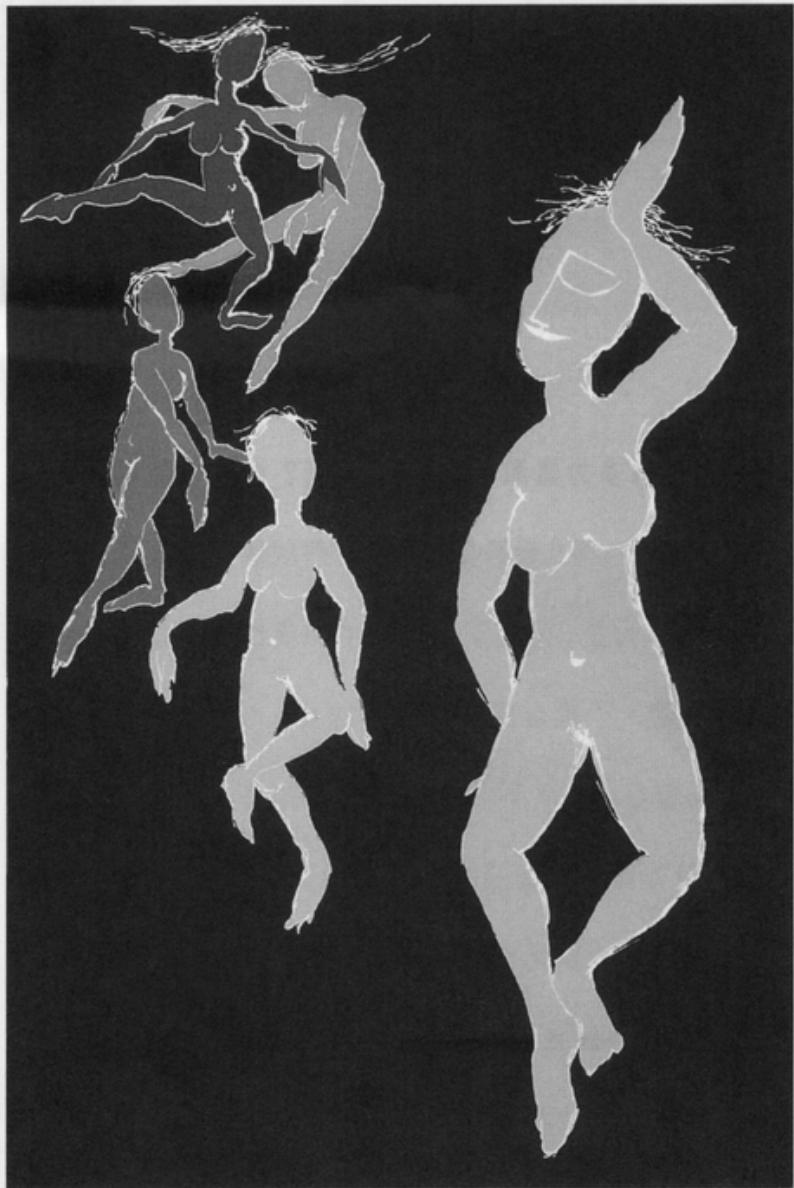


《騷動》季刊脫胎於《婦女新知》月刊，她繼承了婦運為女人的處境和痛苦命名的使命，以及改造性別體制的革命精神，但不自限於婦運團體機關報的格局。《騷動》在九〇年代中，台灣婦女運動以及女性主義論述蓬勃發展並已擁有相當成績的時刻創刊，我們不但期待各方各界在這個公共空間中將目前婦女團體正在進行的議題拿出來討論與辯論，甚至期待透過不同婦運團體、社運團體以及學術、政治等各界不斷地對話，進一步擴大並深化現今台灣的女性主義論述與運動。然而，《騷動》又不同於一般婦女學或女性學的學院刊物，她強調婦女研究成果要回饋婦女大眾，亦即，「婦女研究」與「性別論述」必須奠基于女人真實需求以及女人解放目標的基礎上，接受運動的洗禮與考驗。

《騷動》是女人心靈與身體的韻律教室，也是女性主義的言論廣場。它要攬動的是被父權社會所規範的既有秩序，要動搖諸如性別、國族、種族、階級與家庭主義等等支配性範疇對女人的強行分化；也要攬動被異性戀體制所限制並本質化了的各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驅動》期待女性主義政治的內爆與外爆，歡迎性別解放運動的好動份子。



種身份與認同，追求性欲主體的多元與差異。

《驅動》相信，一個更為開放並且不迴避差異與衝突的論述空間是必要的，因為運動必須要能夠自我反省，同時在反省中不斷改變。我們歡迎任何新的、或曾經被忽略的性別與性欲主體之主動發聲與介入，也期待在論述運動的過程中能夠召喚或創造新的運動主體，共同加入對抗異性戀父權體制，解放性別壓迫的戰鬥。

新知女婦女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005 NO.1 驅動

男人造反 反了嗎？

為何要花這許多力氣和「新男性」對話？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看「新男性」與「新好男人」，我們試圖面對與聯結的，不是男性，而是（這個不斷變動中的異性戀父權社會中）女人的欲望。不可否認，有許多的女人（結構性地只能、只會）渴望好男人、新男人，有許多的女人想把男性納入女性主義的陣營；而這樣的欲望更隨著「新好男人」此一形象的流行與「新男性論述」的提出，一再被挑逗、強化。這促使我們想走近一步，探探「新男性」與「新好男人」的內涵，以及他們對性別議題的看法。

也許，這個專題所做的，正是「進入虎穴」，去處理這些在結構上身處壓迫位置的男性所提出的分析與解放之道，走進他們的場子與他們作戰。如果我們冒險與這些

「新男性」從同一個出發點前進（思考男人在既有的性別

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

體制中的處境、男性解放運動的可能性…）而仍然能夠表現我們與「新男性」的不同，那麼，我們便能夠積極地與女人（針對著男人而生）的欲望對話，將其導向更有利於女人集體解放的方向。

我們發現，抽象的「男人」，其肉身座落在具體的社會位置（與女人的關係）中，是父親、是兄弟、是兒子、是上司、是朋友、是同事、是情人、是丈夫，我們同時體認到這種種新好男人（新好爸爸、新好丈夫…）在結構上之不可多得、之不可求、之不可能。確實，我們所身處的，不是一個性別解放了的社會，也因此沒有所謂解放了的男人或女人。女人可以欲望男人，許許多多女人也正欲望著男人，但重要的是，如何讓女人的欲望不再是女人受騙、受剝削的根由。

經由此一專題的討論與寫作，我們再一次試著整理女人和男人在結構中的權力欲望關係。看著「新好男人」與「新男性」自對面走來，我們除欣見有男性願意加入性別解放的戰鬥，更期待他們能跳脫個人化的框框，著力於

結構的改造，當然，這可不是嘴巴說說就算的。——編者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愛人同志」？還是「枕邊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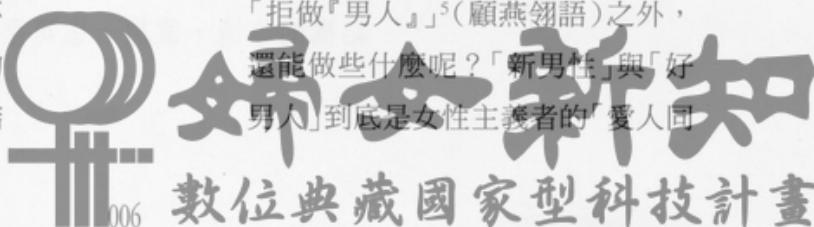
淺談台灣新男性論述與運動的性別政治

當女性主義遇到「新男性」

男性的解放論述與運動(如果暫且先其美名為一種「運動」的話)在台灣是八〇年代末以來的新生事物，也算是「男人」們為了回應女性主義運動針對傳統父權以及男性文化的批判而來的集體對話。自從一九八九年由三位大學男生組成「男性自覺團體」，並出版《赤子》雜誌以來，統稱在「新男性」的名下或者代表某種男性立場的說法，就陸續在大眾媒體上佔有一定的篇幅與發言權¹。同時，出版界書商們也看中了這個言論市場，大量出版促銷各種有關「新男性」的書籍²(不過，大多是翻譯書)，來幫助男人去面對新的兩性關係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因應由於自我解構所帶來的焦慮，甚至，企圖重建新的男性形象與認同。我們還可以發現，大家被培養出一種新的性別焦慮症，只要某種傾向女人立場的發言出現時，就要趕緊「配」上某種代表「男人」的聲音，以達到「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不可否認地，無論是書商的促銷陰謀，或者是媒體在異性戀共識下的男女配對遊戲，男人開始自我反省與懺悔式的示弱言行的確打動了不少女人的芳心。於是，某些樂觀的言論會認為「新男性」的出現將會結

束女人的悲情，邁向兩性大和解；而對有些女性主義者(尤其是以男人為情慾對象者³)來說，雖然在嘴巴上罵男人，但心裡頭還是會偷偷地渴望有朝一日最好自己能夠「碰」上個「好男人」。看來，當女性主義碰到「新男性」，應該不只是「天下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一竿子打翻的政治表態而已。某種程度而言，它深層地牽涉到女性主義運動如何面對「男性文化」以及處理跟「男人」的關係，甚至是，異性戀女性主義者在夾雜著情慾的性別政治中如何因應與自處的問題。換句話說，面對著世紀末這一場打著「解放」旗幟的男性文化革命，我們也許可以主動提出幾個問題：究竟「新男性」論述在「論述上」為性別的解放運動提出什麼樣新的架構與可能的方向？「新男性」運動在「實質上」為女人受壓迫的處境帶來什麼樣真正的改變？以及，對個別的女人而言，帶來了什麼樣的好處？更關鍵的是，面對「新男性」的「政治正確」與「好男人」的「花言巧語」時，女性主義者除了「等待真正能造反的男人」⁴(李元貞語)以及呼籲男人放下屠刀、立地

「拒做『男人』」⁵(顧燕翎語)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新男性」與「好男人」到底是女性主義者的「愛人同



志」，還是「枕邊敵人」？
「進步男性」在性別政治上進步嗎？

不過，在進入討論「新男性」論述之前，我想先回顧一段與「進步男性」遭逢的經驗。記得解嚴前後的那幾年，身旁周遭突然出現了許多喜歡唸馬克斯的書並且自詡「進步」的男性。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不但唸進步的革命理論，關心社會運動，反對國家霸權，而且還會主動地引介「女性主義」的書籍給他們的女朋友讀，不過，通常自己是不讀的。在眾人的面前，「進步男性」們大多義正辭嚴地表態支持女性主義，但遇到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會先懷疑這個受害者是不是在說謊，而急著去找「其它」原因；或者當女社員受限於女生宿舍的夜歸限制而無法在深夜開會時，他們會說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仔細察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女人的關係，對待女人的方式，其實跟一般沙豬無異，仍然是鞏固「男尊女卑」文化的既得利益者。等到弱勢的女人自行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益奮鬥時，「進步男性」則開始提出原則來指導女人：「『妳們』女性自覺團體區隔出男人而只讓女人參加，是否有『分離主義』的傾向？」、「『妳們』婦女運動討論『性解放』與『身體自主權』的議

題，沒有關照到廣大基層婦女的利益，是否只是中產階級加上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偏狹症』？」、「『妳們』女性主義者揭發男女兩性矛盾進而引發緊張對立，是不是會阻礙其他性別發展的可能性？有『本質主義』的危險？」說來容易卻置身事外的分析，就像是男人過去對女人的身材檢查一般，解放指導原則成了「進步男性」們對女性主義者新的「三圍」標準。「進步男性」「自外於」性別宰制結構的種種分析與指導，表面上看起來像是關心性別運動，但事實上卻正焦慮於那已漸漸失去的發言正當性。反觀「進步男性」在運動中的實際表現呢？記得某一年的反核示威運動中，環保團體發起了一個「要以集結女人穿過的舊內褲來『破』中正廟風水」的行動，以達到反政治威權體制的決心。當時，強勢的男性文化主導了運動的表現方式，根本不理會各種婦女團體的抗議。私底下，我曾質問一位有決策影響力的「進步男性」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攤開雙手無奈卻輕鬆地說：「沒辦法，政治就是『實力』的問題。」哦！當下我才瞭解，在必要表態與鬥爭的時候，「進步男性」終究還是會拋棄姊妹而選擇與兄弟共謀，這些經驗都讓我深深地領悟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婦女研究

「進步男們反抗「國家威權」但並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反「父權」；更明白講，反抗傳統的政治威權或者反抗階級中的剝削關係，並不表示他們在性別宰制關係上就必定會反「男性霸權」。

到，目前婦運的反父權抗爭之所以仍持著某種程度的「分離主義」，理由不是因為排拒「有陽具的男人」，而是抗拒這種以「實力戰」為藉口，而在強弱勢者之間擺盪的「選擇性進步」的邏輯。我個人曾一度以為這種反霸權的男人是一種「解放後的新人類」，是可以共同為實現性別平等理想打拼的同志，但「進步男性」們「置身事外」以及「選擇性進步」的事實卻更進一步說明了，性別宰制的物質基礎並不是個人的道德性宣示可以超越的。「進步男性」們反抗「國家威權」但並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反「父權」；更明白講，反抗傳統的政治威權或者反抗階級中的剝削關係，並不表示他們在性別宰制關係上就必定會反「男性霸權」。在分析上，「進步男性」慣於借用「階級分析」來替代「對父權的性別分析」。然而，相對於「階級」或「國家」的剝削關係，「性別」是個特殊的範疇，有其特定的剝削形式。換言之，喜歡藉由進步理論的權威，或者借用「階級分析」取代「性別分析」來指控與指導女人運動，本身恐怕就是在利用傳統性別角色中的「男性優勢」。上述「利用女人內褲」的例子正說明了「性別政治」無所不在，掛著「政治優先」、「階級優先」、「國

族優先」等羊頭招牌的說法，也只不過是遵循著被制度化的社會疆界以保障既得利益的賣狗肉行為。在實踐的層次上，「光說不練」的「進步男性」在強調「個人即政治」的前提下更加原形畢露，因為他的反父權實踐永遠只是包裝精美的「政治正確論」(political correct)。也由此可見，「造反得很有限」的「進步男性」之所以那麼不能夠看見自己的問題，似乎也暗示了，反支配的運動既不能也無法去苦苦期待壓迫者的自我反省。

「新男性」運動的「新意」在哪裡？

不過話說回來，尋求解放的「男人」們當然也並非「天下烏鵲一般黑」，他們的論述與實踐在性別政治的光譜上也各自呈現了不同的色澤。跟上級指導員式的「進步男性」比，「新男性」相對來講就比較願意面對「性別」問題。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所企劃的一系列「新男性運動」專輯文章，以及在自立早報「新人文」版〈新男性打啥主義〉專輯、聯合報「狂飆年代」專欄等等各大媒體零星發表的「新男性」論述來講，雖然他們各人對於性別宰制關係的立場不同，分析方法也不盡相似，但是他們的討論基本上是從「檢討與批判『男性文化』」出發來回應女性



女
性
知
識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大部分的「新男性」論述其實是輕易地跳
躍了男性經驗的反省與反芻，而將一切
的錯誤歸咎於萬惡的父權巨靈，所謂
「大寫的MAN」。

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

主義的。其中以王文典在〈追隨她的腳步—從女性主義到新男性主義〉一文講得最清楚，「他」⁶宣言式地定義了「『新男性』就是受到女性主義洗禮、影響的男人」。卡維波則是在其〈新男性〉⁷一文中言簡意賅地定義了，「新男性」就是「企圖與舊男權徹底決裂」的男人，也就是「男的女性主義者」（卡語）。而且，「新男性的發言重點就不應該是針對女性、女性主義，而無寧該吸收女性主義的教訓，回頭來檢證自己的男性經驗」。批判性的問題意識得以準確聚焦，使得他們比置身事外的「進步男性」更接近女性主義的政治。有趣的是，關於「新男性」們到底用什麼方式來講述自己的「男性經驗」以及用什麼架構來處理與解釋這些經驗，每個人的差別實在很大，而且絕對也跟他們的性別立場有關。我在此暫且先歸納為三種，並一一詳述如下。**第一種是「以退為進型」。**小野先生在〈流浪的老沙豬〉⁸一文中所描述的以沙豬自嘲的「新男性」，正是那種看起來「好像很有溝通誠意」但是實際上卻是典型的反挫份子。當老婆在連續做了六天家事之後的假日裡想要偷閒片刻，並藉機會訓練小兒子做家事以免將來養成大男人惡習時，遭到小兒子的強力

拒絕。為了阻止「『女性主義』對抗『男性沙文主義』」大戰的發生（作者按：爭取平等分擔家事責任的女人，就是「女性主義者」），作為人夫人父的「新男性」此時只好自己親自出馬做起家事。吃力不討好的是，發了威的老婆卻把「已經乖乖去做家事的他」與「拒做家事的小兒子」一起罵成大沙豬。文中的「新男性」顯然相當地不滿，因為他是好心「幫」女人，可是「好心被雷擊」，卻在女性主義的反父權批判下也通通一起被當成沙豬了。好了，我想這裡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在新男性的所謂「幫忙」以及「怎麼幫忙」。首先，「新男性」把家務的平等分擔當作是對女人的施惠，然後再以「好心」的姿態出現，背後所依賴的基礎其實是傳統性別分工給男人的正當性：「其實我本來可以不做的！」。其次，在女性主義者要去向更強大的父權挑戰（要求小兒子做家事）時，「新男性」立刻搬出偉大的親子教育道理（「一個童年被壓抑過的女孩長大以後是不是很容易壓抑別人？」）來轉移衝突，性別政治轉成了個人道德修養的問題又被丟回給女人。

因為在文章最後我們都知道，在一場由「新男性」介入幫忙的性別戰役之後，家事還是由女人乖乖回去做

了。這正印證了陳光興在〈向「男同志」學習⁹〉一文中對「新男性論述」的批判，「進步的『新男性論述』沒有出現，來處理『我們的問題』。造成的後果就是冷漠、逃避，甚至是反動地回到傳統父權式的框架中」（陳光興語）。第二種則是「打稻草人型」。大部分的「新男性」論述其實是輕易地跳躍了男性經驗的反省與反芻，而將一切的錯誤歸咎於萬惡的父權巨靈，所謂「大寫的MAN」。這類型的「新男性」認為是那抽象的「大寫的MAN」「冥冥中」主宰了我們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個別的男人「自己願意」要去壓迫別人的。這種看見結構的分析角度，在某些脈絡下是很具有批判力的，但是在沒有被準確地對焦與脈絡化的情況之下，常常會被「利用」來作為脫罪的說詞。以楊照在〈想像自己的身體〉¹⁰一文為例。為了回應一九九三年以來頻傳的各種性騷擾事件，他先在理論上抽象地說明了一般性「自我意識與身體的想像之間的關係」，然後再說「男性文化裡根本就沒有教男人如何去揣摩別人所設定的身體疆界」。他以「台灣人的身體」在長期政治戒嚴體制下逐漸失去溝通性的肢體語言為例，來說明「男人身體」之所以僵硬的社會成因，並

間接地解釋了性騷擾的源起。性騷擾的罪魁禍首在層層的分析過程中被指向一個無以名之的「大社會」，嚴重地忽略了在發生「性騷擾」的實際過程中，男人的身體不只是「僵硬」而已，而且往往帶有「暴力」的成分、對女體更是有攻擊力和侵略性的。為了找到「集體歷史性的」（楊照語）抽象而一般化的討論層次，身體的「性別」成分不但被化約而隱形，批判的對象也失去了焦點。如此的分析與立場實在不如他在另一篇〈台灣新男人的出路〉¹¹文章中所宣示的：「男性父權舊文化正就是因為用系統、抽象道理來殖民生活世界，強迫人們放棄多元異質的細節，才弄到今天這樣惡名昭彰的地步。」（楊照語）因此，「新男性」的出路可能真的得由男人自行「重建細節」做起了。第三種是「自憐自哀型」。這種類型的「新男性」論述正是企圖建立男性經驗的細節，著重於揭露「男性氣質」的養成過程，以說明「男人」並非天生，同時也暗示著父權體制所殘留的劣根性是個人可以改變的。以許悔之〈男兒有淚應可彈〉¹²一文為例，在看過無數的男人只有在酒後才能哭泣，無法回復「自己的天賦本能」（許悔之語）感到憂心，而認為作為「新男



婦女研究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性」就該唾棄那「必須壓抑情感，泯滅個人情緒」有淚不輕彈的男性氣質，反璞歸真地敢於「流淚」，甚至「可以趴在女人的肩上哭泣」（許語）。這種勇於示弱哭泣的「新男性」是典型的「好男人」（關於「好男人」的論述將會在以下繼續討論），乍聽之下的確會讓人心軟，但是這種以個人式的、自省式的論述來回應女性主義對父權文化的批判，實在是不夠徹底。正如許文所說的，父權文化中所界定的「隻手撐天，無所畏懼」的「偉大男性」，是任誰也做不到的，因而暗示「男人」也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然而，許文卻忽略了父權文化拒斥（男）人的自然情緒，事實上卻將此情感需求轉移並壓抑到私領域去了，而且完全由女人來消化承擔。換言之，男人的眼淚雖然通常在兄弟之前才「不輕彈」，可是卻往往在女人的懷裡「大彈特彈」。「新男性」想要將「趴在女人的肩上哭泣」說成是具有解放意義的話，嘿，那真是得了便宜又賣乖了。在「同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的推論下，「新男性」藉由參與男性文化的改造想跟女人連線，本來是好事，但是正如許文最後所說的「勇敢的哭泣是為了完成自己」一樣，「新男性」過份地沈溺在自憐自哀的

氛圍中，常常會輕易略過女性主義所指出的「『男人』與『男性文化』之間的共犯結構」，去（性別）政治化的結果因而也遠離了反父權的戰鬥。然而，某些持「男人也是父權體制受害者」論點的「新男性」，則清楚地意識到性別政治的運作，晏山農的〈男性其實不必那麼苦〉¹³以及曾陽晴的〈男人，窩囊的動物〉¹⁴等文都是典型代表。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女人的獨立自主給男人們帶來的種種好處，並想要藉此來「利誘」聰明的男人不必苦撐，要搭這趟女性主義的便車以脫掉假面，成為識時務的「新男性」。但是他們的問題正是，對「新男性」的思考僅止步於「識時務」。這種「利誘」策略或者立刻敗倒在女性主義裙下的棄械投降行為，其實常常反應了「新男性」們在失去傳統男性優勢，或者是說失去傳統的男性認同之後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本來是很有創造性的，它會讓不認同男人的男人去想：「如果我不認同『男人』，那我想做什麼樣的『人』呢？」，進而使得「新男性」的論述可以開始邁向新的性別主體的討論。卡維波的〈新男性〉¹⁵一文就具有這種潛力。他企圖豐富「新男性」所召喚的主體內容，聯合同受既有（父權式）性別體制所壓迫的



婦女研究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性邊緣人」一同反抗。所以他說「『新男性』就是男同性戀、男扮女裝者、SM、私生子、愛滋病患者……」(卡語)。這種邊緣主體的論述

「新男性」過份地沈溺在自憐自哀的氛圍中，常常會輕易略過女性主義所指出的「『男人』與『男性文化』之間的共犯結構」，去(性別)政治化的結果因而也遠離了反父權的戰鬥。

建構值得鼓勵，可惜主體的經驗細節不足，成了空洞的標籤。換句話說，大部分的「新男性」論述太快地被一種「政治正確論」所滿足而裹足不前。而且也因為缺乏針對「男性經驗」進行比較有系統的批判與重建，使得他們在論述當中所提到的「出路」，諸如：「讓我們都從男人與女人冥頑不化的身份中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曾陽晴語)，以及「學著試做會哭會笑的新男性，撕掉假面，添加更多的『人性』……」(晏山農語)，甚至「……

『性多元人士』...可以作為反父權性別壓迫的『新男性』」(卡維波語)，都變得抽象而不切實際。其中，作為「新男性」重要解放指標的「人性」、「真正的人」與「性多元人士」更是變成了神秘而不可理解的東西，所指無從依據當然也就根本無法達成。

總而言之，對於「自己是如何參與了父權共謀」的男性經驗著墨太少，正是男人尋求解放的絆腳石。至於「新男性」們所激盪出來的種種顛覆父權的嘗試，倒是十分值得鼓勵的，諸如：男人要努力「尋找自己身體中的女人」¹⁶以柔克剛，男人可以設法「父代母職，撫育小孩」¹⁷以體驗女人受壓迫情境，或者以「男扮女裝」¹⁸與認同「(男)同性戀」¹⁹經驗的方式來跨越性別體制二分的藩籬等等。無論如何，不管是「新男性」最終的理想是要「讓『男性』成為一個純生理、自然名詞，而不具有任何社會的特殊象徵意義」(王文典語)，還是要「取消男性」、「解構男性」(杜平語)，「新男性」的求「新」與求「變」，都如它自己所宣稱的，該是「一種執著，不能回頭的奮鬥過程」(王文典語)。

如果說「新男性」是「說的比唱的多」，那麼「新好男人」就是「唱的比說的多」。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並非互斥，而是互補的。因為「說的比唱的多」，代表著「新男性」在理論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建構；而「唱的比說的多」，則代表著「新好男人」在實踐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行動。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並非互斥，而是互補的。因為「說的比唱的多」，代表著「新男性」在理論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建構；而「唱的比說的多」，則代表著「新好男人」在實踐上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行動。

的好聽」的話，那麼「好男人」就是其中「唱得最好聽」的了。關於「新男性」論述中最被寵愛的「好男人」（或稱「新好男人」）是很值得一提的。由於這個論述所建構的內容就是在「重建」（或者「重覆」？）男人在傳統私領域中的細節，包括了如何對待婚姻、家庭與愛情等等大部分女人關心的議題，它最接近女人的慾望核心，因此對女人也最具有動員力，甚至摧毀力。也因此，「好男人」常常被利用來「騙」女人。張鎬哲的「好男人」專輯²⁰頗能說明這種論述所牽動的慾望與騙局，現在就來唱/掰給妳聽。「『好男人』不會讓心愛的女人受一點點傷」（作者按：「好男人」在愛情關係中絕對不會傷害女人，他會是個溫柔的「好情人」。）、「絕不會像陣風東飄西盪在溫柔裡流浪」（按：「好男人」絕對不是好色的男人，他很專情不會搞外遇。）、「『好男人』不會讓等待的情人心越來越慌，孤單單看不見幸福會來的方向」（按：「好男人」的感情不會漫無目標，他可能會保證給女人一個家庭。）。就這樣，伴隨著「具有紳士風度的」、「感情專一的」、「顧家的」「好男人」形象的建構過程，一個裹著糖衣的一夫一妻異性戀家庭也同時被建立起來。裏

著幸福家庭糖衣的「好男人」之所以能夠召喚女人的慾望，其實牽涉到男女在物質條件上長期的不平等關係。New Sentra的汽車廣告文案頗能讓我們一窺現有一夫一妻異性戀家庭的本質。「我是當爸爸之後才學當爸爸的」、「我要作比我爸爸更好的爸爸」²¹，「……我忽略了妻子的付出，並不少於我；她也需要呵護與撫慰；而孩子帶給你那麼多感動與

大部分的「新男性」論述太快地被一種「政治正確論」所滿足而裹足不前。而且也因為缺乏針對「男性經驗」進行比較有系統的批判與重建，使得他們在論述當中所提到的「出路」都變得抽象而不切實際。

歡樂，怎忍心把他推給妻子一個人……」²²。表面上，通過了男人深切的自省以及溫柔的告解，沒有了權威的人夫與人父，看到了昔日他自己的父親所看不到的事實，那就是每一個成功的男人總是在背後壓迫

了一個在家庭中默默付出的女人。「好男人」看到了被壓迫者，所以他會去「體諒」女人而非如昔日的漠視，但是卻不見得願意在結構上作太大的改變。根據民意調查顯示，有近四成雙親家庭的先生從來不分擔家事，也不管小孩的教育²³(一般單親家庭比例則更高)。而且職業婦女平均一周工作65小時，比男人多出15小時²⁴。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好男人」僅止於在道德與態度上告解，或者只分擔九牛一毛的家務，簡直就是「耍嘴皮子」的討好遊戲罷了。其實，從「大男人」的高聲喝斥到「好男人」的輕聲細語，也反映了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無法因應新的社會分工所帶來的衝擊。尤其在台灣雙薪家庭比例很高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女人都必須外出工作，而繁重的家務與養老托兒的勞動必須要有新的分工方式來處理。也因此，只要男人仍想要維持一個所謂「家庭」的規模，也會要被迫面臨角色的轉型。更何況，君不見廣告中所刻意訴求的消費對象，不正就是指那在家中掌握車子(財產權力)，而且也比較買得起車子(消費能力)的「好男人」嗎？它暗示了，「好男人」不一定是女性主義者所期待的在性別政治上比較

進步的男人。一旦女人沒有察覺到這種「家庭意識形態」背後所暗藏的權力玄機，就會將幸福的未來完全寄託在下一個家庭當中，甚至寄託在巧遇「好男人」的機率上。同時，女人對「家庭」中的「好男人」抱持著過度的幻想，也使得婦女運動多年來爭取女人權益的成果，被收編在父權制度內比較能夠容忍的「紳士學院」²⁵與「父職教育」²⁶的專案上。不然，試問：為何街上到處都是「好男人」，卻不見「好男人」出面支持致力改善家庭制度中不平等處境的民法運動呢？卡維波在〈好男人〉²⁷一文中批評的好：「『好男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安定婚姻制度的功能，他的『好』有其不能超越父權婚姻家庭的侷限性」(卡語)。而看起來略施口惠而不直接回應女人在解放運動中的政治要求，看起來「好男人」的確有「腐蝕女人徹底推翻父權的決心」(卡語)的嫌疑。「好男人」除了駕馭家庭房車前來之外，對一般女人而言，也同時意謂著可能會是個感情所繫及慾望所託的「好情人」。因為相對於「大男人」來講，「好男人」好像比較能「給」女人自主的空間，尤其是那種看得見女人被壓迫的處境，感情比較細膩而願意面對「生活細節」的男人。《好男人講義》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好男人」應該要回到俱樂部中與兄弟討價還價，拓展在父權式性別體制中弱勢者的空間，而不是轉向女人宣示立場，或要求感情回饋。想要在哪裡得到救贖，就應該要在哪裡反抗，否則，脆弱的「好男人」想要「遠離大男人」的壓迫是遙遙無期的。

²⁸中所描繪的「好男人」便是一例。

蔡詩萍通過一種自傳體式的文字來「體諒」女人處境，並且試圖建立「適切的活生生的例子，讓那些『大男人』自我參照」(蔡詩萍語)，原本是好意。但是，因為作者太過焦慮於既被同儕的「大男人」歧視又得不到女人/女性主義者的愛，而使得想要建立「好男人」模範生的反省式自傳成了童男日記。換言之，「好男人」太過於焦慮自己是否被愛，而輕易跳過了性別政治的主題。正如蔡所說的，「男性沙文主義」的確是在「純男性俱樂部」中形成的。男人們透過定期聚會討論學術、一起喝酒、打屁、洗三溫暖、上鋼琴酒吧、看A片等活動中，建立起「男性氣概」(manhood)與「兄弟情誼」(brotherhood)；甚至如他所舉證，透過眷村男孩的「打黑貓」(按：即偷窺女人洗澡)的偷窺文化來建立所謂的「男性觀點」(male gaze)。但是「好男人」不能只是在女人處宣稱，而在哥兒們之前妥協啊！更何況「『娘娘腔』的男人」其實是被強調男子氣概的支配性男性文化所壓迫，「好男人」應該要回到俱樂部中與兄弟討價還價，拓展在父權式性別體制中弱勢者的空間，而不是轉向女人宣示立場，或要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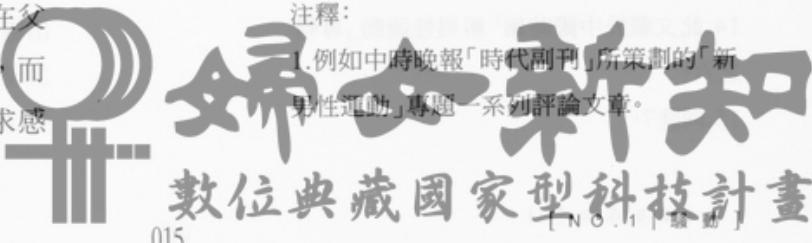
情回饋。想要在哪裡得到救贖，就應該要在哪裡反抗，否則，脆弱的「好男人」想要「遠離大男人」(蔡語)的壓迫是遙遙無期的。

該愛的就愛，該恨的就恨！

然而不可否認地，對個別的女人來說，因為在既有的重男輕女的父權家庭中無法被愛，或者在反父權的一路戰鬥中身心俱疲，而也許在「好男人」處可以取得些許溫暖，但是女人對於性愛自主性的需求既無法在「家庭套餐」中取得，也無法在「好男人的善意」中滿足。換句話說，女人的情慾自主無法從等待「好男人」的「被愛」中得到，而唯有在於自己學習如何「主動地去愛」中得到。君不聞女歌手正用溫柔但卻堅定的語氣唱著：「該愛的就愛，該恨的就恨，要為自己保留幾分！」²⁹。即便果真有任勞任怨、執迷不悔地付出、或者具有溫良恭儉讓美德的「好男人」出現，可能也無關乎女人為解放自己而奮鬥的堅持。「妳若勇敢愛了，就要勇一敢一分！」³⁰女人們真該盡情享受，卻勿輕言犧牲，因為女人的解放運動是二十四小時不打烊，也無須打折的。

注釋：

1. 例如中時晚報「時代副刊」所策劃的「新男性運動」專題一系列評論文章。



示這人走向群多平面，隨意的從各種中擇取兩派立場。

逃避歸，斷然採取對立的立場，舉立

民大敵態」選就「人與社會」的歸宿，橫否，並更勝聯軍是

。的關懷要緊要衝突的人

2.八〇年代末的《兩性關係的新觀念》(洪建全出版社)以及《男性解放》(婦女新知出版社);九〇年代則有《新男人－廿一世紀男人的定位與角色》(時報出版社)、《新男人》(時報出版社)以及《新男性》(牛頓出版社)等等。

3.本文以下所指的「女人」或「女性主義者」主要是指異性戀情慾傾向的女人。

4.詳見李元貞,〈男人真能造反嗎?－評台灣新男性運動及論述〉一文,載於誠品《閱讀》1994年10月號pp.77-8,1994,10。

5.詳見顧燕翎,〈拒做「男人」〉一文,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女學週記」專欄,以及《婦女新知》通訊第二期。

6.王文典的《追》文中,有許多的看法與立場其實前後並不一致,我懷疑極有可能是一群(男)人討論之後的傑作。

7.詳見卡維波,〈新男性〉一文,載於聯合報「狂飆年代」專欄,1995,8,21。

8.此文載於中國時報「新男性運動」專輯之一。

9.詳見陳光興,〈新男性論述的起點－向「男同志」學習〉一文,載於中國時報「省思強暴系列」專題之五,1994,5,2

10.載於中國時報「新男性運動」專輯之八。

11.詳見楊照,〈台灣新男人的出路〉一文,載於中國時報「開卷」版,1995,4,20

12.此文載於中國時報「新男性運動」專輯之二。

13.此文載於中國時報「新男性運動」專輯之三。

14.此文載於中國時報「新男性運動」專輯之六。

15.同註7。

16.詳見林旺,〈你的身體藏著一個躍躍欲動的女人〉一文,載於自立早報「新人文」版,1993,3,8

17.詳見杜平,〈跨越性別的藩籬〉一文,載於自立早報「新人文」版,1993,3,8

18.同註17。

19.同註17。

20.唱片專輯名稱,曾擠入國語歌曲流行排行榜,波麗佳音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21.汽車廣告文案,詳見「新好男人咖啡屋」系列:「我要作比我爸爸更好的爸爸」《聯合報》廣告,1995,10,4。

22.汽車廣告文案,詳見〈新好男人系列〉:「我不再把對家人的依賴當作是愛」,載於《中國時報》。

23.這是現代婦女基金會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針對現職或曾經擔任職業婦女為調查對象,意味著對一般有著專職家庭主婦的家庭而言,男人不做家事的比例將會更高。

24.本統計根據張晉芬〈綿綿此恨,可有絕期?－女性工作困境之剖析〉一文,《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女學會出版

25.關於「紳士學院」的介紹與批評,詳見蘇芊玲,〈「紳士學院」教些啥名堂?〉,載於《中國時報》,1995,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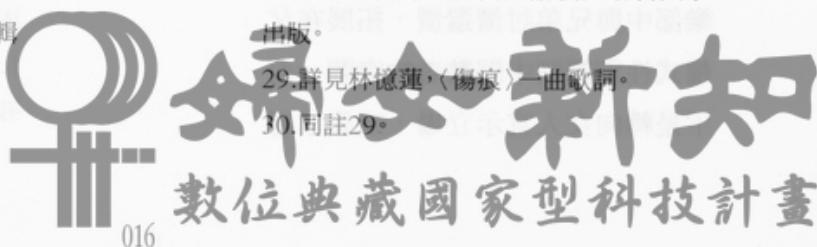
26.關於「父職教育」,詳見《人本教育札記》第77期,「從新好男人到新好爸爸」專輯。

27.詳見卡維波,〈好男人〉一文,載於聯合報「狂飆年代」專欄。

28.詳見蔡詩萍,《好男人講義》,聯合文學出版。

29.詳見林憶蓮,〈傷痕〉一曲歌詞。

30.同註29。



新 好 資 本 家 的 告 白

我是個好資本家，真的。(註1)

但好資本家還未有出頭的機會。(註2)

資本家在這個社會裡其實有百分之百的機會變成「大」資本家，但他想做「好」資本家除了有限的際遇外，還得有極大的勇氣。(註3)

台灣社會有多少結構性的問題，讓資本家生了這麼嚴重的病。(註4)

做為資本家的悲哀，其實在於他的勞資關係中，摻雜太多的權力敏感度。(註5)

在我們的文化訓練裡，似乎資本家是必須壓抑情感，泯滅個人情緒的。(註6)

當勞工運動抬頭，甚至烈焰高張之際，好資本家必須時刻壓抑自己，深怕自己一不小心言語動作得罪了工運鬥士，被冠以「大資本家」之罪名。(註7)

事實上，我們的社會無法把勞資分開來，勞工要發動什麼抗爭運動，不要忘了，還有好多好愛勞工的資本家也想參加，不要讓他們受到冷落，尤其不要讓他們食而無味或是餓肚子。(註8)

勞工是否有智慧去超越自己的弱勢心態，脫離鬥爭的初期抗爭手段，某種程度也決定了會造就出什麼樣的好資本家。(註9)

以上文句剽竊自新男性相關論述。文中「(新)好資本家」字句皆可還原為「(新)好男人」或「新男性」。

註1：蔡詩萍，我是好男人

註2：蔡詩萍，我是好男人

註3：蔡詩萍，我是好男人

註4：楊照，傾聽男人性事告白

註5：楊照，傾聽男人性事告白

註6：許悔之，男兒有淚應可彈

註7：李清志，偷走超人的面具

註8：亮軒，非關男女

註9：周本驥，為新男人催生

新知女歸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新好男人」不是「男人」

一位妻子抱怨丈夫晚歸，丈夫滿腹委曲地申辯：「我又沒有打妳，又沒找別的女人……。」言下之意，如此好男人妻子仍有怨言，未免苛求。以當前台灣婚姻暴力之氾濫和外遇之頻仍，這樣一個有所不為的丈夫也堪稱難能可貴了。不過若置於千百年來的父權傳統中，不以暴力來鎮壓妻女，也不廣蓄妻妾奴婢來彰顯自己地位的男人則非但無可稱頌，簡直胸無大志，不求上進。由此看來，「好男人」和「好女人」一般，並不存在有先驗的、放諸四海皆行的準則，而只是反映了特定時代和文化的性別角色期望。並且，「好男人」和「好女人」都因性別相對關係而存在，以男人來說，可能有「好人」、「好老板」，但男人看男人時，卻不會考慮對方是否是「好男人」，所以好男人與否應從相對性別——女性的觀點來認定。如此看來，在一個充斥了父權、夫權和男權的當今台灣社會（若不信，可參看劉毓秀主編的《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時報出版社），自詡為「好男人」者，就如同自稱「道德零缺點」的總統候選人，讓人納悶是其標準太低，還是他完全缺乏反觀自省的能力。

當我們論及人的性別時，通常

將之區分為生物性別和社會性別，可是在一般性別論述中，我們極少深究個體的生物性別——其染色體的組成、荷爾蒙的分泌或性器官的功能。根據統計，男人和女人的這些生物成分的構成頗有連續性，難以截然二分，亦即兩性之間隨著年齡、生理狀況的變化，其生理性別有相當大的模糊地帶。不過通常我們區別男女，著眼點在其社會性別，傾向於用社會上約定俗成的性別角色期望去判讀一個人是男是女，並且據以斷定他或她應當如何言行舉止、穿著打扮，甚至以此規範他／她的生物行為，包括如何咳嗽、如何笑等等。由於社會性別早已深植人心、深透文化，我們習焉不察地認為這些規範、習俗天經地義、不容置疑，是天生的、自然的，因此往往將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混為一談，似乎二者為一。然而當我們侮辱個別男人，說他「不是男人」，質疑女同性戀者「不是真的女人」，或「想當男人」，或者調侃用力大聲咳嗽的女生不像女生時，我們所指涉的男女其實已非生物性的存在，而是一套社會文化建構，亦即脫離生物性別之外的社會性別。

在日常生活中，社會性別對個人的制約往往大過生物性別。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將所有的個人差異化約為男人或非男人(女人)，是二分法認知的產物，二分法之問題在於其非僅抹煞了差異物之間的連續性，更將對立二元層級化，產生排斥而非包容的效果，所以我們會認為非男即女，非女即男；甚至因而建立上下宰制的關係，如男／女，心智／身體，文化／自然。結果社會性別非僅界定個體的行為，更包涵非個人可以扭轉的權力分配與價值取向，而其重要性甚至凌駕其他權力結

問：請問你為什麼參加
台北先生選美？
答：因為我想了解被物
化的滋味。

眉」則是對女人的贊譽。在資本主義父權職場，女人的處境彷若外勞，同樣的一份工作由男人做和女人做所獲的酬勞往往差距甚大。姑且不論在任用、訓練、升遷等方面的差別待遇，即使在同一職位上，女人也經常承受薪資勞務性別化之苦，被要求在性、情感、情緒上多所付出，如端茶送水、注意服飾儀容、保持性吸引力等等。我最近參加校內的校慶籌備會，某行政主管竟以其單位內女職員皆年過四十，



構，如種族、階級等。因此，在傳統社會中，當面指某男人為女人，對他而言是極大的羞辱，而「巾幘蒙

見不得人，而要求校方改派女學生擔任慶典的接待工作。此舉除了反映對女性薪資勞務的特殊要求，也

真正的新好男人
是拒絕性別對立，
拒享性別特權，而不齒做「男人」的。

進而以年齡來分化和層級化女人，當年齡為男人帶來智慧和升遷時，卻往往構成女人的致命傷。這種種歧視、特殊要求以及以人類無法抗拒的年齡增長來貶抑女人，都可視為性剝削，卻是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常態。

固然社會性別所隱含的權力關係並非個人可以參與分配，亦不應歸咎於個別男人，然而無可否認的，男人與女人都是社會關係網路中的產物，經過性別社會化的洗禮，而發展出性別意識，在父權社會中，男性在性別上居於優勢地位，相對擁有經濟、思想和政治上較高的權力，與女性相較，可以說分屬不同的階級。

諸多西方女性主義者曾經從唯物論觀點來分析女性的階級屬性。性別和種族一樣，雖然被視為明顯可察的天生特質，先於理性，屬於

自然秩序，但是我們所察得的印象，其實不過是一種想像的建構，我們經由關係網路去看身體特徵，然後用想像的組合來加以解釋。如同在以黑人為奴的社會經濟制度出現以前，現代意義的種族觀念並不存在，「男人」和「女人」的區分也不過是政治和經濟上的類別，換言之，女人是屬於和依賴男人的，而男人則是有權支配至少一個女人的人。不過這種關係雖奉行甚廣甚久，卻非永恆不變，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的婦女運動便不斷挑戰這種權力結構，其後男女同性戀者的現身也使得傳統的性別二分法、與性別相關的法規制度以及性別角色期望面臨了空前考驗，而不得不有所調整或轉換。

男女之別既是二分法之下特殊權力關係的產物，二者處於相對位置，一旦「男人」這個階級消失了，「女人」作為階級也必然不存，因為沒有主人就不再有奴隸。固然在奴隸社會中，仍然可以尋獲少數「好主人」，然而再好的主奴關係仍是建立在壓迫和宰制之上，以奴隸制度的本質而言，我們不能也不應奢望有好的、人性化的奴隸制度。同樣的，建立在尊卑主從關係之上的父權制度和因而衍生的男女之別，即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使略做粉飾，從舊父權過渡到新父權，舊男人過渡到新男人，若「主人」或「男人」此一類別或階級不徹底消失，仍難以脫胎換骨，確保平等互重的人際關係。

「新好男人」的出現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顯示女性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提升，因為標榜自己為「新好男人」具有討好、籠絡、收買女性的功能，為「舊男

人」所不屑為，也不必為。吊詭的是，即使有人自己貼金，「新好男人」其實並不存在，就好像自誇道德零缺點者其實可能缺點泛濫。若真有所謂「新好男人」，也只是相對於「舊男人」而言，「新好男人」的標籤最多只足以讓略別於舊男人者沾沾自喜，因為真正的新好男人是拒絕性別對立，拒享性別特權，而不齒做「男人」的。

新好丈夫·新好父親守則15小條

1. 自己姓林，太太姓姚，幫孩子取名姚某某。
2. 小便前會掀起馬桶蓋，完後再將馬桶蓋蓋回去，或，坐著小便。
3. 褲了衣褲，勃勃興起時，太太說：「今天不想」，會撒嬌：「好啦好啦，我幫你按摩嘛！」若太太實在沒「性」趣，也婉然接受：「那明天一定要唷！」。
4. 願意試試太太發明的新花樣(床上的，不是餐桌上的)。
5. 與太太平分家務：你洗衣，我煮飯；你套被，我燙衣；你掃地，我拖地；你沖牛奶，我換尿布。
6. 與另一半共享夫妻之樂者：你抽煙，我喝酒；你長舌，我碎嘴；你叫床，我叫春；你打牌，我插花；你洗澡，我偷看；你讀《反挫》，我唸波娃。
7. 太太經痛，懂得倒杯熱水拿止痛藥給太太服用，並且，將哥兒們放一邊，不怕他們取笑，陪太太到一旁休息。
8. 主動申請育嬰假；不要求另一半照顧自己生病的父母。
9. 以此為座右銘：太太不孕又怎樣！兩人世界才逍遙！
 不生兒子又怎樣！只有女兒照樣寶！
10. 配合太太、女兒參加女性主義課程或婦運集會，請假在家帶小朋友。
11. 太太的收入比自己高、名氣比自己盛，深感驕傲，與有榮焉。
12. 給女兒和兒子一樣的一個可以上鎖的房間。
13. 發現女兒和女生在談戀愛，送她一年份的《女朋友》以及《愛報》、《騷動》當生日禮物。
14. 感覺女兒可能開始有性行為，把《愛要怎麼做》還有《婦女成長資源手冊》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
15. 女兒決定離婚或選擇不婚都尊重她並且全力支持。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分離主義式的啟蒙經驗

小學四年級，我跟我媽媽一起看「婦女雜誌」，看到許多悲慘女人的故事，她們會寫信到某個信箱，跟××夫人訴說婆媳問題、丈夫外遇、遇人不淑、子女忤逆諸多類似社會新聞般的倫理親情大悲劇。從這些故事裡，我堅信這是一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而且決心要奮發向上，當一個經濟獨立、生活自主的女人。我一直以為男女不平等是個人的問題，直到讀了大學，參加女性問題研究社，才發現原來男女不平等不單單是個人問題，而是一個複雜的結構問題，這個複雜的結構有一個專有名詞，英文是patriarchy，中文叫做「父權」。像我這種剛烈女子，開始發現原來重男輕女和父系繼承制有關，原來就業上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分工環環相扣，原來我媽罵我「站沒站相，坐沒坐相」是因為性別刻板印象的緣故。我開始「發瘋」，只要聽到任何可能有性別歧視的動詞或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形容詞，心跳加快，嗓門提高，很生氣地反駁。上課時，很想奪門而出，教科書上的大師全是男人，他們有時還會不經意透露出鄙視女人的觀點，更別說課堂上的老師喜歡在口頭上吃女同學豆腐，或

也關乎「新男性」 在運動中時時調整與體制的距離

勸女生早點把自己推銷出去。當你在父權體系下發瘋的時候，不明就裡的人真的會把你當瘋子，同情你的人會認命地要你別把自己搞成被迫害妄想症。幸好在女研社裡面有人正在發瘋，有人已經瘋過了，純女性的經驗交換、同情和支持，讓我相信是這個體制有病，不是我有問題。發過瘋就像出過疹子，雖然不一定終生免疫，至少暫時對父權體制有一定的抵抗力，開始思考自己如何面對現實，如何施力攬局。我必須承認，培養女人面對父權體制的能力，分離主義的氛圍確是育苗溫床，一株剛萌芽的植物在光線、濕度和養分被適度控制的條件下，慢慢茁壯，直到它可以移植到外面的土壤。

男賓止步乎？

純女性團體重讀女人的生命，舉證父權的壓迫，這有點像是在父權大傘下，秘密謀反的女人結社。女研社幾乎每一屆或多或少都曾討論要不要招收男社員這個問題。除了有些惡意的男同學想藉著參加社團偷窺、指導這些女性主義者，會很快地被拒絕外，也不乏認同性別解放的男生想在女研社找尋認同和歸屬，但是主客觀條件往往都難以配合。一方面，男女在性別社會化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男性同樣可以加入性別解放的戰場，可是，同樣地必須發展出男性主體、經驗和慾望的解放論述，而不是在女性主義的團體裡認乾媽。

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

過程中的經驗很不相同，難以在同一个層次上進行討論，另一方面，有些男生將女性主義當成知識興趣或論述練習，自外於本身的經驗，或是不輕易在團體中剖析自己在性別權力系統中的位階，即使他不是以指導姿態自居，都會讓人感覺像「藏鏡人」一般不舒服。從社團有限的資源來考量，女研社多半無法負擔男社員參與的成本，選擇以女性為優先組織的對象。如果撇去社團資源有限的條件不說，一群女人想組個女性主義讀書會時，也會產生男生可不可以參加的類似問題。當女性主義被當成客觀化的知識或論述時，好像不能拒絕男生參加，但是，不可忽視現實的性別權力關係依然在其中作用。讀書會的討論過程並不是客觀討論知識的過程，許多女人的經驗或觀點會在相互言談之間撞擊，男性很難參與或是認同女人的經驗，因為問題意識和方向不一樣。女人談論被要求做家事的經驗，男人向來是被母親或姊妹服務的對象；女人談論性騷擾，男人覺得自己被指為共犯結構。男女各自在不同的性別權力位階上，在還沒有建立主體認同的階段就混在一起，反而衍生出其他的問題。有一次，我曾參加一個男女成員皆有的

讀書會，討論空間專業中的女性議題。結果，討論過程中，男性成員有幾種反應：有一種人覺得自己被指為共犯結構，但是他在經驗上不覺得自己是，產生很大的焦慮和負面情緒，反而要女性成員安撫他；另一種人「遠遠地」認同女性主義，不透露自己的經驗或是剖析自己；也有人無法進入討論，而是採用告解的方式，標明自己立場。會後，幾個女生只好又另闢戰場，自己討論。我們對這些男生的建議是，他們最好自己組成「讀女性主義的男性成長團體（或讀書會）」。這倒不是基於生物本質的劃分，而是因為男女的確存在不同的問題意識，女性主義是以女性主體、經驗和慾望發展出來的運動論述，男性同樣可以加入性別解放的戰場，可是，同樣地必須發展出男性主體、經驗和慾望的解放論述，而不是在女性主義的團體裡認乾媽，把責任和問題又丟給女人。

實際與策略的分與合

在隔離政策與分離主義的氛圍下，女研社在父權體制下擠壓出小小的空氣泡泡，讓我有機會培養從這個泡泡看外面世界的自信和勇氣。當我踏出女研社，空氣泡泡就不见了。透過女研社的經驗建立女

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這以下動詞對異
者提出問題時的對話，是何。舉
而，做錯選擇的發問時的對話，是主
。做錯選擇的發問時的對話，是不

人主體的認同，進入無所不在的父權體系中，女人的主體必須有各種戰鬥方式，或正面砲轟，或側面偷襲，或以退為進，或打遊擊戰，知道隨時調整與父權適當的距離，既不會分不到資源，也不會變成狗腿。父權的作用轉譯成現實中細緻的形式，而且，現實的大環境也在改變：以前，家庭暴力是「床頭吵，床尾和」的家務事，現在，這可變成公共議題了；以前生養小孩自家想辦法，現在每次選舉講到婦女政策，托育政策少不了。以前在街頭遊行抗爭的人，有的已成為政治人物的幕僚或政務官了。以往婦運的論述將私領域(家庭)的議題推向制度面，而今這些議題逐年來由公共政策吸納，在婦運論述的場域上也慢慢失去運動能量。

在婦運陣營中，會有不同立場和優先順序的選擇。是要勾畫一個男女共治的藍圖，還是要永遠不向父權妥協呢？要不要和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合作，或是拒絕國家資源的收編呢？要不要透過選舉進入目前的政治場域，亦或是堅持社會運動的路線呢？這些問題正在發生，而且會一直衍生。面對不同時期外在環境的條件，在策略上會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後來發現，現實中並

沒有一個純粹的戰鬥場域是建立在男／女、宰制／被宰制二分的本質對立關係，也永遠不會有這麼一個空間。父權體系有很多變身變形，我們必須策略地在不同時空中進行不同的結盟與對立。

Moser(1993)提出性別規劃的概念，將婦女的需求分成兩類，一類是實際需求，一類是策略需求。前者是指滿足當前社會條件下婦女的性別角色產生的需求，像婦女被要求做家事、養育子女，她需要可及的服務設施和完善的托育制度。策略需求則是可以改變當前性別分工產生的需求，比方立法讓丈夫負擔家務工作。實際需求讓婦女在父權體系下能獲得資源，達成其性別角色；策略需求則顛覆原有的性別邏輯。女性主義的解放運動既要鬆動父權體系，就必須在現實著力，依條件做不同的選擇。在Moser現實與策略的層次背後，其立場是以女人的利益為準。但是，不同女人主體間的利益並不相同，階段性的目標和侷限也不一。現在婦女團體推動的修法或權利議題，很大一部份是基於婦女實際需求的需要，例如修改民法，讓已婚女人在婚姻中可以得到合理的權益和保障，廢除服務業的單身和禁孕條款，是為了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實際需求下一步必須配合策略需求，改變當前的性別分工和歧視，方能挑戰現實中父權的吸納和滲透。

保障婦女在就業上的平等權，反性騷擾是要保障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實際需求是為了謀求資源弱勢者在現階段處境的改善，並非終極的運動立場，所以，修民法不是擁護家庭主義，而是讓選擇進入婚姻的婦女擁有基本的權利，反單身和禁孕條款也不是鼓勵女人負擔妻母之職，而是讓她可以擁有平等的選擇權，反性騷擾不是要禁錮女人的身體，而是女人有權說不。實際需求下一步必須配合策略需求，改變當前的性別分工和歧視，方能挑戰現實中父權的吸納和滲透。如果國家完成反性騷擾的立法工作，那我們

得更進一步連結情慾解放論述，讓女人擁有身體自主權；當托育變成公共政策，那我們還得更進一步要求解放母職壓迫的機制。實際需求與策略需求是不同階段的一體，單從實際需求著手，忽略訴求本身對父權體制的挑戰，只注重策略性需求，難以突破現實資源的侷限。我想，不同利益主體女人的對話和辯論的過程還是很重要的，針對實際需求與策略需求不斷進行思辯，思考如何處理現實與立場的落差，才會曉得現在站在那裡，下一步要怎麼做。

新好朋友 · 新好同事守則八小條

1. 聚會中男同儕語露性別歧視時，會氣憤地制止：「你這樣令我非常不舒服」，而不是機巧地看著在座其他女性說：「妳們女性主義者趕快教訓教訓他」。
2. 女同事出面檢舉新榕生之流等職場色狼時，願意為她作證。
3. 在可靠、自在的情境下，與女朋友們分享自己曾遭遇的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經驗和感受。
4. 送香水給她，為祝賀她陞遷，而不是為了要追求她。
5. 與她們站在同一陣線向老板爭取同工同酬與平等陞遷的待遇。
6. 充當臨時保姆幫她帶小孩，讓她和丈夫或情人渡過一個美好浪漫的周末。（事後可以敲她一頓，並詳追細節）
7. 女朋友們請你幫忙搬東西，不會趁機調侃：「你們新女性不是要獨立自主嗎？」或一邊展現肌力一邊嘟嚷：「看吧！沒有男人還是不行的」
8. 與老闆同桌討論公事，老闆吩咐會計：「陳小姐，能不能請妳煮一壺咖啡」時，會主動提：「我會煮咖啡，我來好了。」

只有他是永恆的
最佳男主角

「(新)好男人」在廣告、政治文宣等應用領域，和在副刊評論、意見投書領域的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前者還可視為男性角色的重新定位；後者則是未加檢驗地自己扮演起「好男人」，以好男人姿態發言。他們所見的不是本身正當性的可疑，而是好男人所被賦予的廣大的發言自由。因此，這些男人的性別談論往往重點不在批判性別的不平等，而在批判女性、批判婦運。他們所關注的不是自身的改善，而是周遭情境對自己的不公，而性別革命本身即可能是這種不滿的主要來源。他們迴避將自己放在性別革命的矛頭下，直接面對衝突，而是側過一邊，繞到婦女和婦運者的後方來，著手教她們如何搞一場合他心意的婦運，在這避過風頭的安全位置上，以貌似誠懇的建言遂行對女人和婦運的分化和批判。

(新)好男人的「新」，在這裡適足顯示其舊。好男人論述的媒體位置，把性別革命的世紀血淚奮鬥轉化為一場遲來的認祖歸宗。它不僅宣稱男性在性別革命中有份，並且，像一個被惡親戚長期霸占家產的流浪嫡長子，好男人回到這座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必須屬於他的城堡，宣稱男性在性別革命和隨之曝

現的父權底下的雙重受難，受難放逐的代價則是醒覺到自己才是這場性別革命的真正主人。對(新)好男人而言，女人改變可能不再是大逆不道，而只是為了變得更聰明強壯，能夠一切自理不來煩他；還有人對新女性的想像是，女性自我變革是為了讓男人偶爾可以趴在她肩上哭泣。這些人似乎沒有想過，如果性別革命只是為了弄溼肩膀，她們何不給自己省點事，回家晾衣服去就行了。

這些以好男人自居所發表的論述因此不是一場性別革命的投誠，對任何優勢位置的鬆動也沒有多大幫助，只是男性擠退女人、占據媒體焦點、自任性別革命唯一主角的自我中心表演。在他們的視界中，「夠格的」婦運並不存在，唯一的性別革命只在他們的想像中發生——那場由他策畫、指揮，準備大獲全勝的平等之戰。在那裡，只有他是永恆的最佳男主角。

(新)好男人論述中，即使最封建的打壓，也是以一種明理諍言的形式出現。其途徑往往是先肯定性別不平等的存在，卻否定性別抗爭。行文間令人誤以為性別抗爭是性別衝突最大的源頭，一旦婦女放棄抗爭，社會便逐漸臻於平等和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在他們的視界中，「夠格的」婦運並不存在，唯一的性別革命只在他們的想像中發生——那場由他策畫、指揮，準備大獲全勝的平等之戰。在那裡，只有他是永恆的最佳男主角。

諧。彭懷真解釋反挫原因的說法正是著例。他表示，「何以女權常常要面對反挫？或許正因為許多人仍不乏以『敵一我』觀念思考。既然是『敵一我』，就要勢不兩立，就要有一方獲勝，那男人怎麼會輕易放棄他已獲得的優勢呢？女人若向男人宣戰，男人豈有逃脫避戰的可能？」（聯合報八四、三、七〈女權反挫，來自敵我觀念對立〉）

引人注意的不是作者以「女性『挑釁』——男人豈有逃脫避戰的可能」此一說法來逃避男性在性別體制中的優勢與在性別變革中的責任，把改革當作另一種女性專屬的勞務並合理化沙豬的反挫，而是他對於「性別對立」的根本看法。他以一種看似誠懇逼近其實無賴的態度，在「我們就假裝真有性別不平等這回事好了」的前提下，告訴婦女說，「反挫」一詞一脫口就說穿了兩性的對

立，所以爭女權、反反挫是能做不能說的，以免激起男性的警覺，導致徹底失敗。

這種思維不僅繼續對女性施以小媳婦式的催眠，警告她們男人是她們惹不起的，一旦決裂就要她們吃不了兜著走，同時也是一種偽裝懷柔的裏脣欺騙。它以「談反挫將招致性別迫害」的說法，佈下了「不談反挫就沒有反挫」的隱形許諾，卻註定是個謊言。而繼「不能說」的禁令之後，作者也繼續對婦運「不能做」的範圍提出貢獻。他並未表示婦運只要不「說」，就可以偷偷「做」任何事，情況恰巧相反。

他在同一篇文章接著指婦運「訴求者模糊焦點」，「有些人卻舉起『不要性騷擾，要性高潮』的牌子，讓人看傻了眼」，令「原本同意反性騷擾的人被迫也不講話了，免得別人以為他或她公然贊成『要性高潮』」。在此，婦運本身取代了其所向來對抗的父權體制，成為真正的白色恐怖——人們不敢「公然贊成」某項主張竟然不是因為父權凝視，而是因為婦運者把不同但相關的兩項主張兜在一起。性別壓迫的罪魁是父權還是婦運，可想而知。

作者認為婦運的另一罪狀是「太偏重特定案例的訴求」，並表示：

「其實，這幾件案例都有爭議，不易獲得大眾的同情，鄧如雯固然被虐待，但弑夫是事實；李璇的身份特殊，難獲認可；師大案例是事隔一年多才提出來」…。文中所列舉的條件與當事人受害的經驗根本是兩回事，我們倒沒見過作者在企業家被搶、被綁架時義正詞嚴地怪他是奸商。

作者還指責婦運「以將家庭和婚姻瓦解為代價」、「擴大了攻擊面，樹敵太多」。總結起來，可歸納出三條「彭氏運動定律」：不要搞個案、不要搞組織訴求、不要定位強勢和劣勢界線。以扼殺運動空間的建議來代替現實運動，足見其對性別革命的想像多麼不進入狀況。

而(新)好男人中從來不缺乏這類建言者，其最大的功能就是混淆運動議題、逃避運動責任。亮軒對婦女團體於婦女節呼籲婦女們罷工、罷課、罷煮的反應(中時晚報八四、三、七〈非關男女〉)很能說明這兩種功能是如何編織在一起。

作者先以「女性條款的偏頗」證實婦女權益確實不受重視，接著說明，「我們的法律有了問題，絕不是男人聯手故意搞出來的，是政客不負責任的結果」，並說，「以侵害女性的權益換來的男性形象，有骨氣

的男人寧願不要」，接著又表示，「不是男人」造成法律不公，「真正男人」不會如此。父權體制中男人的現實責任在他的理想男性論述下可說開脫得一乾二淨。

作者也指出，「對於一半人口不公平的法律，其造成的問題，絕不可能讓另一半人口一點事都沒有」，所以，男人也應該支持法律的公平化。但他卻先接上一句「如果罷這個罷那個有用的話，為什麼男人不可以參加？」自外於運動又擺出一副「都是妳們擋著我革命大路」的態度，絲毫不讓彭懷真專美於前。在作者心目中，男性支持婦運的途徑說穿了只是「我們的婦女團體快把這些政客的名字給記下來，在選舉的時候就給他們大大的公佈公佈，讓他們知道女人和愛女人的男人的厲害。男性的運動責任遂被簡化成一張不甚可靠的選票。

讓我進一步檢驗一下作者將性別問題縮減成法律問題的效果。作者肯定罷工「是以阻礙生產力來作為爭取權利的手段，能使整個社會重視這個問題」，卻指罷煮「不可思議」，徒令煮婦心疼外食的浪費或家人不悅。將罷工和罷煮截然二分，擡明了作者將婦女家務去勞動化的態度。在作者的想像之中，性別問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它們聲稱過去女性有多悲慘，現在的男性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部份以(新)好男人自居者，正是以這種自我恐嚇在抗拒讓步和改革。

題似乎只是公領域的法律、選舉、工作問題，而從沒有機會存在家庭中，

成為炊煮活動本身。這解釋了作者何以相信自己(及其他「好愛女人的男人」)在性別問題上毫無責任，因為公領域的法律不公「不是男人」造成的；而在私領域裡，對他來說則根本沒有性別問題。沒有責任，就沒有行動，唯一的行動責任在於女人，她們應該好好煮飯餵飽男人。

議題被混淆，責任便得以逃脫，作者若將法律不平等當作性別不平等的指標，是正確的，但若將它當作性別不平等的全部，就會出現這樣的混淆。

這些亮軒所說的「好愛女人的男人」以同盟姿態要索被威脅的既得利益，其如同彭文一般，在論述過程中進一步收緊性別運動的空間。為性別抗爭圈定範圍，等於在性別迫害之處扼殺歧視的事實與女人團結自救的希望。

除了指揮婦運、自我卸責外，這些(姑且讓我命名為)「新保守男性」還往往以體恤婦女之名，假婦女心態發言。而其表面對婦女的同情，終究只是以婦女處境的悲慘來襯托男性的更為悲苦可憐。嚴武敬對未婚生子現象的思考，就反映出

這種錯亂的男性自憐。(聯合報八四、一、廿一〈男人真的這麼差嗎〉)

根據主計處的資料，非婚生嬰兒在八十二年度已突破七千三百人，嚴先生為文對此現象表示好奇：「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女人要孩子不要男人？台灣的男人是不是常常不如孩子？」三段式推論極盡跳躍荒謬。大部份非婚生子女可能是未辦結婚登記的同居男女所出，跟女人「要孩子不要男人」沒有什麼關係，以此引申出男性比子女還弱勢，已是性別變革中男性被迫害妄想症的登峰造極。

這類論述竊取了女性受壓迫的歷史，一方面承認其存在，卻將其視為逝去的、已不再真實的東西，而當下的真實只有男性在情勢逆轉下遭受的迫害。它們聲稱過去女性有多悲慘，現在的男性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還沒有，不久的將來也會實現。部份以(新)好男人自居者，正是以這種自我恐嚇在抗拒讓步和改革。手中擁抱的資源越多，越令其恐懼資源被剝奪、流亡的不可見明日，於是，他們反過來將傳統剝奪女性的制度和習慣當做正常，並愈發對此沒有罪惡感。

說「新好男人」太輕易

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原因很簡單。雖然我完全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但從「政治壓迫」的角度來看，男人和女人所處的物質條件確實很不一樣。舉個例子，我從未有夜半三點走在路上害怕被強姦的感覺，因為公共空間(the public)「就是」男人的世界。如果男人和女人，即使在走路的空間上，已經佔有如此不平等的位置，對我這樣一種既得利益者——男人，特別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男人——來說，去說自己是個「女性主義者」未免太容易、太簡單、也太輕鬆了。甚且，做這樣的自我宣稱也許會更加強我既得的優勢。

一個男人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或說自己是「新好男人」、是「進步男人」，會令我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那令我覺得，當女人剛剛開始爭取自己的發言權，開始擁有生存的空間，建立主體的時候，其它既得利益者馬上覺得受到威脅，趕忙要加強自己的空間。

此外，對一個女人來說，女性的身分認同必須歷經很長很長的過程，對個人而言更是痛苦而沈重的掙扎(struggle)才得以建立。因此我認為：身分是一件很重要、很敏感的事，是不容任何一個既得利益者濫用的。

當然，身分本身不必然有某種固定內容或本質，端看人如何使用它。一個男人宣稱自己是一個「進步男人」或一個「新好男人」，有什麼意義呢？以此寫一篇學術性的論述，與用自己的身體、生命來講自己的經驗、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前者，用傳統masculine的男性論述方法寫一篇論文來界定什麼是「新好男人」、什麼是「新男性」，很容易陷入defense mechanism，陷入一種自我辯護的身段——我不需要思考我自己的身體，我不需要將我自己的身體放出來，我只需要在概念上領導、教育其他人等等。

對話的對象也很重要。你是對一群女性主義者說「我是新好男人」，還是對著傳統的異性戀男人



新好男性運動者守則9小條

說「我是一個新好男人」？我個人認為，如果是前者，則居心叵測，是絕對不應該這樣做的。但若在面對一群傳統男人時做此一宣稱，則可能引起他們不舒服的反彈，他們甚至可能要對你破口大罵——什麼新好男人哪？！我們不好嗎？！男人有什麼不好啊！女人問題那麼多，小氣，又善妒…。你會發現整個power relation(權力關係)將完全顛倒過來。在這樣一種情境下，你無法再隨便享有傳統男人的既得利益。

簡而言之，「身分」的提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政治條件下，會有不同的效果。重點在於，如何避免這些身分遭到誤用、濫用，變成某種流行、商業化的東西，被簡化成一種消費行為。

(以上文字摘錄自香港同志文化論述者周華山的一段談話。該談話出自〈顛覆身分政治〉，是96年3月1日於女書店與本地女性主義者何春蕤的一場對話)

- 1.相信男女不平等，並願意付諸行動改變它。
- 2.不拿愛家、愛妻、愛子來標榜自己。
- 3.當性別議題成為熱門話題時，不會覺得受威脅而感到焦慮萬分。
- 4.不會老是在問「婦運中男人的位置在哪裡？」
- 5.遊行行進中，女人高喊「女人連線·反性騷擾！」時，不會抱怨：「那男人呢？」
- 6.支持女人罷煮、罷工、罷性以爭取權利，包括自己的媽媽、太太、姊妹、同事、助理等。
- 7.認清男性是父權結構下的得利者，願意接受婦運指導。
- 8.為配合彰顯女性主體，願意著女裝參加婦運的街頭行動。
- 9.支持女人成為婦女運動者。



男作家與丈夫的「新」男性論述

新好男人論述在本地可說因為空間相當大，而保有廣闊的多元性。基本上，媒體中任何關於性別或性的男性談論，只要不是明目張膽痛斥性別革命的，都可以被劃歸「新好男人」或「新男性」的範圍。媒體非常慷慨地，根據它所預約的論述內容，提前給予論述和作者雙重的肯定：你是新好男人，請你談一談新好男人；或者，請談一談新好男人，你就被認定為新好男人。兩者完全是二而一的。

媒體的寬容再一次顯示了社會的雙重標準：過去(乃至於現在)女性要獲得成就，和男性同樣努力是不夠的，她必須比男性更強。現在情況又重現於論述市場。某些在廿餘年前便被說了又說的性別革命基本理念，在改革過程中並沒有太多機會登上媒體檯面，而如今它們已成為常識，不再足以支撐任何女性藉著重述它們在媒體曝光露臉，但媒體卻急於動員任何男性來為它們背書。彷彿即使在性別革命的場域中，女人說的仍然像在其餘地方一樣全不作數，僅渴盼著從男性嘴裡聽到它們被重述，如此這些已為人接受的基本理念似乎才得以在文本世界中落籍定位。

中時晚報時代版的一系列新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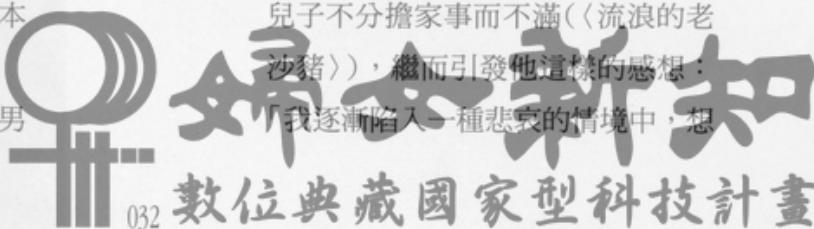
性論述，既不是那麼明顯地保守，也未激進到有任何驚世駭俗之處，其生活化的取向使我們很容易從中察覺新男性的社會位置和其採取的策略。

黃絲訪問畫家李民中的〈不要拿沖天炮射我的眼睛〉中，李民中提到，「可能因為已經結婚了，又從來沒被太太『烤問』過」，「所以他口中的『新男性』，一半以上的意思指的是『長大的男性』」。

前半段意味著「已婚」是男人的一項安全保障，因為「已婚」女人似乎是沒籌碼跟男人談性別問題的；而太太賢淑地不加「烤問」，似也意味著已婚女人不像想像中的女權份子般無聊好鬥。因此畫家作為一個已婚男人，即使在「口頭上」也不必妥協太多，連實不至的口惠都可以省了。所以李民中的新男性想像是毫無性別反省色彩的：「結合了電影超人、彼得潘那種特質的人，內心又要強得像阿諾。」簡言之，一個鐵約翰。

而小野則展現了一種精緻的懷柔，雖然還是粗糙得會把女人磨得皮開肉綻淌血不已。他敘述妻子為兒子不分擔家事而不滿(〈流浪的老沙豬〉)，繼而引發他這樣的感想：

「我逐漸陷入一種悲哀的情境中，想



到老婆常常提到童年成長中對歧視的敏感，想到老婆對於整個社會從法律到習俗中壓抑女性的不滿」……但如此的認知和了解，竟未指向想當然耳的理解同情，卻突然一轉為尖刻攻擊：「一個童年被壓抑過的女孩長大以後，是不是很容易壓抑別人？」

女性的開放與交心，徒然授新男性以冷不防誣陷的把柄，邏輯的歪曲使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小野進而訴諸父子間的共謀敷衍，如「我和兒子相視而笑。我小聲的說：『樣子一定要做足來，至少可以保證一天的安靜』」；或另一次「『女人要的是感覺，只要把感覺做出來就對了』」。可見這類新男性以懷柔表面工夫愚弄女人自矜的心態。他們不僅有辦法裝佯作勢逃避家務還同時逗她開心，甚至，在整場玩弄的程序之中也再一次傷害身邊的女人。這種男人唯一有別於上一代的是：上一代的大男人控制婦女的行動、身體自由；而他們則以操弄其情緒於股掌間而自豪：「我能叫妳哭，也能馬上讓妳笑！」婦女則仍然是男性競技、傳承的獵物。

本地慣見的悲情政治，也在新男性身上出現了新的性別版本，可憐性別變革中難為的男性。李清志

在〈偷走超人的面具〉中指稱「當女性主義抬頭，甚至烈焰高張之際，新男人必須時刻壓抑自己，深怕自己一不小心言語動作得罪了女權鬥士，被冠以『大男人』的罪名。在這種處處被壓制的情境下，久而久之，新男性逐漸畏縮、隱居在都市中自我的小城堡裡」。晏山農的〈男性其實不必那苦〉也表示：「男性必須承認加諸其上的社會、歷史壓力實在太沈重了」。與其說他們也自稱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不如說他們自認是一種叫女性主義的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更進一步，李清志認為新男性「不再像以前大男人般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妄為，而必須奮鬥努力去維護並爭取兩性和諧關係，正如〈終極警探〉電影中，布魯斯威利千辛萬苦方得以維繫夫妻感情一樣。」這很接近晏山農所言「由男女共同承挑重擔的新思潮」。「爭取兩性和諧關係」突然又成了男性光榮的負擔和功勞。在此新男性自我任命為和平使者，負責終結女權份子挑起的無謂戰火，恢復「正常兩性關係」。

蔡詩萍在聯合文學「好男人講義」專欄的首篇〈我是好男人〉一文中也解釋，「我們卻是需要『好男人』的」，因為「大男人遇上大女

「新男性」最大的問題，在此顯明它往往不是一種反省而是一種嶄新的獲利途徑。

人，就像決定正面對撞的兩輛疾駛快車，最好情況是毀了對方，但最壞情況，是彼此全毀。對撞以前，何不讓好男人登場，試著走出一條向來以為不可能卻實實在在可以走得通的新出路呢！這類發展已非自我安慰，而是自我推銷，製造性別變革對「好男人」的需要。但是名目雖新，言必稱女權份子要「毀了對方」、「擾亂兩性既有的和諧秩序」，委實看不出他們新在哪裡。若說他們是父權文化派出的最新一批和談使節，那麼顯然它所提出的協商條件廿年來並沒有根本的改變。

「新男性」最大的問題，在此顯明它往往不是一種反省而是一種嶄新的獲利途徑。他們不但透過新好男人形象的樹立遮掩性別污點和焦慮，也將男人在性別變革過程中初步的犧牲當作一種受難，凌駕於婦運的長期犧牲。

一反彼此位置，張成華訪問陳皎眉的一篇報導（自立早報〈女人爭取自身權益 男人何必不爽〉）即指，「許多的女人走出家庭，走入社會，卻沒有幾個男人敢返回家庭。當社會還沒有到達完全開放的階段，個人的改變得來的往往是懲罰而非補償」。這種得了便宜還有得賣乖的後女性主義論述讓掌握媒體優

勢的男性找到發言正當性，敘述自己的被剝奪。一如中國時報記者鄒篤麒〈先做人，再做女人！〉的報導中所說的，「對於部份女性主義者的論述，特別是對於性愛和情感自主性的要求，花蓮慈濟醫院醫師王浩威就以為這可能對台灣的男人產生相當大的衝擊，特別是那些較敏感的、帶點女性氣質的男性，或是對弱勢者向來心虛的男性知識份子。突然之間，要他們去接受這樣的事實揭露、自處恐怕是極其困難的」。

王浩威所指出的這種自命「較敏感、帶點女性氣質」的男性卻仍對女性無知到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揭露」，自命「對弱勢者向來心虛」卻仍在面對女性「性愛和情感自主性的要求」時感到難以自處。

在此，新男性的形象塑造遇上實際議題的表態，就徹底暴露出自打嘴巴的窘況，顯示新男性的貌似心虛實仍氣壯，以敏感之名遂行專制壟斷。所謂「女性氣質」的「敏感」、「心虛」，根本是一種無聊的收買。

除了偽裝刻板印象中的女人形象來收買女人，另一種策略是偽裝無知。楊照〈想像的身體〉一文將性騷擾歸因為「男性文化裡根本就沒有教男人如何去揣摩別人所設定的身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婦女新知

體疆界」，使男性混淆身體接觸中「愛意的表達」和「征服權力意志的遂行」兩種功能。他宣稱「『美貌』講究，畢竟不斷鼓勵女性正視自己的身體、想像自己的身體」，進而表示，「女性的身體想像越豐富、愈複雜，也就愈能夠發展出充分的身體訊號」。這段論述以虛構女性的身體全知進而虛構女性的全能，再以女性的全能反襯男性身體的無能，再將男性全部的錯誤收束在身體的無知上，是一場完美的脫罪。

實際上，我們知道美貌神話下的女性並非被鼓勵正視自己的身體，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到厭食的、豐胸的標準身體上，其對自己的身體可能無知，也可能是無能的。反之，男性以無知掩飾的是身體能動性被允許假釋的犯罪自由，他們對這種自由有無自覺並不重要，因為決定兩性身體自由消長幅度的，在此並非知識而是權力。有知或無知，並不能影響他自由操控這種生而有之的權力。

如果還有比偽裝無知更壞的，那就是炫耀無知。蔡康永的〈鏡子拒絕我的臉〉一文倚賴著他對村上春樹反智層面的片面理解，進一步地炫耀「反智」和「反女人」。對於「新男性」這項美稱，與其欣然迎前以示平

等心態，不如扭頭呸一聲更顯身份崇高，其崇高是「新男性」這個人們追逐的封號所不可追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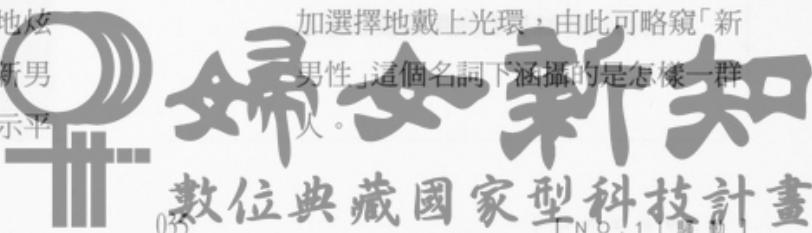
「早晨起床，對著鏡子很勇敢地大喊一聲：『赫！今天開始，做一個新男人吧！』」

「鏡子裡，出現了村上春樹。」

以虛構女性的身體全知進而虛構女性的全能，再以女性的全能反襯男性身體的無能，再將男性全部的錯誤收束在身體的無知上，是一場完美的脫罪。

藉由宣稱「村上春樹」和第一人稱的「我」，都硬被蓋上「新男性」的郵戳，作者充分表達了他被定位為新男性的屈尊，和既然連他崇拜不已的村上都會被蓋上郵戳，他也何妨陪村上一起倒霉的遷就。這種遷就，就好像是常見的那種自己想上廁所，卻硬要說成對方很想上，「那就委屈一下陪你去上好了」的人。

這種徹底鄙夷新男性性別妥協色彩(向女人妥協？)的作者，也會被寬容地納入新男性的陣營中，不加選擇地戴上光環，由此可略窺「新男性」這個名詞下涵攝的是怎樣一群人。



新好男人的表演漏洞百出，或可歸於此一名詞出現時，在通俗論述中的定義僅是沿著「男女關係」這個老問題，和「住家男人」此一舊有的形象前進。在「(新)好男人」的生

產過程和內涵呈現中，男作家和丈夫們加入了這兩重領域，卻不準備挺身平等地與女人承擔責任，而只是藉這個他們原先並不重視的場域重新鞏固男性霸權。

新好兒子・新好兄弟守則8小條：

1. 離得開「媽媽」，自理吃喝拉撒。
2. 鼓勵媽媽或大姊不必煮晚飯，充分休息或出外社交。
3. 支持並力行媽媽和姊妹所發起的「自己的碗筷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自己的房間自己理」運動。
4. 向父親力爭姊妹應該跟他繼承一樣多的家產。
5. 自己能夠上大學，要妹妹也能夠上大學；自己擁有一個獨立的房間，爭取姊姊和妹妹也各有一間；主動與姊姊均享爸爸送給自己的機車（如果無法再多要兩輛的話）。
6. 與姊姊站在同一陣線向父母爭取女兒夜歸或外宿的權利。
7. 姊姊或妹妹年過三十，決定不婚，絕不和旁人同聲一氣地催婚，而是與她一起宣揚女人不婚的好處。
8. 能辨別一般、加長、超薄、夜安、衛生護墊等不同種類衛生棉之外觀、用途，並會幫忙媽媽、姊姊或妹妹買到她所需要的產品。



新男性：媽媽是女性主義者的男性

胡淑雯

從女性主義與婦運的角度看「新男性」的「運動前途」

如果要我用一個簡單的字眼來描述我對「新男性」的印象，那便是「焦慮」。是的，「新男性」是焦慮的。而他們所焦慮的，說到底，是害怕失去既得利益。這當然不是在說，「新男性」心存惡意，有計劃地想要消滅女性主義以繼續掌握男性在現有結構下被賦與的權力和資源，以便繼續享受利益；反之，我相信他們確實努力在思考「男人和女人之間到底怎麼了？」這個問題，只不過，被女性主義者指著鼻子批判是「壓迫者」、是「父權結構的共犯」，令這些「新男性」們感到萬分不自在，他們尤其害怕的是，女人從此不再像以前那樣愛他們了。為了要贏回女人對男人的愛，他們努力撇清和父權體制的關係，於是創造了有別於「舊」男性、「壞男人」的「新男性」與「好」男人，然後，在「新男性」（而不是壓迫者）此一新身份下，對女人展開綿密而溫柔的告解，祈求諒解。正因為被「害怕失去女人寵愛」的焦慮感所纏繞，大部份「新男性」的論述傾向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檢討男性如何在父權體制下也被扭曲了人性。他們想，如果男人也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男人便不必為體制的惡負擔全責，兩性於是應該從對立走向和解，因為被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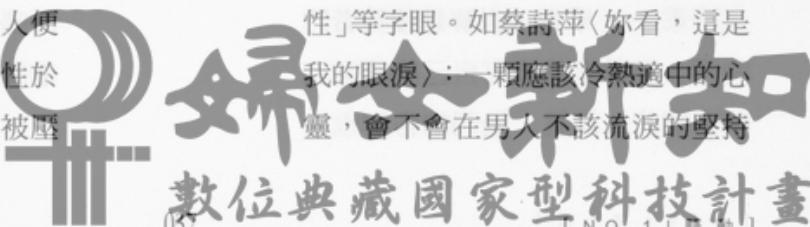
迫的處境既然共同，也當利益（生死）與共。

人性論，遂成為「新男性」反覆論述的母題。

「新男性」的「人性論」

許悔之〈男兒有淚應可彈〉可算作「新男性人性論」的經典。他以詩一般美麗而簡捷的語言控訴父權文化下，男性「壓抑情感、泯滅個人情緒」的痛苦，並指男人的飲酒文化即源自於此。他說，只有在「酒後迷離的時刻，藉著告解式的放聲痛哭」，男性才得以從「裝模作樣、道貌岸然，以及，所謂冷靜果敢」的天羅地網中暫時釋放出來。他於是鼓勵男人「敢於哭泣」，因此就比別人「更走近自己的天賦本能」；而這所謂「天賦本能」，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同時存在個人體內的「陰」與「陽」—「不要阻止自己遊走在陰陽的界面，在那個世界面之上，我們才會顯得豐富而完整」。

像許悔之這種動員眼淚，訴諸人性的說法，在「新男性論述」中算是最主流的。在他們所生產出來的文字中，我們不時讀到「眼淚」、「面具」、「心靈」、「感情」、「個性」等字眼。如蔡詩萍〈你看，這是我的眼淚〉：一顆應該冷熱適中的心靈，會不會在男人不該流淚的堅持



下，愈趨冷澀而枯萎呢？李清志〈偷走超人的面具〉：基本上，新男人是很孤獨的，也是承受極大壓力的。林旺（筆名）〈你的身體藏著一個躍躍欲動的女人〉：你最後一次流淚哭泣是什麼時候？為了什麼事？「新男性」學習讓自己哭。讓自己的感情主宰。王文典（筆名）〈追隨她的脚步？〉：大部分男人都吃了許多不必要的苦，壓抑自己真實的感覺。男人的成長過程，說穿了就是戴上一副面具，再努力相信這副面具就是自己的臉。以及曾陽晴〈男人，窩囊的動物！〉：讓我們都從男人和女人冥頑不化的身分中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的人。…

這些「新男性」們所說的都沒有錯，但我想進一步追問：証明了男性在父權結構下也遭受壓抑、人格被嚴重扭曲，接下來呢？

如果是為了召喚所有男性對性別解放的渴望，向宰制性的性別體制宣戰，那麼，「新男性」必須在談論了「人性」之後，進一步思考並提出具體的政治出路。否則，「新男性」不免還是利用了其男性的優勢媒體位置為自己開脫，所謂「得了便宜又賣乖」。（畢竟，告解是強勢者的特權，弱勢者是沒有自己的語言可供告解的，而且，她們的告解也沒

有人要聽）但遺憾的，這些「新男性」論述者多半對性別的「政治問題」顯得毫無能力。

許悔之的言談在「哭泣，勇敢地哭泣是為了完成自己」的激情中戛然而止；蔡詩萍僅忙著討好賣乖，順便自戀；林旺教男人學著「和朋友談論私事」以「有效讓體內非陽剛的質素流洩」；晏山農在感歎「男性其實不必那麼苦」之餘，同樣很抽象地指，「和新女性合作再造生機只在『一念之間』」，並樂觀地呼籲男性要「學著試做會哭會笑的新男性，撕掉假面、添加更多的人性」；李清志甚至重蹈「舊」男性的覆轍，把他所謂「重建兩性正常關係」的責任丟還給女人，要「聰明的女人」想辦法去摘下男性自我保護的面具。

這一類跨文化、超結構的人性（扭曲）論，不足以解釋任何宰制關係，放在性別革命的脈絡中簡直無用。試問：資本家利潤至上，視勞工為奴的心態，不扭曲嗎？漢人、白人歧視原住民、「有色」人種（白色非色？），其心不可悲嗎？而草菅千千萬萬人命造長城、建金字塔的帝王，其欲望難道不是扭曲而可悲的嗎？

道德勸說 不是革命

在分析上，這些「新男性」們和



新知
婦女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新男性」必須徹底反省自己以及所有男人與這個世界的物質關係，並且改變父權體制中主要權力和主要資源的分配方式。而這，具體地說，就是從事婦運(或性別解放運動)本身。

歷史上許多提倡道德重整運動的人士一樣，選擇性地著重唯心主義式的道德勸說，而避談男女人格、個性的養成與性別(階層)化的社會分工制度之間的關係。然而，這關係卻是絕對物質的。說來已是老生常談：男人在人格情緒上遭受的壓抑與犧牲，導向的是權力的獲得，反之，女人在性格與慾望上有別於男人的養成過程中，學習的是權力的渡讓。男人的「權」為他換得名氣，以及，紮紮實實的物質利益，而「壓力」理當是權勢者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勉強算是代價的話)。但女人的「無權」，使她甘於示弱，也使她身負赤裸裸的性別壓迫。因此，新男性若冀望解放個性，繼而擁有「完整的人性」，恐怕不是告解一番，激動地大哭一場或撕下面具就可能的，更不能寄望「一念之間」良心發現。「新男性」必須徹底反省自己以及所有男人與這個世界的物質關係，並且改變父權體制中主要權力和主要資源的分配方式。而這，具體地說，就是從事婦運(或性別解放運動)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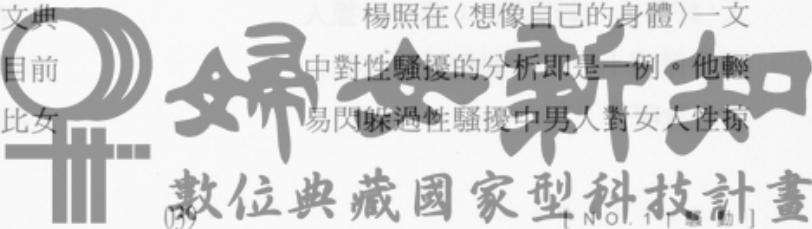
這一點反省，以「新男性」的聰明才智，當然不會想不到。王文典把話說得非常清楚。他說：在目前的父權結構裏，男人自然擁有比女

人較多的權力，也因此無法完全擺脫共犯的嫌疑，所以「新男性」應徹底覺悟：性別意識的轉換，永遠不可能在個人層次達成；除非這整個父權結構發生質的變化，否則「新男性」再怎麼新，還是免不了在扮演「壓迫者」的角色。王文典接著建議新男性：一、利用其父權安排上的有利地位，替新的性別意識開拓空間，不斷發聲滲透，拆解父權網路；二、利用「新男性」此一位置追求多樣性的性別角色，強調男性之間的分歧，鼓勵更多的男人走出傳統性別束縛。

針對開拓新的性別意識、拆解父權網路，「新男性」們由於佔據媒體優勢，曝光率很高，確實做了不少。平心而論，他們在性別議題上的言論都可以守得住底線，不致與沙豬同流，但再細緻一點看，「新男性」開拓與拆解的，仍十分有限。在他們所描繪的性別圖像前，聞不到一絲向父權宣戰的煙硝味，有時候，這個圖像還顯得過分地和諧，好似「男壓迫女」這回事其實不存在一般。

過分和諧的性別圖象與「獵人邏輯」

楊照在〈想像自己的身體〉一文中對性騷擾的分析即是一例。他輕易閃躲過性騷擾中男人對女人性掠



**「新男性」的論述正充斥著這一類「獵人邏輯」：欺負小紅帽
(女人)、要吞食小紅帽不吐骨頭的，是大野狼(壞男人、
舊男性)，不是獵人(好男人、新男性)；反之，獵人還會
保護小紅帽，解救她於危急存亡之秋呢！**

奪與權力控制的面向，而改採(以他自己的話說)「社會集體(集體歷史性)的角度」看男女身體想像共識的落差，以此來解釋性騷擾的發生。在楊照的分析下，性騷擾變成了男女之間性別化的養成結果下必然的某種細緻的誤會，成為所謂「社交風度」(social-grace)的問題；要解決這些「誤會」，楊照提議的方法居然是：「我們也許可以從身體想像、身體訓練上開發一些新的思考方向，幫助減少新的『性騷擾』事件的發生」。(楊照將「性騷擾」三個字加了括弧，暗示女人在生活、工作中指控的被性騷擾的經驗很多是言過其實、反應過度？)

性騷擾這樣一個經婦運耕耘多年，直指性別壓迫核心的議題，被「進步」的「新男性」導向類似生活與倫理的紳士訓練，恍然間令人誤以為回到前女性主義時代，真令人不習慣。

不習慣之餘，卻不覺得意外。因為「新男性」的論述正充斥著這一類「獵人邏輯」：欺負小紅帽(女人)、要吞食小紅帽不吐骨頭的，是大野狼(壞男人、舊男性)，不是獵人(好男人、新男性)；反之，獵人還會保護小紅帽，解救她於危急存亡之秋呢！

對這些優渥乾淨純潔白領中產的尖頭鰻(gentleman)「新男性」而言，諸如調查局官員強暴女秘書、政務官毆打老婆、男上司利用職權姦淫女職員、男受訪者一時興(性)起摸女記者大腿一把、男老師或男教授對女學生進行性勒索或性騷擾…等事情是「特例」、是「事件」，也因此十分遙遠。

因為陷在「獵人邏輯」裏，想像自己是獵人而非惡狼，「新男性」很難將目光投向父權體制的暴力性(實質的與象徵的)。對「新男性」來說，男男女女間日常生活每時每刻發生的小摩擦小衝突，是比較可能去想像與面對的(這點，女性主義者也從不否認)，但不同於女性主義者的是，「新男性」卻傾向將這些問題去政治化地解釋為溝通、誤解、懂不懂得相互尊重的個人問題，也因此無法在運動上、論述策略上與婦運、女性主義進行「進入狀況」的對話。

「獵人邏輯」同時使「新男性」有意無意間切斷了自己與父權體制間的臍帶，取消了自己與所有男人(他們眼中不同於「新」、「好」男人的男人)在結構上的共謀關係。但是，設若掌握了槍(射殺野狼的工具)的獵人向手無寸鐵的小紅帽要求：「做我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的老婆，幫我生小孩，否則我把妳送給另一隻大野狼」，小紅帽焉敢不從？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要期待的絕對不是一個不求回報的獵人，一個愛女人的「新」、「好」男人，而是要讓小紅帽自己就掌握槍、會使用槍、敢使用槍——自己就擁有資源與工具，有權力對抗惡狼，而不必倚賴獵人守護，反受他控制。

因此，新男性若真要揭發、真要拆解父權網路，就絕對不能忘記（刻意不）去揭露父親與兒子間的共謀、兄弟與兄弟間的共謀、好男人與壞男人間的共謀、哥兒們之間的共謀，要捨得（自己的利益）「大義滅親」，不惜（放棄男性優勢）「兄弟鬪牆」。不過，到目前為止，這樣的事情並未發生。舉例來說，當有女人因為無法再忍受婚姻內的暴力與性虐待憤而殺夫時，「新男性」不曾像女性主義者一樣，發出「暴力一天不休，女人只好繼續殺夫抗暴」的言論而遭主流的聲音痛伐；另一次，當女人批評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公然為男人納妾背書，並將「管理妻子」比喻為「管理財產」時，也沒看到有哪個「新男性」出面聲援。此外，關於子女從母姓、夫妻財產制的不合理規定、女兒普遍繼承不到

財產等問題，關於女人不婚生子、鼓勵女人發展同性情慾等這些艱困而備受父權社會圍堵打壓的議題，「新男性」都顯得沒啥興趣。他們也許愛談泛泛的兩性關係、兩性情慾問題，分析分析、批判一下男性經驗及其限制，他們有時候甚至可以把性別理論談得比女性主義者更細緻，但對於婦運每一波向父權體制發動的實質戰爭，他們的表現總還是有氣無力。

這不禁令人懷疑，「新男性」其實並不準備推翻父權體制，其實也害怕與父兄們割離，所以他們不往父權的痛腳裡踩，他們只想搔搔癢，調皮而已。也因此，他們可以連基本的「論述倫理」都沒有，以致一個經過規劃，集體呈現，有宣言意義的〈男性運動專題〉竟然出現像小野這一種包裝精美的沙豬言論，李民中這個不願意承認性別壓迫存在的痞子，還有蔡康永這等恨／怕女人，視女人的問題無聊兼可笑的不知是什麼東西（但肯定不是男）的東西。（蔡康永在其〈鏡子拒絕我的臉〉一文中，用「不願意」—「非常無聊」—「心不在焉」—「更加無聊」等語充分表現對於性別問題的不屑）可見，「新男性」是男性作家們隨興之所至隨意定義的（全看大爺我

爽！），他們既然不準備為自己生產的「新男性論述」負什麼政治責任，也就不必費心去規範什麼「論述倫理」了。至於「運動」，則未免言之過早。

總在論述中成就了自己

狀似逆子卻不是逆子的「新男性」，在女性主義與婦運者奮力開拓的性別空間中，享有比女性主義與婦運者以及所有其他女人更優越的發言位置。確實，台灣的女性主義論述與婦運的成果累積到今天，已使女性觀點以及性別議題獲得一定的正當性。不過，女人大力聲張女人的權益，社會懷疑妳自私，說穿了不過是為自己；一旦男人站在性別平等的角度說話，社會反倒認為他寬厚，願為弱勢者執言，甚至佩服他願意犧牲既得利益，「新男性」頭頂瞬時戴上光圈。「新男性」說得愈多，就愈發充滿正當性；他們更因站在女人的立場說話，而加倍受到女性群眾的親愛與仰慕。「新男性」的發言優勢還不只於此。在父權異性戀體制「男女平衡」、「男女配對」的邏輯下，對性別議題有發言能力的少數幾個男性論述者，向來受論述市場格外的重用——那麼多女人喧嘩聒噪，總要聽聽男性的聲音。因此，當台大女學生主張女人

看A片、討論A片的權利時，王浩威等可以趁勢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連載男性的A片經驗，而幾個女人所書寫的〈女人A片檔案〉卻遭退稿的命運。楊照在主流媒體中鮮明而成功的「新男性」論述身份，是有其結構性的成因的，而蔡詩萍能夠在《聯合文學》長期撰述〈好男人講義〉專欄，也不可謂不是父權體制給的好處。此外，畢恆達與卡維波雖不以「新男性」或「好男人」來標榜自己（後者甚至批評「新男性」現象對性別解放的負面影響），一者以結合空間與性別論述見長，另一者試圖串聯性解放與性別解放的政治，於性別論述確有其新的貢獻，但他們的男性身份與經驗，不可否認，也著實是他們成為專欄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畢恆達與卡維波先後在聯合報續紛版撰寫〈城市觀察〉與〈狂飆年代〉專欄；卡維波在台灣立報也曾連載〈男性觀點〉專欄）說著說著，我不禁聯想到「與狼共舞」這部影片，它原本要控訴白人對印地安原住民的殖民侵略，最終成就的卻還是由凱文柯斯納所飾演的那個像神一般為公理正義奮鬥的白人英雄。

婦女新知
當許多個別的女性主義者與婦運者為自己的選擇犧牲婚姻、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作、家庭或學術前途時，這些男性論述者卻不必害怕損失什麼（至少，體制保障他們損失得比女人少），他們有些甚至還可以順利繼承父兄為他們打下的整片江山。「性別論述」可以是這些男性論述者業餘的知識興趣，胸口一只風味別具的針飾，在搞搞「性別論述」之餘，他們依然是主編面前的紅人、知名的作家、教授，將來，他們也有機會被培植為主編、主筆，或在專業上繼續深造，成為「名××者」，或「××家」。這是結構的吊詭，好像怨不得誰，但既然「新男性」於「女性主義者」在論述資源上之排擠效應確實存在，「新男性」若不加把勁朝性別的「政治」與結構性的解放靠近，那麼，「新男性」對女人最積極的貢獻恐怕應該是「自我消音」，好讓女人的聲音相對地大聲一些，有力一些。

換個角度想，性別論述的空間不會是固定的，它當然可以越拓越大。也許，「新男性」可以做的更是，「利用其父權安排上的有利地位」（王文典語）替其它女性主義者爭取更大的發言空間，或提供其它性別與性欲主體可用的論述資源。舉例來說，他們可以與女同事或女學生聯名發表文章，邀請其它女性

在他們的專欄或策劃的專題中露一手，鼓勵周遭的女人書寫自己的經驗與看法（而不是由他人，由「新男性」、「好男人」代言），並且為她們張羅版面，爭取發表機會；他們甚至可以「偷渡」一點東西（如主流世界的內幕）供婦運者和同志運動者作戰鬥的武器，甘居幕後出出點子，提供一些行動或論述策略，也可以策略性地在他們的工作中優先拔擢優秀的女性及同志，滴水穿石般解滲父權結構…。

結盟、串聯 可能嗎？

這篇東西一路寫下來，幾個一定會遭逢的質疑仍舊像絆在樹頭的風箏一般，不得落定——妳們這些女性主義者對「新男性」未免太過苛酷，根本是「嚴以律男，寬以待女」，逃不出「本質主義」的迷障；這樣拒「新男性」於千里之外，是不是鎖閉了結盟政治的空間？

「我們這些女性主義者」倒要反問：「新男性」真的已經發展出自己的運動主體，準備組織化並且行動起來，加入婦運或與婦運結盟了嗎？可以肯定的說，沒有。婦運在現階段並非「本質地」拒絕男性的同盟，反之，在實際的運動過程中，婦運連談「拒絕男性同盟」的機會都沒有。無盟可同，何來拒絕？我們

甚至可以說，已然成形的「新男性」只是一個一個未經組織，沒有行動能力的讀書人，他們在思考和意識的層次上遙遙呼應著女性主義和婦運，卻根本沒有在搞運動。「新男性」之中，沒有一個具體地貢獻勞務於婦運，也沒有一個努力在行動上組織男性；沒有人投注資源與時間好好帶一個男性成長團體，沒有人試著找錢找空間成立施暴者治療小組，當婦運團體透過街頭行動表達訴求時，也沒見過有一個「新男性小隊」（即使只有三兩隻小貓）。

待「新男性」經歷了「天蠶再變」，成為有組織、有行動、有群衆的新運動主體時，談結盟、談串聯，才有意義。

讓我們把眼光放低，看看較微觀、較瑣碎的實踐好了。「新男性」之中有論者（如杜平）提出，男人在生活實踐中可經由「父代母職、撫育小孩」以及「經驗同性戀」來幫助自己「跨越性別藩籬」；畢恆達也曾呼籲男性「聲援婦女運動或用金錢支持婦女團體」。但是，以如此實際的作

為在生活中對抗性別歧視的男人實在少之又少，而這極少數的男人所以如此，也多半因為受到身邊女性主義者不斷的啟發和強烈的質疑與要求。可見「新男性」或「好男人」也要有女人「教」才成得了器。

這樣說來，歷經了「天蠶變」，自認意識覺醒了的「新男性」，若欲突破現有的格局，也許就必須進一步接受婦運的指導，學習婦運的經驗，並且，開始去實踐、行動。待「新男性」經歷了「天蠶再變」，成為有組織、有行動、有群眾的新運動主體時，談結盟、談串聯，才有意義。

誠然，一個比較「對」的運動，必須在結盟與串聯政治上保持開放的活力，包括女性主義婦運。而且，婦運確實已經在進行串聯政治。女工組織和同志團體在階級和性欲等議題上的分析與運動上的介入，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婦運既有的限制，讓婦女運動者在行動與論術過程中不斷自我反省，也讓運動本身不斷被改變。而「新男性」（或未來可能再衍異增生的新新男性、後新男性、非男性、××男性…）一朝果真拾起武器，對體制發動真實的戰鬥，「我們這些女性主義者」是不會看不見的。

胡淑雯

「好男人」莫要對我流淚

「新男性」既然那麼愛哭，那麼想哭，我們再來談談哭這回事吧。哭泣，從來都不像「新男性」所說的，可以解放束縛、完成自我。其實，它總是被男性偏見凝視，被強勢的詮釋暴力收攏在體制允許的「對」的地方，一次又一次鞏固男尊女卑的結構。

舉幾個大家還印象深刻的例子吧。

在台大商研所事件中，事件女主角呂安妮與校方的行政官僚和教授洪明洲論辯時，激動地淚灑當場。捍衛所謂「學術清譽」者，崇尚師道的保守人士，無須深究事情的來龍去脈便將呂安妮的眼淚讀成蛇蠍美人善攻心計的媒體表演，指洪明洲就是因為內向木訥、不善表達而在媒體戰中痛失戰場；另一種典型的男性目光將呂的哭泣視為「可憐弱女子」無助的抗議，他們若對事件中的女性表示同情，也不是源自對性別議題的瞭解和認同，反而是將事件中的女性幼弱化，以便客體化、慾望化。男作家李敖以『黃色』事件和『黑』色事件為此事件作比喻，堪稱男性沙文觀點之「極品」。

緊接著台大入學事件之後的，是潘明秀殺夫、殺情夫的重案，同

樣轟動。這回，媒體與社會驚懼的，是潘明秀的「不哭」，是她的狠、她的無情、她的冷靜，甚至連她談及自己女兒時平靜淡然的情緒，都可以被拿來證明她果然「最毒婦人心」。

宋楚瑜和施明德的哭泣，可就大大不同(大大有用)。

在九四年為省長選舉鋪路，以台灣省省民代言人的身份向中央政府喊話的那場公開演說中，宋楚瑜那上層男性政治人物的淚水不但助他登上頭條新聞，更為他贏得聲名和民心。是呀！男兒有淚不輕彈，除非真到傷心處！可見他為人民福祉如此心焦如焚！即使有人指出這不過是一場表演，或指他焦急的僅只是自己的仕途，也不得不讚嘆他哭得對，時機(timing)、場合、力道都恰到好處。物以稀為貴。男人的眼淚，正因其少見，一旦流出，多半被報以超值的情感與物質回饋。宋楚瑜當年那一哭，確實為其日後的勝選奠下基礎。

另一位(前)反對黨主席施明德在幾次選舉危機中，以及在競選立法院院長以一票飲恨，鞠躬謝票時，灑下的幾滴「英雄淚」，也頗受媒體疼寵，每每受停格或慢速放大處理的厚待，讓觀者在凝視他閃爍

淚光的同時，油然生起感佩之意。可以說，施明德做為台灣民主運動自我犧牲與理想主義的象徵，其滴下的每一顆淚水，都充滿悲劇英雄的意境。這

才是男人的眼淚，稀貴，十分有份量。

政治人物的好男人形象(就勇於哭泣而言)，和「好男人」對自我形象的想像(或期待？)幾乎是密合的。蔡詩萍對著女人傾訴的〈妳看，這是我的眼淚〉是新男性自憐自戀的一篇力作。他形容自己的淚水「是醞釀了許久『爆發』於瞬間的宣洩」，並語帶炫耀地指，「一個飲著長島冰

爸，我還是先告訴你以示公平：我已經成為女性主義者了！



茶大哭的男人」不但在酒吧引起「騷動」，並且還「嚇壞了」與他共飲的另外兩位朋友。「好男人」終歸是「男人」，他們縱想放下身段大哭一場，也

無法不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好男人」的眼淚，即使不能像政治人物那樣為自己累積政治資源，也總能惹來女人不捨的愛憐。哭泣，便成了「好男人」與女人調情、勾引女人的一種方式。

然而，我們是不必鼓勵男人在私領域、在親密關係之中示弱的，因為，他們向來都是吸血鬼。

徵稿

《騷動》的論述空間是開放的，我們歡迎各種不同的性別、性欲主體介入，也期待在論述運動過程中召喚或創造新的主體，歡迎你/你來稿，歡迎提起筆、撥起鍵盤就本期專題大大衍繫新看法，暢快回應《騷動》第二期徵稿一家。請逃家成功或未成功、逃不了家或不想逃家、已經另造新家或想要自力造家的女兒、姐姐、妹妹、太太、前妻、逃妻、小老婆、老媽媽、小媽媽、婆婆、媳婦…來稿，談談妳的經驗。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古明君

男人，該斷奶了！

關於這篇文字，我難產許久；大概是一直想不起來有什麼話想跟「新好男人」或「新男性」說的。一提到這個名詞，我腦裡浮出來的，大概不是房車廣告裡那個白淨的都市雅痞、就是那些常常在報紙一角闡談「新男性」如何如何的文字工作者或學者。

為什麼講到「新男性」，我想到的不是泥水工人、機車行的小弟、操著台語的歐吉桑里長、我家巷口賣滷味的黑輪伯....？想到這裡，我忽然對這個題目又有了一點興趣，我想知道，是甚麼限制了我對新男性的想像？「新男性」是怎麼建構出來的？因此，如果新男性有所指，那所指為何？

我首先想到的是：男性解放運動，在台灣，從來沒有發生過，有的是隱約成為一種流行論述的「新男性」，還有商品化的「新好男人」。從「新男性」這個字眼開始在報端出現的時間序，並且就早期的論述內容來看，「新男性」其實是台灣這個父權異性戀社會對婦女運動和女性主義論述的焦慮症候群之一。「女人站起來之後，男人怎麼辦？」「男人要從女性主義學習甚麼？」甚至「男性在婦運中的位置是什麼？」之類的社會集體焦慮多得使早期台灣婦女

運動圈也一再壓低聲調，強調婦運的目的在於創造兩性互動更平等的社會，甚而會哄慰的說，婦運的效果，可以讓男性也不再強自剛毅堅忍，甚至對男人來說，也是好事一樁云云。從今天回頭去看，婦女運動要這麼關心男人這種被遺棄的情緒、男人對婦運的焦慮，真是有點不可思議。持續到今天，當然有許多個別的男性為婦女運動捐錢出力過，但是集體來說，「新男性」論述的內容，多半是道德良心式的反省，因此，「新男性」的效果，大概最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幻象式的安慰劑，面對女人對父權的撻伐聲浪，男人可以自我安慰：「我不是那個加害女人的惡魔，我雖然是男性，至少，我是一個新男性」。

雖然是自我安慰，可是其實男人在「新男性」這面鏡子中，面對的其實不只是自己，恐怕這面鏡子映對著的更是女人。不論是強調要向女性主義學習、或是思考自己與女性的親密關係、或是聲稱自己要做個男的女性主義者，「新男性」從來一直隱隱在繼續男－女對應關係、或明白要建立（所謂新的）男－女對應關係。「新男性」或嘟囔、或討人疼愛、或宣稱反省、或汲汲加盟，但是這些話是向著誰說呢？我總在

臺灣的「新男性」論述，其實是相當異性戀思維的。所以某些早就跨過性別（及對應的情慾）疆界的男同性戀者，「新男性」論述是沒有能力號召的。

「新男性」各式文章中聞到那未曾明說的，卻又緊密而強烈的慾望氣息：我要和女人繼續有關係。「新男性」其實在對話的，並不是其他男性。「新男性」遙遙相望著「新女性」，而因此，在這樣的想像關係中，顯然也對應有「舊女性」、「舊男性」的存在，這樣的對應關係基本上是一條新／舊、男／女的二元性的防衛戰策略。如果說，女性主義在某些時刻採取了生理上或社會位置上的本質主義來建立運動的可能性，顯然，相應著女性主義焦慮症而生的「新男性」論述也延續著兩性二分的路子，這樣的二分是否出自「男性解放」的運動動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至少今天看來，效果絕對是男女二分、情慾對應的。

臺灣的「新男性」論述，其實是相當異性戀思維的，而各種「新男性」文章中的差異性雖然很大，但至少從沒有一種其中有男性分離主義、或是愛慕男體而不可得的怨男氣息、或是崇尚男性集體的美學。所以某些早就跨過性別（及對應的情慾）疆界的男同性戀者，「新男性」論述是沒有能力號召的，「男人在婦運中的位置」可能不是許多男同性戀者的焦慮，而且，恐怕說起來，他們早就已經是「傾國怨伶」、「菟絲

花」或「美麗壞女人」了。

「新男性」論述所隱含的異性戀情慾結構，和這種論述的慾望效果，當然逃不過消費資本主義靈敏的嗅覺，「新好男人」就在消費資本主義的精神官能症中被創造了出來。「新好男人」又新又好，也絕對不是自婦運焦慮症產出的擬人化的父權異性戀惡魔；他在女性獨立的年代中不斷自我成長，他是異性戀婚姻中的好學生，是一個現代版的羅曼史最佳男主角。可是父權結構不改變，好男人的出現也不會讓女人得利多少，作為擇偶對象，好男人就像是一籃爛蘋果裡比較不爛的那一個。民法親屬編不修，在異性戀婚姻關係裡的女人除了寄望前世燒香修橋建廟、這世人運氣好碰到一個開房車的新好男人，又能如何？那位開著房車的新好男人在現實中還可能擺著「我是一個比較好的爛蘋果」的嘴臉，在妳和他談起家務分工時說：「妳還不滿意嗎？比起打老婆的老連、在外面搞到把性病帶回家的小馬，我其實很不錯了。」如果沒有壞男人，就不會有所謂的好男人，個別的好男人的存在，只是讓女人再次落回被強化的男女一一對應的情慾結構中，也很難讓女人逃離那個以愛為名的陷阱。我想像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婦女新知

個別的好男人的存在，只是讓女人再次落回被強化的男女一一對應的情慾結構中，也很难讓女人逃離那個以愛為名的陷阱。

的婦女運動，不僅在改變性別的社會關係，也在改變情慾關係，所以，我想，這個運動的產出大概不會是一種所謂「新好女人」的動物，甚至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改變的我，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情慾關係上相應「新男性」、「舊男性」們的「新女性」。

這樣說來，「新好男人」非但不會是婦運的同志，還有可能是與「壞男人」聯手的騙局。可是，難道「新男性」對性別的解放沒有幫助？台灣的「新男性」論述一再強調，男性也是父權邏輯下的犧牲者，因而許多「新男性」論述中極力擁抱「陰柔特質」，甚至對「陽剛氣質」全面揚棄，強調新男性也在進行性別解放運動。其實我是很贊許個別男人對自己的性別氣質進行反省，進而自我解放、內在革命。然而，我卻想問所有自以為是新男性的朋友幾個問題：第一，為了不讓「新男性」的性別鬆動成為一種類似自我潛能開發性別氣質甦醒之類的末世紀流行，為了不讓「新男性」的效果，只是與女人調情，為了要鬆動僵硬的性別角色，讓多重的性別氣質變得可能，「新男性」當然要思考和其他的性別解放運動（比如說：婦女運動、同志運動）的連線關係。而除了

向女性及同志學習、除了個別的出力捐錢、加盟婦女及同志運動，還有沒有更前展的連線關係？第二，要把男性從暴力傾向、恨女人的心理叢結中拯救出來，大概不是賣賣房車、或寫寫文章囉唆（或自戀）一下就可以達到的，我們也沒看到有哪幾個新男性，去監獄裡和男強暴犯開自覺團體，去和打老婆的丈夫開成長班。我不禁懷疑，新男性在台灣，其實只在自己的文字中塑造了自己，我也很想問新男性們，要如何讓自己不再只是個名詞，而是個動詞？第三，性別氣質的鬆動與解放，難道是完全不需任何物質基礎的想像性自我進化？如果所謂物質基礎，指的不只是很狹隘的經濟條件，那麼，也許性別氣質的鬆動，就不只是在自省、購買與消費中完成的。另外，對一直關心和男性對話的婦運者，我其實想說的是：婦運人力物力精力都有限，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可以不要花時間力氣去描摹思考「新男性」，婦運不必當「新男性」的大奶媽，特別是這些新男性其實還蠻優渥的，我們不餵養，他也不會死。而在每一場運動的實際戰爭中，我們當然要大剌剌的和所有可以一起打仗的朋友結盟

（不管他的生理性別、階級屬性、政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黨利益....），而我們當然也要在每一次合作中思考這樣的結盟與運動的效果，有沒有讓性別的解放更進

一步。至於「婦運」中男人的位置啦、「新男性」何以成形啦之類的問題，就留給他們自己吧。

我不要被女人拋棄！我不能沒有女人！——「新男性」在重新檢討男性形象並試圖建構新的「男性」形象時，不斷散發這種強烈的慾望氣息。相應著女性主義焦慮症而生的新男性論述既然是異性戀思維、男女二分、情慾對應的，我們就在它架構好的情慾內容中指導指導這些害怕被女人拋棄的異性戀新男性，教他們怎樣好好當女人的情人吧。



真希望我是女生，可以和妳再愛一次。

新好情人守則8小條：

- 1.貫徹保險套主義：女友說：「沒關係，你進來吧」卻堅持：「我還是戴套子吧」！
- 2.高度配合。前戲絕不低於四十分鐘，依她要求進入，照她喜歡的方式做。
- 3.可以享受不必插入，沒有射精的性。
- 4.會認真考慮並進行割包皮手術，因為「據說這樣她比較不容易得子宮頸癌」。
- 5.買舞男秀的入場券給女友當生日禮物（若買不起就自己跳給她看）。
- 6.欣賞她身上的每一吋脂肪。
- 7.她做了乳房切除手術，你卻更加愛戀她全新的小乳房。
- 8.前女友向你come out，表示自己現在正與女生交往。祝福她，並挑選一套lesbian kiss明信片送給她（如附圖），謝謝她對你的信任。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丁乃非

讓閱讀成為欲望書寫
淫婦、淫書、淫水

專題之外：這篇文章無關乎所謂「新男性」，而是對百年來宰制性的男性論述主體一次針針見血的、露骨的揭露。經過作者的分析，我們會發現，新男人舊男人所繼承與執行複製的父權異性戀正典是一貫的，不論他們變幻幾種樣貌。

這個聽起來很古老的題目，可以用現代中文演譯成為：「壞女人、色情書刊、女性爽液」。

如果小說、文學是一種欲望書寫，一種在特定歷史政治脈絡中不斷自我調整的欲望書寫。那麼，小說必然有一定的一但未必不變的一發言主體位置(那欲望多半和此位置相連)，此發言主體也必將投射對映有著特定條件的閱讀主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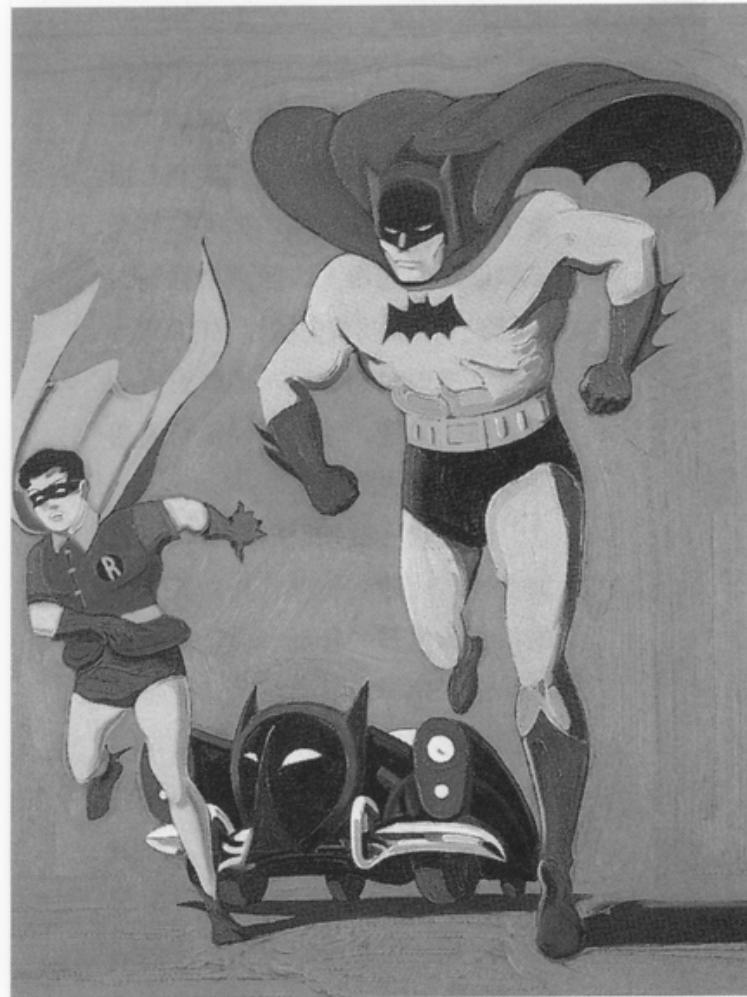
於是，與小說同處一時空、或不同時不同地的「非閱讀主體」(不被發言主體關照的其他主體)，這些人的閱讀位置、角度、欲望，在文本中找不到相對應之着力點，她們該如何閱讀，才能開創出文本內外都還找不出的欲望書寫？

她知道，那些書不是寫給她看的，像金瓶梅，像SADE，像花花公子，像閣樓雜誌，她要不要看？怎樣看？若是不屑，這份不屑的對象又是誰？這一類性書寫的愉悦難

道純然「父權」——「父權」到她(女性閱讀主體)不能從中取爽？不能穿透文本處處設下的各類型限制，欲望並認同文本中看似被釘死的各種女性？她於是又想問：如果我們是充滿好奇與想像，身體滿懷騷動的「女體」(女性閱讀主體)，如何解讀／毒文本既有的導讀，進行對自身的處境、位置、性別、性欲有用處又快感橫陳的閱讀？

她發覺，批判解構各時代淫書對女性／女體的剝削，對女體性欲的扭曲抹黑曾經好玩，但玩弄的對象固定、單一、又重覆，若是她的閱讀快感只能透過鞭解父權文本達成，這股欲望既成就了其鞭策的對象(形成虐與被虐的共生體)，又限制了自身的欲望形塑。進一步想像、考證任何敘事小說，當然包括所有色情書刊(女體手邊的文化資源已不多，怎能太挑剔？)，能夠提供何種特質的欲望閱讀，激發哪些欲望想像，勾動女體們身體腦液一起發騷(發情、騷動)，淫水橫流，這才是當下重點。

記得六年前，在婦女新知的一場討論會上，李元貞提出一個關鍵問題：金瓶梅這等「正典」(straight, hetero-centered)到不能再正典，又極度恨／怕女人(mysoginist)的沙



豬文本，女人要讀嗎？若沒看過，還需要看嗎？好看嗎？我們或許還可以接著問：歧視剝削又消費女體和女人的「性」的各式A片、撲克牌和打火機上的裸女圖、街頭巷角的裸女廣告，要看嗎？好看嗎？

當時的討論重點在批判，在破解鑲嵌於文本中不同屬性也不盡一致的恨／怕女人的機制。金瓶梅的敘事邏輯，加上一些（舊）男性閱讀

我是新男性，我要拯救女性！（誠品書店提供）

者的眉批回評，交織出滴水不露，為淫婦（潘金蓮等）定罪的過程。淫婦，在小說中，在眉批回評裡，淫得無可救藥，不可挽回，淫得不堪、惡毒，活像個殺夫女魔，更可怕的是，小說中的淫婦，簡直「逼真」，將「真實世界」中的淫婦淫相全部寫盡，真是個利害的文本，偉大的作者，而批點者當然更是銳智。但是，我們發覺，文本與批點者在為淫婦定罪的同時，大飽眼福，享用了每一筆描寫淫婦淫行，淫水橫流的細節。哈！文本與批點者的揭露與踏閥原來張滿窺視偷腥的愉悅！

例如張竹坡的評論之一即，這本小說實在把淫婦寫得太像真的了，真過癮，真可怕；如此逼真，作者簡直就「現身」為淫婦，才可能嘛！張竹坡一時興奮，筆歪了，竟看著淫婦，看到了一位扮裝成淫婦的作者。或許這可能才是張竹坡真正亢奮一個月評完金瓶梅的情慾動力吧。可惜，張竹坡只有這一筆是歪的，其餘都盡可能將小說中淫婦的淫行佈局閱讀成為懲罰殺害淫婦的理由和武器。

淫婦以身體為武器，性欲為資本，在小說裡則以她的性交姿式成為符碼、轉喻。淫婦一旦騎在不論

舊也好新也好的男人身上，他(武大、西門慶)或早或遲不得好死。唯有披著道德外衣專嗜偷窺卻正義凜然的閱讀者雙贏。因為，他既享用了淫婦「騎／欺」男人的刺激情節，又受用於好男人(武松)最終刀刀見血的砍殺，懲罰淫婦的快活場面。

這些序者以目探火，卻得免於死，還可自稱從中獲取保身健陽的知識與訓誡。或許這種男性的保健知識中所夾纏的不可告人的暗爽，正是此類文本再怎麼寓意諷教也難以洗「淫」脫「欲」的原因。四百年前的敘事邏輯(金瓶梅)，三百年前的回批眉評(張竹坡)，都可在其中讀出黏著於父權道德教化論述之間的淫欲(窺視偷腥)。道理很明確：這是一種不得見天日(去人欲)的異性戀男對女的欲望，因為欲望的「錯」，只得以熱眼旁觀(偷窺)為附，以道德批判因果報應為主軸。欲望仍流動，卻充滿恨女怕女殺女之氣。

然而，目前當下，我們這一些女體(女性閱讀主體)如果只有解毒與批判，我們的欲望和爽又在哪裡？對象是誰？

六年前的一些我們，是否也處於不得見(女性主義)天日的異性戀女對男的欲望？因為欲望的「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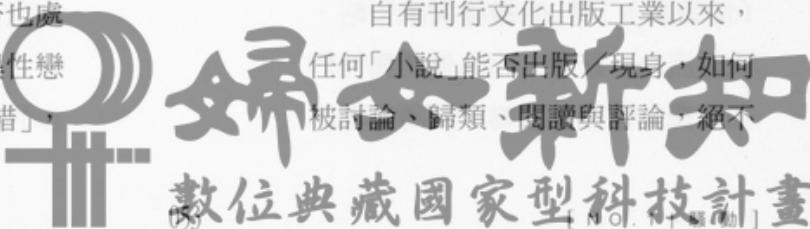
所以勢在必伐，以(新女性)道德批判為主軸，讓欲望盡瀉於解構破讀沙豬文本及恨／怕女人情節的熱情之中，卻來不及思想，這股情欲豈不退一步複製了沙豬們對女人、女體及女「性」充滿殺氣的「愛撫」？解構破讀的欲望對象不正(仍然)是那萬惡不赦的沙豬文本、沙豬邏輯、沙豬男性的書寫或閱讀主體？於是，「錯」的欲望仍得以「正確」的論述逆流瀉出。

現在，我們必須問，性欲何以有對錯？為什麼不得見天日？能否穿透(男體)懲罰與(女體)批判的一體兩面機制，形塑新(其實一點也不新，只是對某些主體而言，不同於「異」往)的性欲模式與對象？

四百年前的「淫書」，此刻當下的色情文本，女體說：可看，要看，好看。如此的欲看與好看，其眼光角度正是四百年來仍男權中心的市場制度下，往往正典的導讀者所看不見或視而不見的。這些導讀者，不論其是否以「異男」自居，都難以想像或不願想像不敢想像，甚而會費力防堵、矯枉導正女體欲看(欲望閱讀)的各種淫水流勢。

自有刊行文化出版工業以來，

任何「小說」能否出版／現身，如何被討論、歸類、閱讀與評論，絕不



這些導讀者，不論其是否以「異男」自居，都難以想像或不願想像不敢想像，甚而會費力防堵、矯枉導正女體欲看（欲望閱讀）的各種淫水流勢。

是什麼「自然」或「中立客觀」的過程。出版過程中加諸於文本的序跋，如同地圖左上角的那枚解碼指標。序，標示出文本的「正經」閱讀脈絡，為文本在既定的閱讀消費市場中標的有利的位置；序，像是商品的「正」字標記，記載商品得以更加流通的附加文化價值，也是進入市場機制的欲望烙印，難免充滿性別與性欲的權力結構與政治角力。

在張竹坡等的強力介入性導讀之下，「女體」看金瓶梅，看了好久才找到解碼器，發現其中兩種層次的好看。第一種好看，是讓腦汁運轉，分泌知識淫水。這等好看，在於考古學式的（archaeological）：

淫婦若不死，他們（這些「男體」）何以活？！但同時，他們不也因為書寫、閱讀，甚至扮裝為淫婦而張滿愉悅，終至得以永生——在書寫／文本的境域？

挖掘張竹坡式的讀者的閱讀條件、脈絡（何時、何地，以什麼樣的主體位置為出發點？），細考這些「男（性閱讀主）體」的種種閱讀策略，欲望流向。好看，因為他們與他們如此費力想像、書寫、閱讀再現的

「淫婦」——他們既痴迷著消費又欲拼命排泄掉的淫婦——兩者之間竟有血膿相連的欲望連繫！淫婦若不死，他們（這些「男體」）何以活？！但同時，他們不也因為書寫、閱讀，甚至扮裝為淫婦而張滿愉悅，終至得以永生——在書寫／文本的境域？

文學其實讓欲望銘刻，永恆不死。

另一種好看，則可能是下體分泌淫水的「臟器性」（visceral）層次，和前者的腦際（cerebral）屬於不同時間不同處（如果文本是時空交疊的四次元地圖）。閱讀者是「女體」（某一女性閱讀主體），而文本中眾多欲望閱讀對象也是女／體。

如此讀來，（男）作者與（男）評論者用力累積三百多年，已然體制化、自然化的仲介導讀，就此作廢無效。他們的欲望軌跡現出原形：原來，這一堆「男體」只是偶爾有一秒鐘扮裝邪念的正典讀者，他們多半的時間，既愛／用淫婦，又非殺之不可。然女體已然化成此刻當下的「惡女」族之一，他們恨／怕淫婦，我等愛／欲淫婦。

後記：

三百年後的1995，台灣，陳雪
作的惡女書，也有導讀，這份導讀
新知女文

將女女(新)欲望讀成(母女)舊欲望，認為惡女書需要指標、文學評價、社會脈絡。和張竹坡恰恰相反的是，序者楊照認為惡女書不夠文學，也不夠社會，「惡女其實不惡」，他說。

金瓶梅和惡女書的導讀者難以想見的是：惡女書早已成為散居台灣各處的女同性戀閱讀主體——似女同性戀閱讀主體，準女同性戀閱讀主體——床邊不可或缺的「禁物」，即使出版當局將它包裹起來，深怕未成年少女看了之後，性欲情欲都學「惡」。

三百年前，張竹坡也曾說，絕不能讓女人讀金瓶梅。他又說，女人看了，會學作「淫婦」。他更怕的是，女人有了性欲，淫行是會殺男人的。他萬萬沒想到，有一些為數不少的我們有了性欲，學會欲望閱讀，是會愛及欲望女人：成為惡

女、欲望淫婦、看淫書、流淫水。

所有的書寫／文本，無論是否古今，出於女作家，男作家，不女

他萬萬沒想到，有一些為數不少的我們有了性欲，學會欲望閱讀，是會愛及欲望女人：成為惡女、欲望淫婦、看淫書、流淫水。

不男的作家，都沒有內在必然的欲望本質性，或者性(別)的正確性。能否享用任何文本，得看特定閱讀者的身體位置：她／他在社會結構、家庭建制、性別、情慾、階級、歷史的座標，以及許多其它「非永久性」的因素，多元決定她這個閱讀主體，究竟能不能，想不想、願不願意變惡女、看／似／是淫婦、讀淫書、流淫水。

小啟

各位讀者，你們久等了。編輯這樣一份季刊，於我們是十分陌生的經驗，過程中許多編務行政工作，我們必須從頭學習、試驗，也經歷了一個一個——有時甚至可笑荒謬——的錯誤。然而，在眾人引領企盼下，《騷動》季刊創刊號終於出版了，希望你們能夠細細地讀，並且給我們意見。原本我們計劃在今年三月推出創刊號，於六、九、十二月分別製作一期，但是，誠如各位所見，我們的起步並不如預期順暢。在此，我們要向已訂閱《騷動》季刊的讀者表達謝意，也要衷心地說一聲抱歉，同時，我們會主動將各位的訂閱到期日延後一期，謝謝你們的督促與體諒。(編者)

新知女婦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在台灣，婦解運動和國族主義能不能「牽手」？

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婦解運動和國族主義經常存有矛盾難解的糾纏。最常見的有關女性主義和國族主義的討論，多半變奏一個核心主題：以國家認同為主要訴求的國族打造運動如何剝削犧牲女人的權利，「國家」的解放不意味女人的解放，反而造成更多性別壓迫的問題。從甘地的印度國族運動、科梅尼的伊朗國族運動到目前在前南斯拉夫地區兩軍相戰中婦女遭受強暴所牽涉的種族問題，都是這個論點最佳的見證。

但是，國族主義是否在婦解運動者眼中，就因此是萬惡不赦的敵人，必須被視如敝屣，棄之不顧？這倒也未必。這個道理其實十分淺顯。以印度為例：批判甘地主導的印度獨立運動在動員婦女爭取國家獨立之後，又強調婦女回歸傳統美德，毫不動搖印度本土父權價值體系，這並不意味反對甘地倡導的獨立運動。同樣的，伊朗婦解人士抨擊科梅尼主控的國家解放革命，並不表示她們反對這個革命所設定的基本目標。對許多第三世界婦

運者而言，第三世界婦女所面臨的困境和壓迫與國家的被殖民處境大有關係。國家的被殖民壓迫如果沒有解除，殖民地的婦女不可能達成真正的解放。引用一位伊朗婦運者Nayerah Tohidi的話，第三世界的婦女運動和其國家的民主及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理論或現實層面上而言，都息息相關。單獨一個婦女運動絕對無法改變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的根本，而一個沒有將婦女壓迫問題納入考慮的革命也無法真正達成它改變階級關係的目的。從一開始，婦女的特定關懷就必須被放入國家反帝國運動和階級改造的計劃。這樣一個立論——強調國家解放（國家的身份認同）和婦女解放必須齊頭並進，同時努力尋求化解其矛盾衝突之道——大致是第三世界婦解者的共識。換句話說，鮮有第三世界婦運者認為婦運與國家認同問題毫不相干，性別壓迫的問題不必涉及其他國家政治層面的問題。

在台灣，將國族主義問題納入考量的女性主義論述並不罕見，如果有，也泰半在批評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國族主義，認為國家認同問題的牽扯徒然犧牲女人的利益。真正去思考評估在台灣，國家運動(特別是民進黨主導的國族打造運動)對女性造成那些利弊得失的論述仍有待開發。本文只就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場域常見的兩個論點提出辯解觀點，期拋磚引玉。

最常見的一個女性主義說法即是，我們該反轉通常將政治議題置於婦女問題之上的價值觀，貶抑國家政治的重要性，突顯私領域的議題，才是正確的女性主義策略。就這樣一個女性主義立場而言，有個歷史例子或可供讀者參考：眾所周知，從一九七五年世界婦女大會第一次在墨西哥市召開以來，第三世界婦女代表和第一世界女性主義者之間即爭執不斷。一位曾為政治犯的玻利維亞婦運者即憤然表示，在墨西哥市開會時，美國婦運知名人物貝蒂·費爾頓(Betty Friedan)即指控她深受男性思考遺毒，滿腦子政治，因為她關切殖民政治結構對玻利維亞婦孺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包括Gilliam、Johnson、Odum、Mohanty等學者都指出，第一世界女性主義鎖定性別的單一思考模式並無法處理殖民地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婦女的問題。

台灣婦女所承受的許多問題其實都和國家敘述如何被建構有密切關係。例如，早期為了反攻大業倡導的「增產報國」是最明顯的以女人為國家爭奪戰的後勤「補給」工具。台灣的



台灣妓女史展現了性別議題與台灣政治經濟架構不可分切的複雜關係。

色情行業如此興盛，當然早可溯自清朝對漢人攜眷來台的限制，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被迫擔任「慰安婦」的工作，到越戰時代及往後十年台灣女子對美國大兵、對日本的賣春行為，到一九七〇年代台灣中小企業者墮在燈紅酒綠場合從事商業往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來的經濟形態。台灣妓女史展現了性別議題與台灣政治經濟架構不可分切的複雜關係。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所帶出的婚姻、財產分配問題及因政治不安引起的移民風潮對婦女造成的衝擊都在反映國家身份問題對台灣婦女的困擾。

當然，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理當女性主義也應有多方面的發展，也應該有人致力性別問題的開發，並非通通要將台灣的婦女問題與國家定位問題或台灣的被殖民史扯上關係。不過考量台灣曖昧的國家定位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廣大影響（中共一發動軍事演習即造成台灣股市崩盤、資金急速外流、移民風潮騷動、景氣低迷），女性主義者面對這樣的情勢，是該繼續抵制國家定位問題的重要性，「以不變應萬變」，置之不理，或是正面應付這隻怪獸所帶來的問題？

國家定位問題其實就是我們如何想像國家的問題。統獨之爭不過在爭論「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國家？」從歷史回顧的角度看，統獨之爭帶來的利多於弊。正因反對勢力提出國家認同問題，質疑動員勘亂條款的合法性，許多不合理的限制－輕則從出國觀光的嚴格規定，大則諸如報禁、黨禁、示威遊行限制－才一一解除。（想

想看，如果示威遊行仍需冒著入獄坐牢的危險，女性主義的發展將如何滯怠坎坷？）就未來展望而言，拒絕思考國家定位問題，置身國族打造運動之外，並不能讓女人真正逃避「國家」運作之外，反教女人自動繳械，平白放棄介入打造「真正屬於我們的」國家的權利。

當然，針對「國家」的問題，也有女性主義提出「國家」早已過時的看法，主張背離國家。可惜，國家的運作並非我們不去理它，它就不來干預我們。從在一塊領土上我們所受的法律約束到出國拿的護照，國家的影子無處不在。更值得注意的是，認為「國家」、「國族主義」是過時東西的，多半是第一世界的學者。十九世紀末歐洲國族主義擴張造成的殖民帝國主義固然是這些學者對國族主義無甚好感的重要原因，另一層更實際的利害關係考量卻也促成這種批判國族主義的聲浪在第一世界盛行。在全球資本化時代，跨國公司的推展及全球資本的壟斷需要靠剷除國家界限的藩籬才能順利達成，換言之，跨國公司的產生意味另一種形式包裝的殖民主義，國家意識愈薄弱、國家的功能愈縮減，就愈有利於這種新殖民主義的發展。國家的存在成為抵制這種殖民勢力暢行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無阻的最後防線，國家的介入可使跨國公司工人最基本的人權和工作條件得到一定限度的保障。否則全球資本化時代的第三世界勞工，其被剝削處境將難以描繪。

如果國家的存在既是事實也是必要，如何塑造這個國家自然是我們權利的一部分。自動放棄這些權利，是否真能解決國家對女人造成的問題？倘若不然，「我們究竟希望什麼樣的國家？」要回答這個問題，擺在眼前的就是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我不想重覆大家已看膩的報章雜誌上的統獨論點，只就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談民進黨主導的國族打造對婦運空間的影響及女性國家想像來談。

即使是不贊成民進黨台獨傾向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民主改革是許多民進黨成員用在牢獄度過的青春和在海外流亡的痛苦換來的。開放的民主空間對婦運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舉幾個例子就可測試出答案。一九八七年戒嚴法解除之前，嚴禁示威遊行。參與街道運動必須有心理準備，面對鎮暴警察的鎮壓及逮捕（甚至坐牢），妳要不要組織（或參與）「反性騷擾大遊行」？在市面上禁止馬克斯主義流派書籍及讀書會被嚴密監控的時代，妳要不要在女書店辦一場演講，題

目是：「從階級觀點談性別壓迫問題」？男子蓄長髮、身穿喇叭褲上街，會遭警察以「奇裝異服」罪名取締時，妳有什麼管道從事同志運動？有什麼報刊雜誌可以發表酷兒論述的文章？

撇開民進黨主導的國族運動對社運（包括婦運）空間的歷史貢獻不談，看看他們的國族打造和女人的關係。Hanna Papanek曾做過一篇極具說服力的分析，說明一個社會打造理想國家的工程和塑造這個社會想像的理想女人往往同時進行。例如，希特勒的德國就嚴格限定德國女人必須慎選交往對象，以塑造一個種族純淨的德國。科梅尼的伊朗也強烈批判「西化」的女人，「理想中的伊朗女人」嚴守「伊斯蘭美德」，是伊斯蘭理想國家的象徵。換言之，想像理想女人和想像國家之間有密切關係。一個愈民主開放的國家對女人的設限必相對減少。同理可推，一個政黨對婦女議題的處理方式間接反應它的國家想像。

就這個觀點切入，民進黨顯然較國民黨和新黨有更創新的性別文化格局，是婦運者可以攜手合作，打造新國族的對象。再以一個例子為證。一九九五年婦女新知「婆婆媽媽立法院觀察報告」顯示，在協助推動民法親屬編修法的過程中，民



進黨的立委整體表現最佳。而推薦立委的前三名(葉菊蘭、謝長廷、謝啟大)中前二名都是民進黨籍。民法親屬編修法並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深層地反映了一個社會對女人的定義、對女人的控制，新晴版民法親屬編代表的其實是新的性別文化想像，鬆動父權體制透過國家機器對女人的壓迫。多數民進黨立委對修法的支持，透露了在性別文化上，他們比國民黨、新黨更不拘泥於僵化傳統的約束，保留更多改革空間。

在某一程度上，陳文茜出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也反映了民進黨在性別文化格局上的突破。傳統上，民進黨的女性公職人員多以政治受難者家屬(周清玉、許榮淑、方素敏、吳淑珍、葉菊蘭)和陽剛新女性(呂秀蓮、陳菊、陳婉真)居多，推出一位自稱「沒有三從四德」、「建國妖姬」的妖嬈女人擔任媒體公關，處處為民進黨代言，這還是頭一遭。民進黨的這個「陳文茜」符號有兩層意義。第一、就性別思考而言，民進黨能賦重任予一個這樣背離傳統女人典型的女性，推銷民進黨，可見民進黨具有包容多元女性文化的潛能。能超越以賢慧、賢能女性形象界定自己的政黨必然比堅持以「規矩正派」

女性公職人員包裝自己的政黨更能接受女性主義觀點，打造新國家。第二、不管最初選用陳文茜是基於那些考慮，陳文茜媒體公關上對民進黨的貢獻或能促使民進黨的性別結構更

一個社會打造理想國家的工程
和塑造這個社會想像的理想女人往往同時進行。

進一步質變，認識女人參與政治運作利多於弊。

「陳文茜」現象展示了女性參與國族打造的正面意義。只有透過積極參與，婦女才能真正介入並影響一個社會想像國家的方式，塑造具有開放性別文化的國家。單從女性角度來評估，民進黨顯然比中共、國民黨或新黨更是打造新國族的合作對象。當然，當有更多的女人關心國族打造運動，當我們累積足夠的聲音力量，我們對國家的想像也才愈有影響力，不會讓不瞭解、不關心開放式性別文化的人為所欲為，強塑一個我們不要的國家壓在我們身上。至於實際運作中，婦解運動和國族運動將如何在相互認知對方關懷的立場上合作，這恐怕不是我紙上談兵就可以解決的難題，只能在實務經驗中辛苦揣摩奮鬥吧！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婦女、民主、國家的 認同經驗

李元貞

讀過邱貴芬教授的「在台灣，婦解運動和國族主義能不能『牽手』」一文後，深覺長久以來，心中糾纏的問題又該再次整理了。原則上，我同意婦女運動與新國家運動息息相關，應該牽手並進，只是在牽手或並進的過程中，必須面對許多的矛盾衝突。這些矛盾衝突有其意識形態的面向作祟，也包括利益的不同。就個人而言，我是外省籍第二代女性，一九四九年隨父母逃難至台灣，在台灣接受蔣介石主政下完整的學校教育（自小學到大學），我的認知過程和生涯選擇甚至反抗的取徑，都與這種背景有關，這是十多年來經過女性主義思潮與運動的洗禮後，我才對自己這種看待事物的立場有了敏感。加上自小家庭貧窮，長大後因力爭上游能以大學（但離婚的）女教授的位置向社會發言，不論是推動婦運或談論民主政治及台灣的前途皆如此。我必須說明這個過程，才能將「國家、民主、婦女」，經「民主、國家、婦女」，到「婦女、民主、國家」的認同歷程說清楚。

愛國思想在我高中時代萌芽，特別讀了中國近代史後，對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以及做為中國人所受到的羞辱，常激憤在心，並曾參加蔣經國的青年救國團所舉辦的戰鬥營。在台大就讀時，雖去過「大新社」及「大論社」這一類改革性社團，但由於要自付學費和生活費，必須每週兼兩個家教而無法常常參與。當時，因為愛辯中國問題，不喜歡男生視我為女生，雖然我一樣留長髮、穿迷你裙和喇叭褲。在就讀台大中文系的時候，選修了外文系年輕講師王文興到中文系開的「現代文學」一課，開始和台灣的「現代文學」雜誌接觸，並透過王老師而著迷於現代文學。那時雖關心中國問題，卻更愛談「世界公民」的觀念，直至研究所畢業且結婚以後，遭遇到台灣退出聯合國此一重大事件。這個事件使我像衝破蛋殼的雛鳥，開始痛苦的面對現實，「中國何處去」的思考開始轉向「台灣何處去」了，此時對自己的認同是「在台灣的中國人」。結婚生女後搬與公婆同住，妻子加媳婦加母親的角色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時時向丈夫表示要「拋夫棄女」，再加上丈夫外遇而導致離婚。這期間已注意到呂秀蓮在報紙上發表的有關新女性的言論，女人在婚姻裡個性受壓抑的問題開始變得比國家問題更苦惱切身。裹著這兩個困惱的問題出國留學，我動身到更自由的天地想

公平，是父權制度的問題而不僅是個人問題而已。但當時最重要的心理鬥爭仍舊在國家認同的焦慮上。在這種焦慮之中，對於要留在美國還是到中國大陸或是回台灣從事改革有過重重的考慮，最後因為台灣在感情上比較親近而選擇回台灣，同時亦開始想回台參與當



要尋找答案。

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之間，我在美國學戲劇，但課外時間全在閱讀中國大陸的報紙、雜誌、文學作品和報導中國的電影，亦跟海外保釣後的左傾學生交談論辯。此時雖自視為一特殊女人（女性藝術家故不適於婚姻制度），也因接觸了美國電視上有關婦運的報導，了解婚姻對女人有著普遍的不

時由呂秀蓮主導的婦運，自覺放棄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動力在於想回台推動台灣的民主改革，也隱約地感到婦運應與民主改革齊頭並進較好。當然，選擇回台灣也與看到中國大陸報紙雜誌後，對中國政治的懷疑有關。自高中就接觸了羅素等人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對於中國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的一元觀點深不以為然。

然；當時，看過珍芳達訪問中國的影片報導及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電影後，對於他們所呈現的中國大陸的貧窮倒不以為意，認為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使然，但對影片中到處可見的毛像感到與在台灣隨處可見的蔣介石銅像一樣可厭；又看到影片中人民開會「批林批

新女性運動。記得很清楚，當時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男性前進份子都常在呂秀蓮背後說她的壞話，遊說我不要參加呂秀蓮的「少奶奶」運動，要我去關心女工和娼妓的問題。我固然也覺得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父親為小公務員），絕不如台灣的女工和娼妓那麼被壓入底



孔」，竟是全體舉手一致通過的景象，亦使我感到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只是當時相信台灣除了獨裁專制外又比中國大陸腐敗奢靡，故決定先回台灣參與社會改革運動。

一九七六年九月回台，參與當時反國民黨的夏潮雜誌的寫稿及義工活動，這期間也參與了鄉土文學和校園民歌運動，同時也主動參與呂秀蓮的

層，回台後在淡江擔任大學講師，較之許多受壓迫的台灣婦女擁有多優勢；然而，我的離婚身份和呂秀蓮的未婚身份，仍被這些改革社會的男性前進份子揶揄，他們總強調民主改革為第一義，視婦女問題為枝微末節，甚至認為中產知識婦女沒有被壓迫的問題，早就和男人平等了。

新知女文
在民主改革的陣營中，當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時頗流行革命加戀愛的自由風氣，尤其是美麗島事件前後至解嚴之後，我看到不少所謂革命英雄（不管統獨）將女革命同志當作廚娘、秘書、性愛服務的角色，不少迷惑在愛情中的反對派女性也常有苦痛的怨言，然而，當時為了不讓國民黨因此落井下石，大家都十分隱忍，卻使我切身感受民主運動中男女關係的不平等。其實，在黨外陣營中男女之間性比較開放，女人不一定吃虧，但在社會的壓力及男女之間權力不平等的實況下，女人就落敗了，所以，「單性」的性解放常讓男人得利。這些與男性牽手改革政治的經驗，變成我在美麗島事件後婦運因呂秀蓮入獄中斷而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的動力。我深深反省到，不僅是社會的保守派歧視女性，前進派也一樣不放棄父權社會賦予男人的既得利益，要是婦運沒有聲音，政治圈大概只有代夫代黨團出征的女人才能露頭角吧。

雖然如此，我仍然肯定並支持反對黨的民主運動，只是決定投入主要的精力於弱勢的婦運。在美麗島事件前一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導致蔣經國宣布將該次黨外聲勢頗旺的立委大選停住，我直覺地感到中共與美國加上蔣經國都出賣了台

灣的民主運動。我了解美國的兩面性、中共（祖國）的殘忍（不希望台灣好）以及蔣經國的不安與藉機鎮壓的手段，我開始反省自己的中國人認同，更完全否絕了世界公民的念頭。八〇年代之後，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獨統情結漸漸浮出檯面，我曾在一九八八年五月或六月時在「台大大新」上與宋澤萊辯論過統獨的問題，我反對宋澤萊因為我強調台灣與中國在血緣和文化上的密切關係而指我反對台獨，也批評陳映真不批評中共霸權即擁抱中國，當時的我似乎處在不統不獨的心緒中。

直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天安門事件爆發，共軍血腥鎮壓自己同胞，我開始認真地思考台獨－新國家運動的可能性與內涵。我大量地閱讀日據時代和五〇年代的各種文學、社會書籍，也翻閱原住民文學與文化雜誌和書籍，我體認到台灣的歷史不止是悲情故事，而且是在各種強權下求生

我的離婚身份和呂秀蓮的未婚身份，仍被這些改革社會的男性前進份子揶揄，他們總強調民主改革為第一義，視婦女問題為枝微末節。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存的奮鬥歷史，我感到女人－台灣人－原住民有不少一致的被壓迫的經驗，但又發現其間不少異質的情況。譬如說，面對中共的霸權及中國沙文主義，認同台灣人是有價值而且是具抵抗性的；但在台灣人社會裡面，不但男人與女人之間有權力與壓迫的問題，福佬、客家、外省人之間也有相同問題，漢人與原住民之間更是如此，另外還有社經地位(階級)與性傾向(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壓迫問題，因此，我要如何－尤其我已經是女權運動者－去想像一個新國家呢？

做為台灣人，我感受到中國或列強(包括美、日)的壓力；做為女人，我感受到由男人主導的父權社會的壓力；做為外省人，我感受到福佬沙文主義的不快；但做為外省籍女教授，我在面對工人男女、原住民男女時又敏感到自己較優勢的社會地位。也因此，在去年由亞洲協會贊助、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主持的「跨世紀的台灣何去何從」研討會中，我針對會中熱烈討論的「台灣人的主體性」問題，提出不能只談「四大族群」的「融合」，應該要進一步談「眾多主體」的「平等」問題此一意見。而這眾多主體除了福佬、外省、客家、原住民(原住民各族也存在各種差異)外，

也得細分男人、女人、白領、粉領、藍領、異性戀、同性戀、殘障等等主體，唯有眾多主體都有空間，彼此能平等，融合才有可能，所打造的國族才有實質的意義，才有別於中國大陸，也才能稱之為新國家運動。

但要建立一個眾多主體平等的新國家實在是個理想。就現實層面來講，中共不允許有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因此中共的霸權是導致此理想難以實現的主要因素。而民進黨與台教會等所強調的台灣人主體性亦常以福佬人掛帥，像民進黨在省長選舉時喊出的「四百年來第一戰」及總統選舉彭謝陣營所提出的「終結外來政權」等口號，要如何與原住民對話呢？台灣婦運歷經十多年的努力，並未影響台教會在分類助選演講項目時將婦女與兒童權利分開，也並未影響民進黨對性別問題的敏感度，總統選舉彭謝陣營的「天、地、公、彭、明、敏」口號編隊中還是缺了「婆」隊。去年，民進黨舉行黨綱擴大研討會，基於民進黨黨綱增列了兩性平等一章，我抱病參加研討會，晚上在討論婦女與原住民的章節時，姚嘉文一直反對將強暴問題列為婦女議題，認為婦運小題大作，使我憤而離席，之後，接到施明德主席的

道歉電話。舉出這些最近的經驗，我想說明：國家認同與民主政治的認同固然非常重要，它確實與台灣婦女的現實處境

很有關係；然而，在對

民進黨與新黨的立委之所以注意婦女問題不在於他們很進步，乃在他們知道婦運已在社會有一定
的發言權，而他們既然掌握不到國民黨安定牌下
的婦女，總不能再流失新興婦女的選票吧。

是最大的受益者就很明显了。再說，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婦運若沒有眾多女人的努力，造成今日的聲勢，累積現有的成就，我個人也沒有力量在民進黨會議中退席抗議並隨後接到主席的道歉電話。同理可證，若非台灣婦運十幾年來討伐傳統三從四德的思想及九〇年代大談性角色的開放，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也很難以「沒有三從四德」及「建國妖姬」的形象自況得意了。同時，民進黨與新黨的立委之所以注意

婦女問題不在於他們很進步，乃在他們知道婦運已在社會有一定的發言權，而他們既然掌握不到國民黨安定牌下的婦女，總不能再流失新興婦女的選票吧。

到底，認同中國或認同台灣，何者對女人比較有利？這個問題十分複雜難解。我個人認為，比諸目前的民主和物質條件來看，認同台灣比認同中國對女人有利，再進一步納入諸如族群、階級、性傾向等等認同上，因為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比中國進步，台灣的女人雖在國家認同中需繼續批評國族主義性別政治的盲點，仍比認同專制的中國要對女人有利。就像女性主義在原則上有利於所有女人，但以現實中女人有種族、階級、性傾向甚至年齡、殘障的不同，也必須讓女人的差異性出現。婦運唯有讓眾多女人主體出現並且相互交談，才能落實各種女人不同的需求。至於新國家運動，若非各種社會運動人士的無私奉獻，讓眾多主體出現，台獨建國也很可能終究是個漢人資本家父權異性戀中心的國家而已。婦運與許多弱勢的社運一樣，在想像及參與一個新國家的建造時，必須扣緊自己(女人)的立場，才能落實民主與國家的新內容吧。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男人拼鬥／女人苦撐 的 國／家

以台灣近二三十年反對運動的歷史來看，從早期的反對運動、民主運動，到解嚴後的新國家建國運動，站在女人的立場，我們都必需說，從來自諤前進、崇尚自由、追求獨立的民主鬥士們是虧欠女人的。如果我們只看到檯面上爭取民主獨立的人士(他們絕大多數為男性)曾有的或仍有的努力與犧牲，而將一切的成果都歸功於他們，那麼，實在是患了和傳統男性一樣的一性獨大的毛病，將女人的存在視若無睹。

不要說從來都有女人直接參與了民主運動，她們的貢獻卻往往被有意無意忽略，在實質權力的分配上，女性分配到的也遠遠低於男性。而那些為數更多所謂隱身在男性背後犧牲奉獻的女人就更不用說了。別的不談，英雄們身邊的伴侶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首先，和男性最大的不同是，她們絕少出於自由意願走上這樣的一條人生道路。男性們當然可以說，他們也是為時勢所迫非常不得已，但這其中的差距顯然還是相當大的。會投入反對運動的男性，就整體比例而言算

是少數，也就是說，他們不管是出自於什麼動機行事，對他們來說，選擇的空間是存在的，他可以選擇義無反顧，可以明哲保身，也可以趨炎附勢。但是他們的伴侶卻是毫無選擇的，她一旦跟了他嫁給了他，一生運命隨他改變。男性或許也可以辯稱，這是社會環境，是大文化使然，怎可怪罪到他們頭上？這裡，其實就是這些進步男性的第一個盲點。一方面，他們無法容忍統治獨裁者對人民的壓制而力圖改變；另一方面，卻無法看清自己本身也在扮演某一種獨裁者的角色，不留空間給身邊人。這種以家庭做為界線，在外推動民主、在內進行獨裁的情形，當然是充滿矛盾荒謬，也是無法說服人的。更直接一點地說，無論她們的男人在外面拼鬥出一個什麼更好的世界，對女人來說，生活的改變是很微小的。諷刺的是，愈是跟了一個選擇不認命的男人，女人愈是只能被迫更加認命，她過的將是充滿憂心孤單危險的生活，一種不同於大多數女人平凡卻安全的一生，這是少有人



知新女婦
計畫科技型國家典藏位數

能想像了解的。即使在九〇年代的今天，性別意識已經是這麼普遍的認知，反對陣營裡仍然還很少看到男性在這部份所做的反省與落實。如此，女人當然對他們所要打造的新國家到底具有幾分民主的誠意深感懷疑。

進步男性的第二個盲點是，當他們為了自己無上正當遠大的目標在打拼時，往往產生自己已經不是「常人」的錯覺，卻忘了自己所仰賴的革命本錢，其實來自於別人為他們

男性用以從事革命的物質基礎既然是來自女人體力與情感的勞動，民主的成就難道不該算入她們的功勞？

打理了屬於常人生存的一切鉅細靡遺，從吃喝拉撒到情感上義無反顧的支持。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女人被教成無怨無悔地撐持起男性的理想，讓他盡情發揮，不知道在應付求取生存的所有具體和抽象的諸般瑣事之後，還有多少男性有餘力

去做「偉大的」事？男性用以從事革命的物質基礎既然是來自女人體力與情感的勞動，民主的成就難道不該算入她們的功勞？

這些種種，過去都是隱而不見的。近來，我們才聽到零星的一點聲音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本身亦為民主鬥士、號稱「鱸鰻查某」的葉陶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活動力與膽識絕不讓鬚眉的她，在與革命伴侶楊達的對應關係中，仍不免落入沉默認命的地步。在當時，兩性間的平等對待是一個不知為何物的東西，女人能保身的唯一途徑是扮演起無限包容，將夫婿視為兒子般不與之計較的母親角色。葉陶想必也感受到這個角色帶給自己的不平衡與失落，但她卻只能在晚年寄情於宗教，抑鬱勞苦以終。如果不是其孫女楊翠以女人的角度來重新度量她的一生，她的這一段故事與她的革命處境恐怕會長埋地下。

如果葉陶做為女人的生活是多年後才假手楊翠獲得詮釋，許信良的妻子鍾碧霞在一九八九年所寫的〈隨夫波折十八載〉就屬第一手的陳述了。在其中，鐘碧霞已有別於過去沉默無聲的妻子，開始讓我們一窺做為革命鬥士妻小的生活實貌。鍾碧霞有別於之前的許多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和她同命運的女性，不再完全和夫婿站在一線結成一體，只敢把自己一切的厄運歸諸惡劣的大時代或極權的統治者，她的訴說雖然還是十分含蓄委

行的淋漓盡致的傳統女性，卻在晚年赤裸裸的道出做為民主鬥士的妻子承擔的所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如果不是受傷太重，恐怕她也不會做出這麼大



Show Them (our) Infinite Rage 吼給他看—
婉，但我們已不難從字裡行間讀出一些對於個人的責備，如許信良的脾氣怎樣愈變愈壞，常常遷怒妻小；心情不好時，怎樣以酒澆愁，怎樣歇斯底里地發作。雖然大體而言，鍾碧霞仍是許信良身旁「忠實的另一半」，但〈隨夫〉一文已經帶給我們一個不太一樣的視角，讓我們重新思考女人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

五年之後，邱瑞穗在她所著的《異情歲月》中提出了直接的控訴。邱瑞穗這樣一個自小接受日式教育，將妻母職責履

的決定。對她來說，夫婿黃順興落魄時她所受的辛苦固然不必多言，在他成功後必需遮掩的卻是更多更不堪的事實，日子一樣不好過，一刻也不得舒解。一般可以想像的困境已大於常人，更何況如本文稍前提及的，許多投身革命的男人對自身常存有幻象，以為自己已非凡人，因此他們的行為舉止，其怪異荒誕就更無法想像了。他們常認為自己既已獻身給民主，他們的犧牲理當得到旁人的補償，他們往往因此放縱自己，不惜以他人的痛苦做

為代價。而妻子，便成了當然的受害者，有苦最說不出。

從沉默不語，到別人代言，到直接控訴，在民主陣營裡的女性已發出聲音，但這些聲音顯然還不夠大，否則怎麼還沒有聽到男性們的回應？電影《超級大國民》裡有一段無情殘酷的描述。該片以男性為主要的時代受害者其實已透露出一些訊息，而片中男主角念念不忘，像迴光返照似地集中餘生精力要做的也是為他落難的

Show Them (our) Infinite Rage
吼給他看！



男性同志平反，對於妻女因他而改變的一生，沒見他有半絲回應。幾十年前他從她們身旁離開，留給她們必需自求了斷或痛苦掙扎的人生，幾十年後，面對女兒直接的指控，他仍是不發一語的走開，繼續他未竟的「志業」。女人的命在那個世界中是被視如敝屣一般沒有價值的，直到今日，歷史雖

有重現的機會，公道也還不到她們身上。

男性當然可以辯稱，這不過是個過度的階段，革命尚未成功；等革命成功，他們一定會和女人均享成果。從來歷史的事實已讓女人無法如此天真巴望，眼前的例子更証實如此。台灣目前存在的政黨，哪一個不是仍由男性在主控把持？在推動民主的貢獻上，他們之間或許有著程度上的不同，但在給予女人空間尊重女人方面，常常令女人不得不懷疑，他們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距。

幸好，今天已有不少覺醒了的女性，不再相信革命終有大功告成的一天，卻清楚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有一回。因此，在近一二十年來，她們將自己從男人身邊抽離開來，試圖打造一個不同於男性的世界。規模雖然可能還小，但女人在其中卻活得前所未有的自在舒暢。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吸引，加入她們，說不定前景可期。放在台灣的現狀，女人是不是有機會來得及打造出一個更好的國家，這個問題可能充滿變數，但女人走的路從來沒有不辛苦的，很不同的是，至少她們現在是自己的主人。

光是這一點，就蘊含無限契機呢！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撰稿：
李清如

政黨，婦運生根的另一片土壤？

從民進黨婦展會看政黨內的婦運經驗

婦女運動可能與政黨發生什麼樣的關係？長期以來，婦運與政黨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政黨在動員、組織與物質上較豐富的資源固然可為婦運所用，但是被政黨收編的困擾與焦慮卻一直存在於婦運團體內部的討論中。累積最多政治資源的傳統婦工會、婦女會系統，雖是國民黨婦女政策的決策與執行單位，但多年來，其黨意優先、維繫政權的行事作風與附屬性角色，一直備受婦運者的質疑與批判。為了堅持婦運的主體，除了在特定議題上與政黨進行選擇性的結盟，民間婦運團體多半與政黨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逐漸地，臺灣政黨政治漸趨成形，政黨已然成為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源集中的主要場域。面對逐漸成形的新政治空間，婦運與政黨間的關係，可不可能跳脫以往的思考與互動模式，在兼顧運動主體性與資源累積的條件下，與政黨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換句話說，政黨是不是能成為婦運發展的另一個場域？歷史悠久的國民黨婦工會，短期內不易轉變既有體

質；新黨尚未發展黨內婦女組織；而民進黨則在一九九三年成立婦女發展委員會，負責黨內婦女工作與婦女政策的規劃與執行。現任執行長彭婉如、副執行長劉慧君都具備相當的婦運資歷，她們在民進黨婦展會的工作經驗，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政黨內婦運工作的現況，她們對於政黨生態的觀察，也可提供婦運在與政黨合縱連橫或進行抗爭時的有利參考。我們選擇民進黨婦女發展委員會（簡稱婦展會）為採訪對象，這篇文章算是對「婦運與政黨」這個複雜的問題，進行一個初步的試探。

戰鬥位置的選擇：進行政黨內的婦女運動

來自婦運團體的彭婉如表示，政黨內比諸民間婦女團體較豐富的資源是吸引她進入婦展會的重要因素。參與婦女新知、晚晴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主婦聯盟等婦女團體的工作經驗，使彭婉如深刻地感受到，資源不足是從事婦運的最大侷限。她認為，政黨豐富的人力、財力資源，對婦運工作的開展很有幫助，而一些紮根

性的婦女工作更可經由政黨這個場域開始播種、耕耘。彭婉如認為，無論就黨內女性的活動空間、婦女參政的比例，或

說，在婦展會的工作兼具政黨與婦運的雙重目的，「一方面要為民進黨做婦女工作，一方面仍要扮演婦女運動者的角色」。



婦展會一方面藉由接觸民進黨的女性支持群眾，開拓民進黨的婦女選票；一方面從事基層婦女的組織工作，建立女人對政治的認同感—政治也是女人的事，讓民進黨的婦女支持者可以產生集體的政治力量。另外，作為政黨內部的婦女組織，劉慧君認為，婦展會的存在可以對民進黨的男性政治體質形成壓力，同時對黨內不合理的性別政治結構不斷發出聲音、提出挑戰。

自我定義的角色與工作

一九九三年成立的婦展會，以推動臺灣社會兩性處境更加平等自由為工作目標，組織運作採合議制，由十五名女性委員組成委員會，互相推選產生主任委員，由黨主席提名，經中央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常會）同意後正式上任。婦展會設有正副執行長各一人，幹事四人，以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目前婦展會主要著力在發展草根性婦女組織、制定黨內的婦女政策及推動婦女參政等方向。本身也是婦展會委員的彭婉如坦言，民進黨對於婦女議

就婦女政策的品質來評估，民進黨的整體表現都優於國民黨。從女人的立場出發，她認為民進黨是一個可以被期待的政黨。同時，彭婉如個人對於民進黨推動的政治改造運動有很深的期待，對民進黨的基本政治立場也頗為認同，因此，接掌婦展會執行長一職，對她而言，並不會產生政黨與婦運立場間的矛盾與掙扎，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雙重結合。不過，這種政治與婦女立場和諧共存，進而相輔相成的幸運，並非出現在每一個人身上。彭婉如便指出，當初婦展會徵求工作人員時，有些對婦女工作頗有熱忱的應徵者一聽到必須入黨就打消念頭了。進入婦展會，劉慧君清楚地界定這樣的選擇是「在政黨內做婦運」，她



題的關注僅止於黨綱上的原則性宣示，她說，「黨內雖以男性居多，但對於女人的問題，他們不太敢越界」，也因此，「婦展會在民進黨內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婦展會自己定位出來的」。簡言之，民進黨具體的婦女工作內容完全由婦展會所規劃。婦展會這種「自我定義」的組織定位與運作狀況，雖然說明民進黨提供婦展會相當的自由度與發展空間，彭婉如說，「只要在黨所能負擔的範圍內，婦展會想做什麼就去做」，但民進黨的負擔範圍究竟能有多大？這種缺乏定位的自由度，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婦展會在黨內地位的邊緣處境。相較於其他部會組織的資源配置，婦展會在人員編制與預算編列時，往往要小心翼翼地表現一種「省吃儉用」的自我設限態度，避免遭人質疑。

民進黨內部的性別政治生態

如果說，婦展會是一個政黨內的婦運組織，那麼，她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推動她的工作？換言之，民進黨內的性別生態如何？針對這一點，彭婉如指出，黨中央與地方的差異很大。就女性參與的程度而言，黨中央十二個部會首長中，女性佔了五個名額，而地方黨部的女性參與比例則普遍都很低；對於婦展會所提出的

議題與婦女政策，黨中央的反應與配合度較佳，地方黨部則多是虛應一下故事。民進黨的決策核心——中常會，十五位委員中只有余陳月瑛一位女性代表。但所幸余陳月瑛有一言九鼎的發言份量，在這次國代選舉中，婦展會要求婦女補徵召（稍後再詳加說明）的過程裡，余陳一句「女性參政本來就是理所當然」，馬上使其他有意見的男性委員閉嘴，為婦展會提供有力的支援。然而，在男性主導的政黨環境裡，黨內的女性公職人員雖然不少，婦展會的經驗往往是，在現實的政治運作過程裡，個別的女性公職人員很難凝聚成集體的力量，或者為了避免得罪人，或者基於個人的政治前途，在某些關鍵時刻，就連婦

展會的部份委員都會逃避自己對婦展會應盡的政治責任而選擇沈默，形成婦展會工作人員孤軍奮戰的場面。即使黨內部份女性公職人員能夠給予支持的力量，婦展會仍需面對黨內男性政治的結構限制。尤其一旦婦展會的工作去「踩到男人政治的痛腳」，影響到既得利益的分配時，黨內的反彈更在在阻礙著婦展會的作為。

婦展會在民進黨內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是婦展會自己定位出來的。



介入「男人政治」是最大的困難

無可諱言的，逐漸走上公職掛帥的民進黨，在組織運作與政治決策上仍不脫男性主導的風格，由家族與地方利益形成的派系力量，更直接影響婦展會所推動的婦女參政工作。民進黨中央雖然以開放的態度任由婦展會發展，政黨內部既有的政治生態卻是婦展會時時面對的現實難題。實際的狀況是，婦展會推動的工作一旦介入「男人政治」就會產生很大的困難。彭婉如分析，民進黨中央雖然意識到開拓婦女票源的重要性，卻未反省派系掛帥的「實力原則」對婦女參選造成的阻礙，「民進黨裡有非常多的地方山頭，講求的就是實力原則，如果沒有一個政治家族的背景作為靠山，婦女要出來參選會有實際上的困難」。又由於婦女的政治處境並不在民進黨所認定的弱勢標準內，女性候選者並不能享有黨內針對政治弱勢族群(例如原住民身分的候選人)所補助的七十萬參選經費。種種條件的限制下，彭婉如說，「即使婦女有意願、有能力、有資格、也有選上的機會，但是選舉要錢、要人的情況下，即使她是很好的婦女代言人，但是選舉的實力就是出不來」。民進黨內部由派系利益主導的「實力原則」，背後所隱

含的其實是一種傳統男性政治的迷思。所謂的「實力」，只是政治人物能夠掌握多少人頭黨員的數目、或是能否獲得地方山頭的奧援罷了，而非考量候選人的學經歷條件與政治理想。這種縱容派系權力的「現實」原則，正逐漸地侵蝕著民進黨原有的理想性，使民進黨在提名策略上重蹈傳統政治的盲點，遠離了其強調保障弱勢參選的原則。基於這種對黨內政治生態的體認，婦展會試圖透過婦女保障名額來改善黨內女性在參選上的弱勢條件，而此舉無疑直接衝擊到男性政治思考下的派系卡位和角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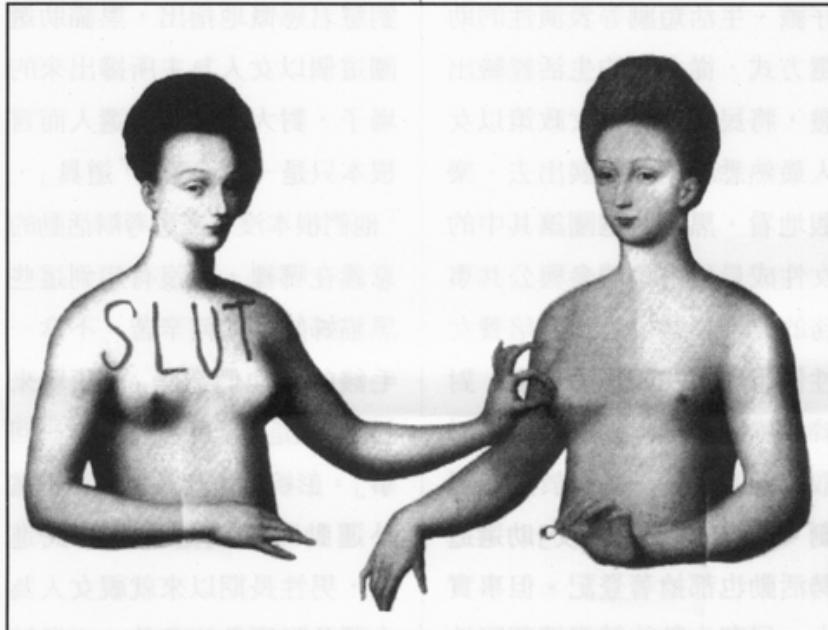
以今年的國代選舉為例，在黨內的提名作業完成後，婦展會一發現全國尚有十二個婦女保障名額，便立即向黨中央提出補徵召的要求，黨中央通過這項決定後，立刻引起許多男性候選人的不滿與反彈，婦展會當時的處境幾乎可以用「人人喊打」來形容，各地方黨部蜂湧而來的電話指責，一度讓婦展會的工作人員應接不暇，忙得焦頭爛額。對傳統男政客而言，補徵召女性參選只會瓜分原有的票源，婦展會的動作根本不具有開拓新票源的意義，他們認為，婦展會根本在「攬局」、「亂了部署」。婦展會徵召林美踏(基層婦女勞工中心負



責人)參選國代，便遭受臺北市黨部強烈反彈並拒絕為林美玲輔選。婦展會雖然為林美玲爭取到民進黨的徵召提名，實際上卻無法提供她最實質的政黨資源，只能靠林美玲自己硬著頭皮選下去，使得此一徵召淪

會，進而深化女性政治弱勢處境的性別歧視制度。面對黨內男性化的權力生態，婦展會一直在尋找著力點。她們思索的結果是，唯有強化基層婦女組織的實力，將支持民進黨的女性群眾找出來並且組織起來，

STir Is Real 「騷動」騷動」



為試探性的犧牲打，喪失原有的意義。事實上，擁有所謂的「實力」，能保障與維繫的只是既有的派系利益，並不表示參選者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良好的人品學養，也不能保證在選舉時能夠獲得選民的認同並獲得選票。缺乏派系背景的女性候選人，在「實力原則」的考量下根本很難出線，即使獲得黨的提名，也不易成為地方黨部輔選與動員的重點對象。就女性的立場而言，「實力原則」所主導的初選制度與提名策略，就是阻礙黨內女性參政機

才能扭轉黨內講求「實力原則」的男性政治結構，打破「實力原則」對婦女參政的限制，進而建立起全國性婦女組織聯絡網。而這不僅是婦展會目前工作的重點方向，也是婦展會終極的發展目標。

黑貓經驗的挫折與啟發

一九九四年成立的黑貓助選團，是婦展會將觸角深入基層婦女的一項新嘗試。以「獨立思考」、「積極參政」為宣言，黑貓助選團的責任除了號召具有行動力與本土意識的臺灣女性實際參與選舉過程，更要讓

基層婦女的力量藉由這個組織得以聯繫起來。黑貓助選團創造了讓婦女支持者現身說法的空間，也在去年參與了二十幾場民進黨的全國巡迴助選活動。劉慧君指出，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黑貓姊妹，以歌仔戲、生活短劇等表演性的助選方式，從女人的生活經驗出發，將民進黨的婦女政策以女人最熟悉的語言推展出去。樂觀地看，黑貓助選團讓其中的女性成員獲得集體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經驗，也達到培養女性情誼、自我成長的作用。對於黑貓助選團，候選人大多採取歡迎的態度，而對於黑貓規劃、提供的「婦女之夜」助選造勢活動也都搶著登記。但事實上，只有少數的競選總部與地方黨部會給予這些黑貓們相當的配合與重視，多數候選人採取的是放任的姿態，打聲招呼罷了。許多黑貓姊妹的共同感受是，「他們很不把我們當回事」。在實際的活動過程中，這種不受尊重的感覺也不斷地出現，像是「表演節目進行到一半，就有候選人想要打斷來上臺亮相」、「表演中燈被關掉」、「候選人演講時間過久就砍掉預定的節目」、甚至包括被罵的經驗。在助選時所遭遇的一些被潑冷水的經驗、熱臉貼冷屁股的挫折感，讓黑貓姊妹

們體認到選舉造勢一貫的男尊女卑的政治邏輯，也讓她們發現，民進黨雖然口口聲聲要爭取婦女票，甚至以建立「女人福利國」作為選戰主軸之一，但面對基層婦女的熱情參與，卻連基本的誠意也沒有展現出來。劉慧君感慨地指出，黑貓助選團這個以女人為主所撐出來的場子，對大多數的候選人而言根本只是一個造勢的「道具」，「他們根本沒有去思考辦活動的意義在哪裡，也沒有想到這些黑貓姊妹是如何辛苦、不拿一毛錢的為他們造勢」，簡單來講，「就是完全不把女人當一回事」。彭婉如則認為，不論是黨外運動時期或是今日的民進黨，男性長期以來就視女人為人頭及附庸性的角色，不是被派系利用來進行政治卡位，就是重複做著「臺下發傳單、臺上唱歌表演」的傳統工作，婦女的主體意識從不曾獲得充份的尊重。話雖如此，這些挫折黑貓姊妹的經驗仍有其正面的意義。也許對多數候選人、地方黨部而言，黑貓助選團不過是跑跑龍套、幫他們省了辦場子的力氣，但這些黑貓姊妹卻因此累積更多辦場子的經驗，最起碼，她們藉此觀察並了解到政治是怎麼一回事。由婦展會編輯發行的「民主查某人月刊」創刊號所登錄的黑貓感言中，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可以看到黑貓姊妹對民進黨的期許——「民進黨執政後應減輕婦女的負擔」；而接觸到真實政治與選舉現實的黑貓參與經驗，也引發了許多婦女對於自己政治處境的重新思量——「女人在政治中是這樣不受尊重」、「『女人關心政治』被視為貓狗小事」；而女人的主體意識也因

我們已不能再要求一種不涉及政治、階級或其它認同的所謂純粹的婦女運動與認同，而政黨政治是婦運正開始積極面對的一個面向。

此逐漸萌芽茁壯——「黑貓助選團或許不能解決女性的問題，但她們給我憤怒的力量，我要告訴男人們：女人不是好欺負的，再不看重女人的票，你們以後就選不上了」！劉慧君說，婦展會必須持續地發出女人的聲音，「至少妳要一直講、一直罵，讓他們知道有妳的存在，在即使他們覺得

很刺耳，這還是有些影響」。彭婉如也表示，黑貓經驗的積極性來自於串連各地孤單的民進黨女性支持者，讓她們大聲說出對民進黨的褒與貶，甚至展現出女人的憤怒，因為只有女性支持者發聲，才能對民進黨展現女人的力量，刺激民進黨重視女人的需求與利益。

婦展會的組織目標：讓女人們集

體站出來

婦展會的責任之一是完成黨中央所交付的開拓婦女票源的政治使命，而這需要增加婦女在黨內的實力；但在黨內公職、派系掛帥的局面下，缺乏派系力量支撐的婦展會，也就表示缺乏政治實力。劉慧君的工作心得是，「在民進黨內，只要不去介入到派系鬥爭，大體上事情就很好辦」，但是要增加婦展會的政治實力，就必須介入民進黨已建構起來的政治運作模式，「問題是，我們婦展會這群人哪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跟那些男人去拼」！在這層體認下，婦展會將發展方向朝向「在各地方黨部建立草根性的婦女組織」，劉慧君說，「假如民進黨的女人們可以集體地出來，競選黨代表，進入黨內最高權力機構一黨代表大會，才能加強婦女的基層實力」，但她也瞭解，「這個改變的可能，可能是很困難、也是很長久的」。但此一由工作經驗而得到的深刻體會，促使婦展會將組織目標定位於培養基層婦女實力的紮根工作，透過下鄉去接觸支持民進黨的女人，找到婦展會所要的目標群眾，集體培養女人對政治的敏感度，並建構出女人的主體意識。甫發行的「民主查某人月刊」即承擔著聯繫婦女群眾的作用，而即將推出的基層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女人的紮根組織手冊系列，以及讓女人了解臺灣獨立建國主張的「建國食譜」，都透露出婦展會傾力投入草根婦女組織的企圖心。這一切，無非是為了要強化民進黨基層女性的政治實力。婦展會的想法是，唯有從根破除性別不平等的黨內政治生態，民進黨才有機會真正成長為一個能夠被女人所期待的政黨。面對這次徵召林美玲參選國代所遭受的黨內反彈，以及衍生的種種有關婦女與政治參與的問題，婦展會準備動員黨內外的力量，在今年黨員代表大會中提出婦女參選的弱勢問題，「讓民進黨更具有女人的聲音與立場」。彭婉如表示，藉由黨綱黨章的討論與修訂，婦展會期待能促使民進黨提名作業逐漸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婦女保障名額比例，「這是婦展會重要的一仗」。抱著「做了就有經驗，有經驗才有改進的基礎」的做事態度，已接掌婦展會近一年的彭婉如說，「最主要是婦展會要怎麼做」。她感覺，「一些黨內男人對於婦女議題的漠視、歧視，其實是他們真的不懂，不會站在女人的立場來思考事情」。在這樣的考量下，民進黨婦展會絕對有存在的必要性。婦展會在串連地方婦女組織、提出婦女政策、開拓婦女票源的工作上，也要「讓女人

自主的精神出來」；彭婉如強調，「做一個女人的信心能夠出來，女人的生活經驗可以端上檯面，可以形成政策而不再是附屬，這就是婦展會要的東西」。

在與體制、社會資源較勁與拉扯的過程裡，婦女運動的空間不斷地在改變，我們已不能再要求一種不涉及政治、階級或其它認同的所謂純粹的婦女運動與認同，而政黨政治是婦運正開始積極面對的一個面向。由婦展會的經驗可以得知，政黨固然可提供較穩定的資源，但面對政黨內部的現實原則與父權機制的運作，婦女組織往往只能爭取到有限的資源。可見，進入政黨與獲得充足資源以推展婦運之間並不能劃上等號；換言之，選擇政黨作為婦運的發展空間，就必須掌握政黨的運作邏輯，從中「鑽營」出婦女參政與婦女組織的空間。婦展會的經驗顯示，增強婦女組織在黨內的政治實力是確保運動發展與打破黨內性別限制的重要基礎。不同的婦運位置面對的是不同的環境與挑戰，畢竟，資源是不會平白從天空掉下來的。

*特別感謝婦展會彭婉如與劉慧君於百忙中接受訪問，並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使我們能夠順利地完成這篇文章。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女人賭爛票 的政治

前言：女人與政治

女人在政治領域中成為主體，這一直是婦女運動希望推動的目標之一，而婦女參政則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必要手段之一。尤其在此三黨政治日漸複雜多變的時刻，運動者更需要思考細緻的策略，以便在與三黨斡旋拓展婦女議題空間的同時，壯大婦女解放運動本身。當然，參政並不只是被動員投票助選或推舉代表女性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參加選舉而已，如何使更多女人積極關心政治，在各個層次上主動參與政治，塑造政治的新結構新面貌，使女人成為政治主體，才是更長遠的前景。

以這個寬廣的參政目標而論，1994年的省市長選舉過程中，女性主義者圍繞著「女人賭爛票」的選舉策略所進行的對話和辯論，把有關婦女參政的思考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這個有關女人與政治的爭議不但對婦女參政的理論有意義，同時也對婦女運動整體的運動策略——特別是在主體的呼召和認同的形成方面——有深刻涵義。在台灣接連不斷的選舉中，這個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再思。

女人賭爛票的歷史時刻

一到了選舉時分，認同政治就升到了最高點，所有文宣和策略都瞄準如何創造最大的向心力，也就是最大的（族群、政黨、地域、宗教、國家等等）認同。但是這個「最大」的認同，並非增加認同內容的龐雜多元，反而是要求純淨同質，在這種認同政治下，一些認同得到凸顯強化，意味著其他已經或尚未浮現的身份認同勢必遭受削弱甚至壓抑，在這樣一個凝聚共通性、共同利益，甚至抹煞差異、醜化弱勢的場域中，長年被視為瑣碎的女人認同仍被放在角落中積灰，只在大場合中拿起來揮舞一下，表示彩虹聯盟的色量中還有女人。面對這種只做花瓶，卻無真正意義的對待，女人不得不主動思變，這不但是對個別的選舉時刻介入施力，也更是思考如何在已然成形的選舉政治中凸顯性政治的運作。

1994年底省市長及省市議員大選的時候，媒體把選戰吵得火熱，族群和黨派的認同更因為新黨積極參與台北市長的角逐而白熱化。可是，以婦女運動的角度來看，不但各黨派推出的女



女人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性候選人不多，有關女性權益的政見也仍是陳腔濫調的托嬰政策等等，甚至連主要的明星級候選人的婦女政見也通不過婦女團體的檢視。在這種高度動員女性但缺乏實質性別內容的選舉中，我提出了「女人投賭爛票」的說法來介入主流的認同政治，順勢正可以創造女性參政的真正有利局面。

「女人的賭爛票」建議，如果女性選民心目中沒有合意的候選人，或者覺得投票沒什麼意義但是常常被催促去投給某位候選人，那麼她們就可以去投賭爛票以表達心中的不滿和賭爛。這種投票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女性選民不必管候選人是哪一黨的，反正投給女性的候選人就是了；另一種則是女性選民可以依著她個人生活中男女互動的品質，來決定要不要投票給生活週遭的男人

所支持的候選人。

有趣的是，不管是媒體的報導或是學者的批判，都只對其中「女人投給女性候選人」的賭爛票投以關愛的眼神，點名加以批判，對另一種「女人用親密關係的品質來決定投票給哪

女人賭爛票是面對惡劣選戰局勢所提出的策略，是對看來無處施力的現況提出的攬局做法。

個候選人」的賭爛票則避而不談，只迂迴的表達強烈異議。

這個不平衡的現象頗值得我們探究，或許可以從這個偏愛中看出什麼苗頭來。

我在提出賭爛票的一開始就強調過，女人賭爛票是面對惡劣選戰局勢所提出的策略，是對看來無處施力的現況提出的攬局做法。婦女團體對三位號稱最進步的台北市長候選人競選政見進行女性意識評估，結果評價幾乎都不及格，別的候選人就更不用提了；在各個政黨的提名名單中，女性候選人的比例極低，政黨的說辭是女性黨員實力不足，可見黨團平日並未積極投入培育女性黨員參政；少數有女性意識的女性候選人投入選舉，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她們都無法得到諸多黨團的選舉機器做後盾，而必須在黨派主導的選舉中個別奮戰——選戰中的性別惡劣局勢在這些現象中可見一斑。

使女性得力壯大的主體性投票

當然，面對這種惡劣局勢，有不少勇敢積極的女性選民已經找到了施力點來改造現實。她們或者已有確切投票取向，或者甚至已具體加入助選，作為個人參與選舉的方式，她們既不會覺得賭爛，也不必賭爛，因此也不必考慮投賭爛票。

可是，我們周圍有許多其他女性，她們還沒有具體的投



票方向，或者對政治感到可怕、無力、冷漠，也從不奢望有暇有力參與民主過程。對於這些女人而言，責備她們不關心政治、不去聽政見、不明白政治是非，並不會說動她們投入政治，因此也不可能在政治領域中具體改變她們(以及所有女人)的處境。至於採取「啟蒙」的高姿態，宣稱從台灣歷史階段性或結構性的角度，要求女性此刻以「公民」身份做特定的投票，也只是又一次使女人成為被動的投票部隊，更不能使女人成為政治主體。

女人的賭爛票在這個節骨眼上所做的，就是鼓勵這些女人不要自外於政治領域，鼓勵她們以最不費力但是能使她們「得力壯大」(empower)、使她們在政治場域中表現主體性的方式來投票。

換句話說，女人的賭爛票是在賭爛的同時，也嘗試以這種「非理性」的投票行為來創造新的權力邏輯，新的女人主體認同。

因此，我所提的第一種賭爛票就是嘗試在目前被大力建構的認同邏輯中投下變數。不管是選舉季節或是平常日子，主流的意識形態未嘗一日鬆弛其主體建構的工程，於是，族群融合、民生建設、國家認同等議題很早就被凸顯為最值得

大家關心的事情，合於現有社會結構的道德人倫更明確的規範我們的身份定位，而我們也被鼓勵按著這些軸線建立我們的認同(立場)，以便在不攬擾既存權力邏輯的條件之下，以認同的實踐來鞏固現況。至於我們日常在壓迫關係中被規劃的社會位置(如女性、同性戀、無產階級等等)，主流權力集團從不會鼓勵我們在這些位置上發展出相應的認同，而當有人舉出這類帶有抗爭意味的認同時，通常還會被斥為無聊的搗亂。

到了選舉時刻，既有的主流認同就更有用了。熱衷選舉的人要求我們扮演好公民的角色，要我們好好的聽那些不是我們推舉的候選人的政見，並且按著那些已經突顯的認同軸線來考察政見，選出整體而言比較優秀的政客。在這種橡皮圖章式的選舉儀式中，女人仍是弱勢，女性權益仍然不受政黨重視。女人只是被動員，在一個我們不能玩的遊戲中做名義上的裁判而已。

在支持選舉的人看來，這種選舉卻是「理性」的，其中的「理性」則是既有的權力邏輯，既有的認同遊戲，而不按這種理性邏輯投票就被視為胡鬧，就是虛無。

知新今婦 面對這種不利女人身份認

計畫型國家科技典藏位數



同的選舉局勢，我的賭爛票說法建議一個因應的策略：心目中沒有理想候選人的女性選民，宣告主動干犯現有的投票「理性」，宣告暫且擱置此刻不情願就位的公民認同，而採取女人的認同，公開呼籲把票投給女性的候選人，來突顯我們對性別認同和性別權益的重視。這樣才能把女人的身份認同推到選舉的檯面上，讓政黨認識到女性身份和女性權益的

說，除了呼召女人投票給女人，我們同時也要進行另外一些論述工作，好讓這個「女人」的概念不至於僵化凍結。

因此，當我們在選戰中凸顯女人認同時，我們同時也反對另外一些說法，比如：女人的生理本質決定了也解釋了女人的其他（人格、心理、情感等）特質以及她們（支持的、撫養的、生殖的等等）既定社會角色；或者，女人的生理本質應

畢竟，當「女人」的議題成為施政的重要考量，「女人」的代議士大量進入政治場域，「女人」不再被當成一個有高度同質性的範疇而加以制度性的壓迫，「女人」可以發展她們無窮的多樣面貌和生活方式時，「女人」才能悠閒的去「聽政見，選政客」。

急迫性，進而在今後的選舉籌畫中，持續大力培養可能的女人候選人，慎重的思考和女性相關的政見與方針。

畢竟，當「女人」的議題成為施政的重要考量，「女人」的代議士大量進入政治場域，「女人」不再被當成一個有高度同質性的範疇而加以制度性的壓迫，「女人」可以發展她們無窮的多樣面貌和生活方式時，「女人」才能悠閒的去「聽政見，選政客」。

非本質主義的女性認同

這裡的「女人」被框上引號，是因為即使在凸顯女人身份認同的同時，我們也不忘記它的變動性與顛覆性。換句話

該可以決定而且統一她們的性偏好、性口味、性表現等等。對於這些帶有本質主義盲點的常識，我們一概拒絕。

但是，對本質主義的疑慮並不表示「性別」這個概念已然全面破產，不能再被策略的使用為抗爭的範疇。事實上，在這個大部分人口仍然相信生理性別的社會環境中，在特定場域裡用生理性別來呼召女性主體，似乎還是一個頗為有力有效的策略。畢竟，當我們的運動提出「女人受到歧視」或是「女人應該享有身體自主權」時，我們也是在某種模糊的女性身份認同基礎上發言而且被聽到。要不然，我們憑什麼相



信有(女)人會感同身受的對號入座，認為自己正是那受到歧視，被剝奪身體自主權的人呢？

我認為女性主義論述中的本質主義「性別化約論」傾向更常常表現為另外一些常見的危險說法，如：相信生理特質根本的決定了主體的性別認同或婦運立場；或是相信只有單純的「父權」才是性別分析的唯一關注，而階級、年齡、情慾取

成為壓抑其他邊緣認同及社會不滿的政治。如果我們真的擔心本質主義的問題，那麼真正要對抗的反而是這些性別化約論的說法。

漫長的主體建構戰

不過，相信「理性」選舉的媒體和學者之所以對我的「非理性」建議抱持高度警戒，倒不是出於對於本質主義的反省，而更主要是出於對現實政治的某種考量。因為，若是選民按著

女人，當然也必須在長期的抗爭對立過程中，一點一滴的營造它在具體生活中的形體，深化它在具體女人主體意識中的實在意義甚至實踐。

向、族群等等社會因素在性別分析中是次要或甚至不必要考量的面向；或者相信某種階段論是必然的(即，婦運有階段發展的不變順序，某些議題有必然的優先性等等)；或者相信性別不僅是「性別表演」，而還有更「根深蒂固」「不變」的基礎，是不可能被顛倒或諧擬性別的實踐表演(如人妖易裝等)所顛覆等等。這些本質主義式的說法普遍到一個程度，許多人認為它們才是女性主義的真義，也因而會用這些立場來詮釋並檢驗婦女運動的任何策略，渾然不覺這種做法會使得婦運的認同政治再度步上現今主流「尋求同質化的認同政治」的後塵，

既有的認同和權力邏輯投票，那麼這種投票活動中的變數很少，各個候選人可以沿著既有的社會軸線運作，可以很有自信的進行選戰，而不必改動現有的政治關切及權力分配。要是換了邏輯，換了遊戲，那多不確定啊！對只想「換人(黨)做做看」，但是不想「根本改變現有遊戲邏輯」的人而言，她／他們是不能冒這樣的風險的。

於是，絕地反攻的「女人賭爛票」，很快就被描繪為固執己意的「女人選女人」；一個理性的、充滿抗爭意味的「非理性作為」，被刻劃為「盲目、荒謬、偏頗」的無知行為。

在這種敵意中，選後的「事



實驗」被當成了反駁賭爛票的最佳明證。許多人指出，台北市標榜女性立場的女候選人在1994年的選舉中一一敗北，證明了女人賭爛票根本無效。

可是，這種選後檢驗是昧於意識形態建構過程的複雜性與爭戰性的。主體的建構從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事，現有的主體認同，不管是「台灣人」、「賢淑的女性」或是「孝順的子女」，都是在不斷重複的意識形態運作過程中形成的，其中耗費了無數的社會資源，也壓抑了許多其他的認同和利益。現在若是要改弦更張，要凸顯另一個認同位置，而且是一個帶著抗爭意味的主體位置——女人，當然也必須在長期的抗爭對立過程中，一點一滴的營造它在具體生活中的形體，深化它在具體女人主體意識中的實在意義甚至實踐。婦女運動日復一日的努力不就是在創造這個「女性意識」嗎？

在抗爭的長河中，女人的賭爛票正是建構女性意識的努力，是致力「解毒主流意識形態」的一份努力，如果要發生鞏固女性主體身份認同的效應，當然還需要更多的耕耘，更多的擴散。因此，迅速的斷言賭爛票對女性主體建構沒有功效，這恐怕不是什麼實證的結論，而是根本就不想女人賭爛

票的可能效應有任何機會生根壯大。

衝破公私分野的投票行為

如果我建議的第一種賭爛票是嘗試在公領域大力建構的認同邏輯中投下變數，那麼按著親密關係的品質來投票的第二種賭爛票，就是想把私領域日常生活的權力不平等引入公領域的選舉政治，企圖拉平公私領域的重輕之分，以及性別在其中的差別待遇。

因此，第二種賭爛票認為，政治上的投票決定應該與日常生活的互動品質相提並論。如果有些女人自己沒有特別中意的候選人，而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周圍的男人(不管是丈夫、父親、男朋友、家族長輩，甚至上司、男同事)平日對她們不好，到了選舉的時候還拼命灌輸選情，積極左右甚至要求這些女人投票給某位候選人，那麼此時女人就可以宣傳第二種賭爛票，讓大家都知道女人要用選票來表達她對日常性別互動的不滿。換句話說，要是男人對女人不好，女人在投票時就絕不會投給那些男人所支持的候選人。

有意思的是，媒體和學者花了不少精神去批評第一種賭爛票，指出女人按著候選人的性別投票是多麼不理性，但是遇到了看起來更不按(公民)理



性投票原則的第二種賭爛票，她／他們卻完全不談。或許是她／他們認為這種投票方法太瑣碎，太個人，太沒有具體意義，因此不想浪費時間討論。或許她／他們認為在這種處境中的女人很少，會按照這種原則投票的女人更少，因此不屑批評。但是一般普通婦女看在眼裡，讀在心裡的，卻是和日常生活直接相連的第二種賭爛票。比方說，我的賭爛票說法一出，便有南部鄉下的鄉民代表太太打著長途電話找我，說是她們的鄉村有不少婦女常常被丈夫毆

打，有氣也說不出，她們聽到賭爛票的說法都很興奮，在市場交頭接耳，說是這一次的選舉要給她們忙著替候選人做樁腳的老公好看。

女人的選情資訊網路

其實，投票是一種隱秘的行為，在投票間內，我們本來就有權力投給任何候選人，我所鼓吹的兩種賭爛票只不過把這個隱秘行為拿來公開操作，以便改善女人的權力處境而已。作為公開的操作，女人賭爛票當然一定要以登高一呼或是交頭接耳的資訊傳播來創造有利形勢，因此我的賭爛票說法也非常強調女人之間的資訊

交流，更鼓勵女人利用這個公開的宣傳口號，進行耳語運動，攬擾選戰，進行女人抗暴的游擊戰。這個屬於女人的選情網路還可以在日後形成另外一種姊妹情誼的組合，在彼此扶持中強化女人的主體性。

有人擔心，女人要是直接以此挑戰原本就不善以待的男人時，會引發這些男人的怒氣，給自己帶來更多的麻煩。

可是這些多慮者沒有想到的是：女人根本不用把話說滿說白。以省市長選舉中批評者對當時擴散有限的女人賭爛票說法持強烈反

應來看，只要有許多女人開始傳播女人要按性別或是日常的男女互動模式投票，製造出天下即將大變的氣氛，用這個說法當作改變自我處境的籌碼，那麼，耳聞此事而又沒有辦法強逼女人亮票以明心志的男人，就不得不用心思了。這種賭爛票主要是迫使那些自大自滿的男人首度慎重考慮，要不要改善和女人的關係，以保障自己支持的政黨在選戰中獲勝，也保障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實現。而當這種理念不斷擴散時，這些男人所屬的政黨也不得不對黨員的性別互動關係提出改善的意見，以保障自身

在選戰中的勝利生存。

當政治在瞬息萬變的選戰中被顯示為和性別生死攸關時，性別才有可能在政治掛帥的局勢中保存運作空間（就像立法院中的「關鍵少數」一樣，我們的名詞則叫「關鍵性別」）。

相信選舉的人又要憂心忡忡了。她／他們說這樣「亂搞」，會搞壞了選情。

說女人的賭爛票會搞壞選情的人，主要是認為賭爛票會偏袒甚至圖利某個政黨，可是這個說法根本站不住腳，恐怕只是反對賭爛票的人想要抹黑賭爛票而使用的藉口而已。因為就第一種賭爛票而言，台灣省長和台北市長這兩個職位並無女性候選人出線競爭，所以要女人投票給女候選人並不會對省市長選局產生影響。而在其他選舉項目中，雖然反對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通常比執政黨多，但是數目其實相差並不懸殊。另外，如果說第二種賭爛票有可能會影響某政黨在選戰中的勝算，那就是假設該黨的男性選民對待他們週遭的女人選民比較差。這當然是一個荒謬的假設，因為我看不出今天在台灣為什麼某個政黨的男性支持者會特別惡劣對待其週遭的女人，以致這些女人賭爛投票給其他黨的候選人。不過，如果真有這種政黨，婦女

運動就更應該用賭爛票來抵制這個政黨。

邁向突破的選舉策略

要女性選民「理性慎重的選擇投給政見比較好的候選人」，這種陳腔濫調的動員策略，或者採高姿態的啟蒙說辭，都沒有考慮如何介入並改變現有的投票邏輯，甚至也沒有想出什麼新的法子來鼓勵並吸引那些無力無意投入政治領域的女人前來投票。女人賭爛票的說法至少嘗試在這兩方面突破現有的權力邏輯，創造女人參與政治領域活動的慾望，甚至構築新的女性選情網路和新的女性主體性。

當然，不管是第一種或第二種賭爛票，它們所致力促成的效果都不是一時可成之事，也都還需要更多的論述建構與擴散。不過，台灣的選舉那麼多，沒有確切投票取向或者助選參政機會的女人那麼多，不用這些策略來具體促進女人地位的改善，不用這些策略來積極創造女性參政的有利局面，好像也實在太可惜了。

最後，容我在此引用我自己文章的結尾：「女人賭爛票的投票模式是在女人的弱勢困境中不得不然的策略性做法，我們熱烈期待並積極營造一個讓女人真正有選擇的民主社會。」

新知女婦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顧
燕
翎

飛彈與國族主義

去年夏天，曾有一批左派人士到大陸開會，媒體報導他們建議中共升高對台軍事威脅，以壓抑台獨氣焰。雖然他們回台後否認此報導，去年中共試射第一顆飛彈後，的確使得某些人在言行上謹慎了許多。可是接二連三的導彈也產生了另外一些副作用，原本對統一頗存幻想的人被激出了同讐敵愾之心，誓言保衛台灣，台獨的基本教義派看在眼裡，心中大樂，忍不住脫口而出：「該多射幾顆飛彈。」轉眼之間，原本水火不容、互相對立的兩派，為了不同目的，竟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交集：贊成第三者對他們雙方都宣稱深愛的台灣採取武力威脅，置台灣居民和他們自身的生命財產於危難之中。雙方雖然長期互相憎惡敵視，顯然他們之間仍存有強烈的共同點，而這個共同點強大到超越他們的相異相斥，使得他們不約而同做出如此雷同而又如此激情的反應，激情到置生死於度外之地步。

他們大同之處在於其共同信奉國族主義，小異則在於中

華民族國族主義與台灣國族主義之對抗，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芸芸眾生，夾處於這兩個充滿了激情與雄辯的想像社群之間，至少就目前的統計資料和選舉行情來看，是顯得有點不知所從的。

國族是什麼

在有關國家的論述中，國族往往被建構為一歷經考驗、萬古常新的存在，以突顯其神聖偉大。但事實上，國族在人類歷史中是一個相當晚近的概念，十八世紀末才誕生；也就是說，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在帝國崩潰，天主教式微以前的歐洲及世界，人們尚無法想像現代國家或國族的意義。

什麼是國族？《想像的社群》作者安德森在研究了兩百年以來國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播以後，將國族定義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國族是想像的，因為不像社團或家族，其成員彼此相識，大部分同一國族之成員彼此毫不相知，也不相聞問；但是在想像中，國族並非無限擴展，而是有界線的，國之外尚有他國，即使最狂熱的國族主義者也不追求統天下於一國。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的境界；此外，由於國的概念誕生於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時期的歐洲，成熟於宗教多元化的時代，個人的自由獨立十分受到重視，國家的獨立自主亦被視為不可或缺；最後，即使國族之內實際上充斥著不平等和剝削的關係，國族仍被想像成一個生死與共、不容分割的共同體，以致兩百年以來，數百萬生靈願意為此有限的想像獻出自己的生命。

眾多個人願意為國捐軀，卻絕不願為某一政黨——如國民黨、民進黨，或某一社團——如婦女新知、扶輪社做同樣的犧牲，在安德森看來，是基於國族之愛的特殊性質，像「母國」、「家鄉」之類的用語都在突顯個人與國族之間親情般不可分割的關聯。就是因為國和家一樣，都是生下來便已註定，非個人可以選擇的，所以傳統上被認為應是個人無條件、無保留地愛和效忠的對象，國族的榮辱生存遠超過個人的生命。

不過，從婦女史的觀點，母土或nation(原意為出生、鄉土)等詞彙根源於不強調差序格局的母系文化，而八、九千年前在歐洲已發展出高度文明的母系社會，因為長期承平，不習戰事，終於不敵尚武的亞利安父權文化入侵，全面敗亡。

以宗族部落為主體的母土被有組織力、戰鬥力的父國取代，父國雖然摧毀了母土，卻不斷藉由動員人民的童年感情、鄉土之愛來鞏固其統治。

女性主義與國族主義

七〇年代以後，激進女性主義對於自然與文化的論辯，對於家庭內權力關係的檢討，都無可避免地波及國族神聖不可動搖的地位，父權的國和父權的家被視為平行和互相支援的系統。從質疑家中的父權、夫權開始，女性主義者接下來難免探索賦與父、夫特權的國家體制的父權本質，反映在諸如上下分明的層級結構，由男性把持，排除女人的權力分贓制度，以及暴力(軍事的和警察的)傾向等等；其次是國與家兩大權力系統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當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全部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不僅被摒除於公共決策，即使在家庭內也附屬於男性家長之下，受到個別男人的支配和佔用，例如，脫胎於德國法制的中華民國現行民法即明目張膽地剝奪已婚婦女居住自由、財產管理等基本權利，而婦女團體修法的努力也在立委的抗拒之下顯得困難重重；此外，在西方個人主義傳統內形成的現代國家概念，為彰顯國家主體性，往往以「他者」對待外國，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特別是非西方國家，兩百年以來，西方工業國在經濟成長的目標下，以他國為殖民地，攫取自然資源和擴展市場。外在與內在（家庭內）殖民雙頭並進的結果，造就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強化了父權體制，也因而延續了他者——婦女、自然和（第三世界）外國人被剝削的處境。近十年來，生態女性主義者更發現，即使國家的初始目的在保護人民，提供服務，但隨著資本國際化的大趨勢，國家的功能表現在為跨國公司護航多於保護國內的弱勢者以及生態體系中無法為自己發言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而在國家之內，在激烈的政權競爭中，我們也經常看到傳統政治團體和政客為了本身的生存和利益，往往沒有獨立思考和行動的空間，而不得不做權宜的選擇。

對於國族主義和國族政治的批評不只來自殖民國家內部女性主義者的自我檢討，也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婦女的後殖民經驗。Vandana Shiva以印度經驗為例，說明印度獨立以後，在經濟發展政策和國際經援的引導下，國家的角色如何轉變到為了跨國公司提供自然資源、基本服務、租界地、基本設施和專利保護，並使他們免於受到人民要求勞動權益以

及健康權、環境權與人權之「騷擾」。當印度國會議員要求就智慧財產權進行公開辯論時，商務部長卻在美國三〇一法案的壓力下，明白表示公共利益未必符合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卻取決於國際利益。在主權受到侵蝕的情況之下，印度教基本教義派乘虛而起，強調軍事武力，卻未能拒絕國際資本主義以及西方的生產方式、消費型態和文化價值，陽剛重武的結果反而促使內部分裂，引發暴力衝突。

國家認同與戰爭

生態女性主義者 Maria Mies 研究兩德的統一和前蘇聯、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分裂，看到激發新的國家認同情緒的，除了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現代價值、族群與文化認同，更重要的是改善物質生活，趕上歐美工業－殖民－父權國家生活水準的願望。追求國家認同的動機通常起源於對一個強大的政治、經濟體或族群的集權統治的強烈反抗，要求地區性自主或自決，而以歷史、文化、種族或宗教的差異為基礎。生態女性主義一向主張小規模的自足性地區經濟，反對龐大的政經權力結構，自然傾向於支持地區自決。然而在前南斯拉夫的事例中，Mies 看到的卻是斯洛維尼亞和克羅

埃及因為旅遊業較發達，地近歐洲共同體，而希望擺脫較貧窮的其他省份，加入歐體，成為富裕的歐體的一份子。因此，他們雖以宗教、語言、文化為由，要求自決，卻不願在經濟上獨立自足；他們一方面脫離社會主義大國，另一方面迫不及待獨立建國，以便加入

力、官僚體系和政府，意即加強軍備和暴力。雖然獨立之動機出於爭取政經權力，卻需藉由動員文化與歷史差異來證明其不得不分離之正當性，一旦這些差異無法經由和平談判解決，而必須訴諸武力，所有的舊恨和敵意都被挑起，引發全面內戰。追求國家認同即使在

潛意識中受到尋求文化與族群根源、回歸母土的願望的激發，卻演變成消滅「他者」的陽剛與仇恨的戰爭，年輕的男人走上戰場，在資本主義父權架構之內，為爭奪領土與女人的控制權而戰。然而女人並非僅僅是父國戰爭的受害者，過去曾經有過許多婦女和團體支持大大小小的各種戰爭，包括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次世界大戰。但也有其他的婦女團體超越國家界線，看到人類的共同處境。Mies以為，若人類未能體認人與萬物的互依共存、自然資



Stock up In Renegades 女人共謀，儲備叛亂份子

超級國家歐洲共同體，和超級國際組織聯合國，仍舊成為超越母土的超級權力結構的一份子。

以現存大國的模式獨立建國，意味著建立軍隊、邊界武

源之有限，自制自律，愛物愛人，那麼，在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架構之內追求國家認同，將導致更多陽剛殺伐之戰，斬喪所有生命，終究毀滅人與萬物賴以存活的整個地球。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生產與消費行為是分離的，生產者以工作和產品換取金錢(薪資及利潤)；消費者以金錢換取產品，滿足所需。這種生產與消費行為的二分，創造了兩者之間的矛盾：生產者為了金錢，而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而生產，所以他們會生產有毒物品、核能、武器及越來越多無地可停，無路可開的汽車；消費者的食衣住行等需求卻是實質的、感官的，他們需要乾淨的空氣、無污染的食物並且遠離廢棄物。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亦即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終將在工業化、商品生產的社會帶來摧毀自然的後果，台灣和世界各地發生過的諸多工業災難已經給了我們夠多的警訊。

然而對這些訊息最先感到憂心，直接採取行動的，不是任何政府、官員、政黨，而是受害的人民，特別是婦女，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婦女。在這些草根運動中的女人，往往比當地男人更堅持自給自足的維生觀點，例如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由婦女組成的契普柯運動便主張土地、水、森林、山坡是當地居民共有的資產，也是她們生存、自由與尊嚴的基礎，而自由與尊嚴是生存的必要條

件。雖然男人反對，她們仍堅持不被政府或工業界用金錢收買，出讓土地，改變生活方式。她們或緊抱大樹，或站在推土機面前，以自己的身體來阻擋山水森林被破壞。此外，較廣為人知的行動尚有肯亞婦女發起之綠帶運動、厄瓜多爾婦女挽救紅樹林免於淪為魚蝦養殖場等等。

在工業化的北半球，近年來也有不少婦女團體在歷經婦女、和平、生態運動之後，感到需要採取更具體的行動，整合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日本在1960與70年代的幾次嚴重公害事件的預防與求償中，女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環保意識的覺醒使得人們質疑消費導向的生活，而成立各種型式的合作社，著名的生活俱樂部為家庭主婦合組的消費與生產者合作社，從1965年集體購買牛奶、雞蛋和無毒的有機農產品開始，發展了直接向生產者購買的管道，並擴展為全國性組織。對「生活者」而言，在她們與生產者反覆交涉過程中形成的產品，不同於「為賣而製造的商品」，而是為生活者的消費而生產的「消費材」，她們以此突顯消費者的自主性和物品的使用價值。至1991年，生活俱樂部社員總數已逾二十萬，並且以政治代理人(素人政治)的方

式參與地方選舉，1991年地方議會選舉中，共送進七十名代理人至地方議會。另一個重要的合作社聯合會——綠色生協成立於1988年，社員數有二十萬人，它提出「綠色合作社宣言」，自我定位為

國家、政府或政黨一旦形成，便有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考量，而形成組織意志，在組織的意識中，個人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統計數字。

「由母親們所組成，為實現女性自力運動的聯盟」，它並且與第三世界女人合作，開創了日本消費者與菲律賓蕉農直接貿易，從事生態式種植。此外，亞洲尚有不少婦女團體透過聯線方式，彼此互通聲息，相互支援，

對抗國際資本主義父權勢力的侵襲。我們平常得不到這些訊息，不知道其他地區婦女的努力和成就，是因為大眾媒體沒有報導，而不是這些事不可能或沒有發生。

在日本推動合作社運動的橫田克巳曾意識到：「人本來具備這樣的能力，即對自己的行動做出構想，然後根據構想行動，以此不斷地改善自己與他人，主體與環境的關係。但工業社會不僅沒能磨練人的這種能力，反而使這種能力不斷喪失。但當男性被工業社會吸收的同時，女性卻沒有在物質文

明中失去自我，反而找回了自己的主體。這種現象，沒有發生在屈從於企業主權的男性中，反而首先出現在社區生活者的婦女中...。」

過去我們把政治權力交給政府和專業政客，把社會權力委任給企業，任由官商勾結，支配整個社會。我們相信龐大的組織，以為組織越強大，對被組織者也越有利，然而無論國家、政府或政黨一旦形成，便有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考量，而形成組織意志，在組織的意識中，個人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統計數字，組織永遠有更重要、超乎個人的利益和目標。為了減低組織的專斷，日本的生活俱樂部採取分治的方式，他們主張「小就是美」，在各地區設立獨立的合作社，避免中央集權。台灣婦女新知基金會協助各地成立婦女新知協會，而不是廣設分會，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做為一個市民，一個女人，我們要如何收回生活的能力、行動的能力，如何在個人的層次上形成具有機能的組織，尚有許多需要思考的問題，不能仰賴現存的體制，既有的答案。不過，日本和其他地區婦女團體已經做過和正在進行的諸多努力，都可以做為我們參考借鏡之用。



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